



陈翰笙

四个时代的我

周谷城题



任雪芳整理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序.....	周谷城(1)
封建家庭和母教.....	(1)
良好的中小学教育和革命启蒙.....	(7)
留学美欧, 探索兴邦富国之路.....	(14)
年轻的北大教授.....	(28)
走上革命的道路.....	(32)
发生在莫斯科的一场争论.....	(38)
在商务印书馆的一年.....	(42)
30年代的农村调查.....	(44)
为革命不避风险.....	(51)
流亡日、苏、美三国.....	(59)
协助宋庆龄搞工业合作运动.....	(67)
流亡印度.....	(76)
再次寓居美国.....	(80)
返回新中国.....	(83)
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缅访问.....	(85)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98)
和平使者.....	(103)
新德里聚会.....	(108)
世界和平盛会.....	(113)
随宋副委员长出访印、巴、缅.....	(117)
瑞典之行.....	(122)
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124)



在“大跃进”中所见所闻·····	(134)
三年困难和“四清”·····	(139)
“文革”时期·····	(144)
英语学习班·····	(148)
心愿·····	(152)
 陈翰笙活动大事记·····	(155)
陈翰笙著作、文章目录·····	(164)

附 录

护送陈翰笙上船·····	路易·艾黎(174)
一位老干部的生活剪影·····	章德良(175)
在陈翰笙教授那里学习·····	资华筠(180)
陈翰笙的史学思想·····	陈洪进(190)
陈翰笙对华工史的研究·····	张 铨(208)
陈翰笙教授谈道德建设·····	刘士胸 叶稚珊(213)
青山常止 朝气犹存——访陈翰笙教授·····	王 均(217)



序

周谷城

陈翰笙先生的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一书，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回忆，另一部分是朋友、学生的介绍。自述部分讲了他的家庭，早期的教育，美国、德国的留学生活，参加革命工作，与李大钊、廖承志、宋庆龄以及蔡元培、杨杏佛、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的交往，30年代广泛的农村经济调查，流亡印度、美国等地的工作情况，直至解放初期频繁的外事路向，“文革”中的编书育人等等。朋友、学生介绍他的文章，从学术思想、工作作风、生活态度、教书育人等各方面作了描述。另外附有生平活动大事记，著作目录，并配有几十幅照片。

这本书不仅是传记文学中一部很好的文学书，而且是近现代历史的一部有趣味而又令人信服的、很好的参考读物。书中的事实，无论是出自翰老自己组织、亲自写定的，或是别人的介绍，都真实可靠，令人信服。翰老学问渊博，中外语文都很好。在他治学过程中，重视资料的精神，俨然是第二天性。几十年前，他调查黑龙江流域的农民生活，其重视资料的精神就使我惊讶。后来他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领导世界历史研究所，直至今日，年事已高，对这两方面的责任，还不能完全摆脱；甚至一些青年学生要攻读博士生段，亦非请翰老指导不可，现在他身边还有好几位博士研究生。凡此种种，都与他重视资料的精神分不开。最近，我看到他题自己的照片，有几句话：“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或未经缜密的分析，决不可以轻易下结论。”我所特别注



意的，与他自己写下的，似乎没有不符合之处。因此我大胆地在这篇短短的序言里，指出并强调翰老治学、重视资料的精神，相信于读者是有好处的。

1987年10月18日



封建家庭和母教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即1897年2月5日，我生在江苏省无锡县东门城头弄祖父家里。相传我的先祖生活在周武王所封的陈国，即今河南东部及安徽一部分地区。公元前479年楚灭陈。陈国瓦解后，原来无姓名的奴隶都以陈为姓了。我家这一支可能是明末清初迁到无锡来的。从此，陈家世居无锡，虽然算不上江南望族，却也是颇有根基的书香门第。祖父陈志初是清朝的秀才，品学俱为乡里所称道。他几十年专心从事教育，在他门下授业者甚多，靠授业所得，治了一点田产，可供家中食用。祖母姓温，他们共有四子四女，我的父亲是最小的儿子。几个伯父中，大伯父陈肇庆开当铺，并治有田产；三伯父陈杏邨靠祖辈的几间破房屋，一年到头吸鸦片，过着寄生生活；唯有二伯父陈梅轩在地方上颇有名气。他开米行，毕生以经商为业。他在二伯母去世后没有再娶，却买地做义庄救济族中的穷人，并出钱在住宅东边办起一所小学校，供无钱交学费的孩子上学，称义学。二伯父对母亲十分尽孝，他专门建造一座十分宽敞的房子来供养我的祖母。这所新宅东头前面为义学，后面是收租的仓厅；西头有门房、花厅、大厅，后面是我祖母住的院落，有花草、假山等。二伯父办义庄、义学，且事母至孝，但自己却节衣缩食，穿了多年的棉袍，棉花都绽露出来了，他也毫不在乎。我的四位姑妈分别嫁给唐、王、丁、顾四家，其中唐家很有钱，是开纱厂、碾米房的。

我的父亲叫陈濬、号觉先，也曾叫过菊轩。他生得方面大耳，天庭饱满、地角丰圆，眉宇间显露出一派刚劲果敢的神气。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身心健康的人。父亲在私塾里跟着祖父的得意门生朱惠甫学习，考中秀才。后来又先后考进江阴南菁书院，



江南高等学堂，南京陆师学堂就读。1898年戊戌变法时，国内提倡新学，新书新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股新思潮的影响下，父亲在无锡办起了派报所。每天上海都有船来，将《申报》运到无锡，我的父亲就将这些报纸分送到订户。

我的母亲姓顾，出身于无锡富商之家。外祖父顾卓楚，拥有相当于15亩地面积的大糟坊，酿造酱油和各种酒类，家大业大，店号叫顾万昌。住家留芳声巷。我母亲没有读过书，也没有学名。她自幼丧母，但由于家庭富有，父妾“好婆”通情达理，因此婚前一直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外祖父对这个小女儿也十分疼爱，从糟坊里拿回来的现款，都交给她收管。外祖父可能是看中了父亲的学问，才将心爱的小女儿嫁给了没有多少产业的陈家。婚后父亲经常在外面工作，不大过问家中的事情，陈家又没有什么钱可供使用，生活的重担子就压在我母亲的身上。虽然外祖父家有钱，好婆对母亲也很好，但母亲生性要强，绝不轻易求人。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常一边哄我玩，一边不停手地帮助缝纫铺开衣边儿、锁扣眼儿，或给南货店敲瓜子仁，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早已过世了，但一家大小还都聚居在陈家老宅。这所住宅是1858年陈家逃到崇明岛躲避太平天国革命、七年后又迁回无锡时建造的。一共有20多间房子，进门有一个三开间大厅，正中挂一块横匾，上写“慎修堂”。厅旁有一间书房，厅后有三间房屋，这就是我父母居住、我出生的地方了。过了书房向西还有三进九间房，那是大伯父一家住的。大厅南面隔一个天井，还有二进六间房，再往南过一个天井，就是一幢上下四间的楼房，这些房子是祖母、二伯父和三伯父及其家人住的。辛亥革命后，这个封建大家庭逐渐解体。二伯父在东河头巷盖了新房，将祖母迎去奉养。她老人家活到92岁高龄。

我出生后，父亲为我取名叫陈枢，小名翰生。回想起来，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有两件，一是过年过节，二是回外祖父家。



每逢过年，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到处张灯结彩，嫁出去的姑妈也都要回娘家给祖母拜年。大年初一，我总是早早起来，让妈妈给我梳洗打扮干净，穿上新马褂，戴上顶心有一颗红珠珠的小圆帽子，就急急忙忙跑去给祖母拜年。这时，祖母也早已穿戴整齐，慈祥地笑着，接受众多的儿子、媳妇、女儿和孙儿女们的拜年。她的身旁总是放着一个一个的红纸包，那是准备送给孙儿女们的压岁钱。我按照母亲教的那样，给祖母磕头，祖母就笑眯眯地给我一个红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块亮晶晶的银元。祖母是重男轻女的，给孙儿的红纸包里是一元钱，给孙女的则是五角。后来听说，她对我的小妹素雅是格外青睐，总给一元压岁钱。接着，给伯父母、姑奶等长辈一个个磕头拜年，他们或给三角、五角，半天下来，我就会带着一大把压岁钱回去，让母亲收藏起来。

在封建社会，亲戚间的礼节往来很频繁，我常常看到外婆家派人送东西来。过年时，送的是年糕、桂圆，莲心火腿或新鲜猪腿；端午节送粽子、枇杷、杨梅，中秋节则送来各式各样的月饼和秋季刚刚上市的时鲜水果……反正一到过节，总有吃不完的好东西，而且亲戚们往来，小孩子也多了伙伴，这自然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日子了。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去外婆家中玩。外婆家的住宅很大，有东西两处宅院。两宅的布局完全一样，进门处有门房，里面是大厅，后面为三进住房，每进有四开间宽的前后八间房。每进房之间都有院子，院中栽着桂花和果树。东西两面另有一些房屋，是厨房、浴室和佣人的住房。此时外祖父母已去世，由好婆管家。好婆自己生有三男二女，对前房的儿女们也都照顾得很周到。外婆家十分阔绰讲究，有保姆、奶娘、丫头以及园丁、厨师、伙夫等许多雇工、仆人；1932年任江苏警察厅厅长的缪斌，就是外婆家伙夫头缪福官的孙子。

在外婆家，我除了喜欢善良的好婆外，最喜欢的要算六舅顾保连了。他是好婆生的小儿子，³南京陆师学堂毕业生。人长得魁梧，性格豪爽，每次我去了，他都将我抱起来，抛起好几尺高，



再伸开两只大手接住，那滋味，像腾云驾雾似的，好玩极了！后来辛亥革命中，他在陆军当团长，参加了革命，曾带着队伍炸断蚌埠铁路桥，以阻止清兵南下。

记得我11岁的时候，曾在喜庆日喝醉过一次。那年，祖母做70大寿，此时她已被二伯父请入东河头巷新宅。做寿那天，大厅里挂灯结彩，一个半人高的金色“寿”字悬挂在正堂，两侧挂满了亲友们送的寿幛、寿联，还有一帮吹鼓手分列厅前，每当有人来贺寿，他们就鼓起腮帮子，哩哩拉哩哩拉地吹起唢呐。喜欢凑热闹的孩子里里外外跑进跑出，没有一会儿安宁。中午时分，在花厅摆了20多桌酒席，请来客吃寿面。每席都有冷盆、热炒一二十道菜，最后还上一道蜜饯，红艳艳的山楂糕、绿莹莹的蜜青梅，煞是好看，馋得小孩子们口水往下流。这天我可高兴了，尽情地吃，喝，终于醉倒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幼年时代，在这个几辈人同居的封建大家庭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父亲的严厉和母亲的厚爱。我终生也忘不了5岁时发生的那件事。在书香门第的陈家，5岁已到了启蒙年龄，我的父亲虽说经常在外忙碌，却也没有忘记抽时间教我写字，还让我用毛笔描红模子。有一天早上，父亲还没有起床，就把我叫到床前念字给他听。那时我个子很小，坐在椅子上还够不到桌面，于是又在椅子上加了个小竹凳，坐在竹凳上，高声念着学过的生字。念着，念着，我一走神，就念错了一个字，父亲猛地抬起手，搯了我一个巴掌！我同小竹凳一道滚下椅子，哇哇地哭叫起来。姨妈听到哭声，立即跑来，把我抱走了。从这之后，父亲再没有打过我，但是我见到他总是惧怕几分。

父亲常年不在家，我与他接触不多，我这个人的脾气、性格、道德观念都是从母亲那儿来的。母教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母亲虽是富商大户女，却个性刚强，心肠好，好打抱不平，兄弟姐妹们都听她的。在娘家，男女佣人成群，母亲从来没有干过活，而嫁到我家后，我家没有佣人，要几房媳妇轮流做饭、侍候



婆婆。轮到母亲作饭，就苦了。有一次她煎鸡蛋，放了一点糖，祖母就大发雷霆：“谁煎的，像蜜汁样甜！”母亲脸红红的，不敢吭声。由于父亲不会经商开店，家中经常缺衣少食，母亲从不埋怨，也不向娘家讨要，宁肯自己节衣缩食，给外面做点零活贴补家用。逢年过节，外婆家大担小挑送东西来，母亲总是请大家一起享用。平日里她吃苦耐劳、安贫乐善，勤俭持家，但对我的身体健康却特别注意，到七八岁时，母亲还请一个奶妈每天下午挤一杯奶给我喝。

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次要学费，母亲拿不出来，只好向在家居住的王家二姑妈借了两块银元。那天下大雨，我穿了一双钉鞋上学，将银元放在钉鞋里，一只鞋一块，觉得很好玩。谁知雨大路滑，我过桥时滑倒了，两块银元从钉鞋中掉出来，都滚到河里去了。我吓坏了，赶忙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气得眼泪直流，却舍不得打我，只是狠命地拍打自己的双腿，我看见十分难过，连忙跪下认错，说：“妈妈，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时时当心，到我将来能赚钱时，一定归还这两块银元。”母亲听了，将我扶起来，反倒安慰我说：“下次当心好了！”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做人的道理却十分明白。娘家有钱，她不求；几个姑妈都嫁给了有钱人家，她不讨；只是常常去看看婆婆，也从不说起日子的艰难。她常常对我说：“宁愿吃开眉的粥，也不吃愁眉的饭”，“人是穷的，心是铜的”。意思是说咱们人虽然穷，但骨头要硬，怎么穷也不去求人。她还说：“不要见到大佛‘得得’拜，见到小佛踢一脚。”教育我不要长双势利眼，为人要正派。母亲对我讲过许多格言，诸如“不听好人言，终吃苦黄连”，“做人总不要做到诸人远避”，“情愿明枪交战，不要暗箭伤人”，“有理堂前打太公”……教导我既要诚信待人，热心帮助他人，又要敢于坚持真理，见义勇为。母亲的谆谆教诲，我牢记在心，至今不忘，到古稀之年，我写过一首《念母》诗，怀念含辛茹苦的母亲：“无锡东门城头弄，祖传茅屋遗三栋。家离东林半里许，忆我慈母劳



接送。我父远游湘与黔，幸赖高堂管教严，备课修身两不误，时时苦语做针砭。教我为人不爱钱，处世应须穷益坚。勤俭之风宜培养，见义勇为担铁肩。于今望七虔追思，萱闾遗训注心田。



良好的中小学教育和革命启蒙

我7岁那年，父母将我送入东林小学学习。东林小学离我家只需步行10分钟就到了，但中间要过一座桥，叫将军桥。为了这座桥，母亲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刚上学时，母亲每天都要到桥头接送。前面讲的两块银元落水的事，也发生在这座小桥上。记得在这座桥上，还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夫人许纶（玲淑）也是无锡人，在这桥另一边的女子小学读书。我和她几乎每天在桥上相遇，有一天忘了为什么事，我们两人竟在桥上打了一架，几十年后，我们在北京相遇，说起当年打架之事，都不禁捧腹大笑。

东林小学，在东林书院的旧址，是明代东林党人聚会、讲学的地方。无锡城虽不大，但由于有太湖之美和丰富的物产，历代名人多瞩目此地。相传三千多年前古公亶父的儿子泰伯、仲雍初次在这里建立句吴国，古称梅里。以后世代为吴都，历史上著名的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北京至杭州的大运河横贯古城无锡，使无锡交通十分方便，我小的时候常常随母亲坐小火轮船去苏州的姨家。苏州人喜食甜物，我常常去，因而养成了一生喜甜食的嗜好。由于物产丰富、交通发达，使无锡的农、工、商业都比较发展，当时，在无锡凭借太湖之富发家的有中国第一号资本家荣德生、唐保谦、钱伯成和我的外祖父顾卓楚。

我在东林小学上学时，东林党人事已过去三百多年，但东林遗风尚存，那“依庸堂”上的对联赫然在目：“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小学校风很好，校长、教员都比较正派，很关心和爱护学生。我从小学起就受修身教育，我一生中没做过坏事，这首先要



说是得益于我的小学教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校长顾倬如。他长得很高，仪表堂堂，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他除了在东林小学任职外，还在另一所学校兼课。顾倬如很关心学生，常常问我们家里的情况，学习有没有困难等等。他还经常给学生讲如何做人，教育我们都做正直的人。修身教员黄淡如对我教益也很大。上修身课时，黄淡如先生不仅给我们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爱国将领的故事，教育我们要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要热爱养育我们的华夏大地，而且教育我们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黄先生常常问我：“你放学后都做些什么？”“早晨是怎么来的，路上都去过什么地方？”问后，又嘱咐我走路要一直走，不可东看西望，更不要随便与不认识的人搭话，当心上当受骗。每当放学或放假前遇到黄先生，他又会告诫我千万不可进茶馆，就是自己的父亲去，也不要跟着进去，因为那种地方孩子是不应该涉足的，一是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二是可能遇上坏人，染上恶习。这些同智力启蒙一道进行的修身教育，对学生今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起了很大作用，我一生不吸烟、不饮酒，乐于助人，刚直不阿，这同小学受到的良好教育有关。初小的最后一年，学校开了英文课，教员是后来成了商务印书馆英文编辑的平海南。平海南英文很好，他教课耐心，不厌其烦地纠正学生发音，让大家多多背课文，他是我的英文启蒙导师。

在东林小学时，六七岁的孩子就可以寄宿，我也寄宿过一段时间。那时，与我同房间的一位叫赵琛的同学，非常聪明，功课极好，就是三天两头尿床，看着画了地图的褥子，他感到很难为情。这时候，我就会主动地帮他褥子晒出去。后来，赵琛成了著名的建筑工程师，南京国民党铁道部的大楼就是他设计的。解放后，我们两人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每次开会都能见面，有时还会提起当年尿床之事呢！在东林小学，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两江总督端方来校视察。光



绪年间，全国共有三个总督，势力极大。端方是满人，任两江总督后分管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他对汉族文化名人颇为尊重，有点沽名钓誉的味道。1903年，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端方到东林书院旧址视察来了，我们都排好队在校外迎接他。他在校长的陪同下进“东林八君子”的祠堂致敬，还参观了校舍。第二天，我们每个学生得到一支毛笔，一锭墨，说是端方赏的。后来听说，端方还特意去找了顾宪成的后裔顾枚良呢。

1909年，我的父亲从湖南长沙搭信来，让我们前去团聚。当年我父亲办派报所，传播诸如《申报》等进步报刊，变法失败后，清廷搜捕革命党人，我父亲受到株连，只好离乡而去。他先到湖北，投奔同乡杨范甫先生。杨当时受张之洞委托，筹办黄汉德道（包括汉阳、黄州、德安三府）师范学堂，即让我父亲帮他的忙，学堂办起来后留他在校任教。后来鄂藩岑尧阶升为黔抚，我父亲随去贵阳，任陆军小学堂教官，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大员何应钦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算来我父亲还当过他的教官呢。1907年，岑尧阶调往湖南。冬天，我父亲与好友赵南山也一并回到湖南。正值广西中丞张坚白向湖南借用军事人才，岑尧阶推荐我父亲与赵南山同去。到广西后，我父亲被任命为调查军路的中队长，总队长就是后来发动讨袁起义的蔡锷——蔡松坡先生。当时，广西边境与法属安南（今越南）接壤，安南一边道路平坦，而广西的道路却多年失修，一旦双方发生冲突，运输物资、调动军队都会遇到困难。我父亲接任后，历尽艰险，用半年时间修好了路。另外，在此行中，他个人也颇有收获，他目睹了沦为亡国奴的安南人“奄奄无生气……亡国奴之痛苦何啻人间地狱，”也了解到广西的一些风土人情：“男妇多孔武有力……一切劳役如挑箩、抬轿之类，大多由妇女任之。”

我父亲完成勘路任务后，仍回湖南。岑尧阶中丞委任他为督练公所兵备处文案，兼岳麓高等学堂教员。他深感自己法律知识之不足，利用业余时间到湖南政法学堂学习。就在这个时候，他



写信唤妻儿来长沙。我到长沙后，考入明德中学学习。明德是长沙有名的四所中学之一，是胡元倬、黄兴创建的。在明德中学时，我认识了一位终生难忘的良师——傅熊湘。傅先生字文渠，又字君剑、纯根，湖南醴陵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南社诗人，日本留学生，早年曾是位热忱的爱国者。他在明德教历史课，上课时戴个瓜皮小帽，上面有一颗红顶子，脑后拖一条大辫子，谁都知道那是假的。他是个诗人，诗写得很好，他很喜欢我，常常让我去他家谈谈，我也特别喜欢上傅先生的历史课。傅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绘声绘色地讲述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虎门烧烟、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的斗争故事，也讲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丧权辱国、国家备受西方列强欺凌宰割的历史现状，还灵活现地描述出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英雄们不畏强暴、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有一次上课，傅先生讲汉奸、卖国贼曾国藩投靠帝国主义、残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气得我咬牙切齿，拿起笔来画了个小人，又在下面画了一把刀，表示要刀砍曾国藩老贼！

明德中学的校长胡元倬，号子靖，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长得瘦瘦的，胡子很长，说起话来尖声尖气，但他对办学却十分热心。开办明德学校后，为应付学校开支，他奔走于上海、南京、武汉、北京等地，四方募捐。一般的做法是，到一户有钱的人家，先是好言相求、申明大义，拿到钱后千恩万谢而去。如果人家不愿出钱，他就坐下来不肯走，晚间和衣睡在人家地板上，这样一来，第二天人家多少也得给几个钱打发他离去。为办好学校，他还到处为学校聘请名师，陈介（抗战前任过驻德大使）从日本回湘探亲，胡子靖就去请他留在明德学校教书，他不肯答应。胡校长竟当着客人的面跪在他面前，不答应就不起来，陈介很受感动，答应任教一年。在学校的礼堂里挂有一块白底黑字的匾，匾上有四个大字“坚苦真诚”，联想到胡元倬的所做所为，也真够艰苦真诚的了。

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是明德中学的赞助人，宋教仁也很



支持，因而，在辛亥革命前夕，这是一所颇有革命气氛的学校。黄兴在学校担任历史博物和体操教员，革命文人苏玄瑛担任语文教员，张继教历史，周震麟教地理，著名南社社长柳亚子先生也来讲过课。对于这些革命教员，胡校长也非常欢迎，他曾多次掩护过黄兴，他讲：“君倡革命是流血之举，我为此则磨血之人。”明德中学的这些革命教师，通过教课，深入浅出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这也可以算是我民主思想的启蒙吧。

1911年初，我父亲听说清华学堂要招收新生，认为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就积极准备让我去应考。这年我才14岁，要出远门，父母很不放心，就派父亲的得力听差王德安陪我去，到北京后投奔作法官的二姨父陆澄宙。大约六七月份，我们从长沙出发了。那时交通不方便，我们先坐小火轮船从长沙到汉口，再改乘火车北上。那火车也极落后，只有硬座，开一个小小的窗户，而且只能白天开车。第一个晚上，车到河南驻马店就停开了，我们住进一家小客店，混了一宿，第二天继续乘车走，晚上又在河北赞皇停了一夜，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到了北京。我们比较顺利地找到了现在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一条胡同里的陆家。说起来，陆家的夫人是我母亲的堂姐妹，姨父陆澄宙当时是大理院的推事。这个姨有一个男孩，当时五六岁，他就是陆定一。

姨父姨母对我都很好，让家人领我逛北京城，因为是来考学的，重要的还是准备考试。到北京后才知道，清华学堂招的是留美预备生（美国退赔一半庚子赔款用于培养中国留美学生，1909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招收留美预备生，1911年2月，成立清华学堂，招收第三批留美学生），而不是高等中学招生，但既然来了，就试试吧。于是，姨父带我去拜访负责阅卷数学卷子的著名学者、无锡人顾栋臣（号枚良），我对他磕头，行了大礼。谁知11年之后，我同他女儿顾淑型在美国结婚，他竟成了我的岳父，可惜后来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了。我曾对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先拜老丈人，后认识女儿的。”由于不够报考年龄，不知费了



多少周旋，我才争得了参加考试的资格。我顺利地通过了第一场国文考试，但第二场就出了洋相了。第二场是用英文出题，要求论述货币改革，但我的英文不行，将题目看成论河流改道了，当然没被录取。

这次进京考试，在陆家住了两个多月，我结识了两个好朋友，即金岳树、金岳霖兄弟。这两人在我准备考试时都帮了大忙，哥哥金岳树教我数学，弟弟金岳霖教我英文。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游览了古都北京，大开了眼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去东华门看百官上朝的情景。那时王府井东华门一带没有这样繁华，只有零星的几个小铺子。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来到东华门外，呆了一会儿，就听见喝道声、马蹄声自远而近，上朝的文武百官们来了。只见一顶顶富丽的绿呢大轿、一辆辆朱轮篷车，一匹匹鞍辔鲜明的大马接踵而来。我拉着王德安追到东华门的牌楼旁去看，看那些下轿、下车、下马的大官们。啊，那五颜六色的朝珠，那各种羽毛的花翎，真让人眼花缭乱，眼睛都不够用了。这一切都新奇极了，我真舍不得回去。没想到，半个世纪后，我竟在当年看上朝的东华门外一住20年。

9月份，我辞别陆家姨父母，经天津、上海回长沙了。我刚到长沙，中国就爆发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大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赶跑了皇帝，这就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湖南新军积极响应，赶走抚台余诚格，成立了军政府，周围各县农民也纷纷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这时，我的父亲陈觉先担任长沙中路巡防队第四队管带，主持兵备处的中路巡防营统领是吴文甫观察。抚台余诚格认为我父亲和吴文甫与革命党人有往来，于革命前夕将他们派去东路，我父亲任东路巡防队第七队管带，驻平江。长沙光复后，我父亲被军政府任命为标统，派驻岳州，后来又奉命率部去临湘，准备支援武汉。

10月22日，我和母亲、弟弟呆在家中，听到街上的枪声响过一阵子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在下午



悄悄溜出门去。我跑到西园明德学堂门口，但见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学校的老师大多去闹革命了，我崇敬的傅熊湘先生到《长沙日报》做了主编。他叫我去帮他的忙，送报纸呀，取稿子呀，挺有意思，我甚至想再不念书了，跟着傅先生办报纸吧。我那时虽然不大懂得革命，但却希望革命成功，免得像黄兴等先生说的那样，沦为帝国主义的亡国奴。我们这些年轻学生都终日在外跑，打听革命消息。每天我都要去长沙关码头，守候在那里，等着从武汉开来的轮船，以打听消息、抢购报纸。

谁知过了没多少日子，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长沙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杀，立宪派谭延闿做了湖南都督。我父亲也接到命令，停止支援武汉，撤回长沙。他到长沙后，见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遂辞掉标统，携家眷返回无锡了。



留学美欧，探索兴邦富国之路

我的高中是在长沙雅礼学校念的。我父亲带我们回无锡小住后，又回到长沙，在以后的几年时间内，连续做了黔阳、泸溪、龙山、湘阴、芷江五任县官。由于连年外任，母亲嫌路远，父亲又要有人侍奉，于是纳徐氏元贞为妾。徐元贞略有文化，能看一般书报，人也长得端正，是长沙人。她对我还好，家中也相安无事，父亲做几任县官，都是徐氏随任的。父亲的第一任所黔阳，是个盗匪滋生的穷乡僻壤，一般县官去，三五个月就被赶跑了。父亲到任后，认为这里变乱是由于缺乏教育，且谋生艰难造成的，所以先后办起半日学校、夜校、习艺所等，教授一般常识和谋生的技艺。父亲做几任知县都政绩显著，但有时也很危险。他在芷江剿匪时，就身陷匪窟，几丧性命。徐氏随任，不怕艰苦，日夜为丈夫担惊受怕，为营救丈夫，与匪抗争，被刺刀扎伤，说来也是个难得可贵的女子。

父亲外任期间，我随母亲住长沙读书。雅礼学校是美国耶鲁大学在长沙办的教会学校，教师大多数是美国人。我记得有一个教历史的教师叫钱伯斯·埃勒，他到中国来一面教书，一面要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中国太平天国的失败》。他对中国学生很好，我也挺喜欢他。

大约在我16岁那年，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是我父亲的换帖兄弟，叫徐正祥。父亲唤我出来拜见客人，徐正祥详细地询问我在哪个学校读书，平日做些什么功课等，我一作了回答。徐正祥十分高兴，连声称赞。过了几天，父亲把我叫去，让我写一篇题目为《缓急相济》的文章，要求四五天内交卷。我虽然不知父亲的用意，但是他吩咐的事，是要认真去做的。后来听母亲说，那是



徐正祥出的题目。我做的文章，徐氏夫妇看了都很满意，决定将他的女儿徐冰文许配给我。

1914年的春天，有一次我与同学一起去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听演讲。演讲人是美国的化学教授罗伯特先生。这位美国人，以他渊博的学识，娓娓动听地劝导中国的青年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他说：“你们吃过从美国进口的金山橙吗？有这么大的个儿，”说到这儿，他夸张地用手比划了个碗口大的样子，又接着说：“金山橙皮儿薄，用刀子一剖，甜美的汁水四流，真是好吃极了！更妙的是，里面连一个籽也没有！”罗伯特绘声绘色的演说，简直把我的口水都引出来了。停了一会儿，罗伯特又说：“这种金山橙，是我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专家、接种能手路斯·卜班克用几个不同的品种嫁接成的，其中就有你们四川省的广柑种……”这番演讲，听得我心往神驰，简直坐不住了，恨不得马上飞到美国去，拜路斯·卜班克为师，学会嫁接果树的本领，种出自己的良种橙，到那时候，再也不用万里迢迢进口美国金山橙了！这偶然的机遇，使我萌生了去美国学习的念头。

我想要去美国读书，首先得学好英文，那次考清华学堂不就是因为英文太差而没考取吗？去美国的念头一直萦绕着我，我渴望早一天学到先进的科学知识，好造福于自己的祖国。1915年中学快毕业时，我终于对父亲说起这个埋藏心头、使我寝食难安的心愿——去美国留学。谁知，父亲竟一口拒绝了。父亲说我年龄还小，生活难以料理；又说他也沒有那么多钱让我去留学，而中学毕业后应该先投考北京大学，大学毕业后再考虑官费留美。我失望极了，还要等三四年，多长的时间啊，说不定到那时候，路斯·卜班克早已不在人世了呢？！不行，得想法早点去。我想各种办法，都觉得不行，这天忽然想到狱中的绝食斗争，对，我也可以学着样子搞绝食，家里入急了，自然会答应我的要求。于是，我咬咬牙，硬是三四天没有吃饭，谁劝也没用。父亲还是无动于衷，母亲却心疼得直掉眼泪。她悄悄地问我，这到底是为



了什么？说清楚可以想想办法。我看母亲心动了，就对她吐露了自己的心愿。母亲听完，走了。母亲心里矛盾得很，丈夫经常不在家，且有了妾徐氏，多年来她与长子相依为命，孩子要出远门，她真舍不得啊。可是孩子决心已定，死命拦他，会闹出意外的。母亲虽然自己不识字，但深知读书有用，盼望我将来能有出息，所以她终于忍痛卖掉娘家陪送的金银首饰，又向娘家借了一些钱，凑了两千块大洋，交给我做路费。

看到母亲凑齐了赴美路费，我高兴极了，立即跑去告诉雅礼学校的美国历史教师钱伯斯·埃勒。钱伯斯也很高兴，他给我讲了许多美国的风土人情，还给一位朋友写了信，介绍我到收费低廉的赫门工读学校学习。临别时，钱伯斯又拿出自己的四套西装（两厚两薄）对我说：“在美国不比中国，要穿西装的，这几套衣服你拿去，让母亲改一改，可以穿几年的。”说实话，钱伯斯先生可帮了我的大忙，在以后几年的留美生活中，我一直穿着这几套西装。

这年秋天，我拿着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介绍信，到了上海，找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一位叫朱少平（音）的干事热情地接待了我，奔波几天，终于为我办好护照，买好船票，并兑换了外币。在上海办事期间，我突然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徐家不是在上海吗，家中给自己定下的这位徐冰文小姐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呢，这一出国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回来，最好能与她见上一面。于是，我买了一些礼品，到徐家拜访。徐正祥不在家，徐夫人听说我要出国自然高兴，但却说女儿不在家。过了几天，徐家派人给我送来一大篮子食品，但徐冰文却又未露面。一年后，徐冰文的哥哥徐维曼到美国学习地质，和我住在一起。他说，他的妹妹很愿意与我通信。于是，我写了几封信，劝徐冰文来美留学，并说我愿意帮她的忙，但徐冰文不愿意来，后来，她又写信说，从学校毕业后在一家电话公司工作了。我和徐冰文这段姻缘至此就算结束了。



我终于登上了去美国的“中国号”轮船。船慢慢离开上海码头，向大洋彼岸驶去。这是一艘只有1500吨的船，去美国整整走了三个星期。船到横滨时，我给父亲打了个电报，告诉他我去美国留学了，请他原谅。船终于在美国旧金山靠岸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不仅跨过了一个太平洋，而且跨越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从一个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一个注重科学、讲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在我的面前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到美国后，我按照钱伯斯·埃勒的嘱咐，考进了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赫门工读学校。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专供年龄大的、没有正式学历和缴不起学费的人学习的地方。

当时的美国教育事业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19世纪时，美国进行的是欧洲的古典教育，保持人文学科的传统。校长是学校的长老，他认识每个学生，同他们直接接触。校长和教师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道德和宗教生活，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数成为律师、教师、医生和牧师。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越来越需要从事实业的工程师和农学家。于是，1887年，一个叫莫里尔的参议员提出一项倡议，即将出售自由土地得到的巨款拨给各州，专用于“农业机械技术以及有关科学和英语”的教学上，这个倡议作为立法被通过了。从这年起，政府每年拨款给州立农学院或筹建农学院。为了得到这笔钱，各州争着兴办农学院。同时，也产生了几所世界上最出色的工程学院，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说：“学校的宗旨是使学生适应现实生活”，“学校是孩子们在生活实践中学习生活的场所”。在这种新的教育思潮影响下，美国的教育在传授书本知识的同时，也注重体力劳动、手工操作等民间教育，出现了许多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学校和学生。赫门工读学校正是这样一种新



旧教育交替时期的产物。我在这所学校里，既感受到了教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又受到掌握技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培训。

我在赫门工读学校时期，除了每天规定的几小时学习外，就是去做工作。这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通过自己动手养活自己，吃住都不用花钱。学校里有菜园子，有养鸡、养猪的地方；也有洗烫衣服的车间，还有做桌椅、修理工具的木工房。我刚到学校，先在菜园子里种菜、摘菜；后来去洗衣组，学习熨烫衣服，也到食堂里去端过盘子。在食堂里，一桌坐七八个人，每个人所要的食物不同，要记清楚，不能出差错，这项劳动训练了良好的记忆能力。托盘子，最困难的还是过门，那时门上还没有使用玻璃，从这边看不到那边，而人们总是进进出出的，稍不留神，就会将整个盘子碰翻，那样就糟了，因为那是要赔偿的。我感到去食堂端盘子很有好处，训练了我动作的机敏和很强的记忆力，终生受益非浅。

在赫门的一年中，我选学了英文、生物学和历史。教历史的男教师讲课很好，我是他唯一的中国学生，因而他很喜欢我，常常叫我晚上去他那儿谈谈。他对于中国的秦皇汉武、成吉思汗以及太平天国、义和团等都很感兴趣，而对于美国的历届总统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也都能讲得神灵活现。由于这种接触交谈，我的英文进步很快。另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缝衣匠巴托（音），他是阿米尼亚人，移民来美国的。他有40多岁，个子矮矮的，很瘦，有点驼背，脾气也很古怪。他帮助学生缝衣服，有时也听听课。他同我很谈得来，我俩经常在一起用英语天南海北地谈天。我发现他的知识很广博，谈论文学、历史、哲学，都是滔滔不绝，真不知他脑子里装了多少东西。

我踏上美国领土时，衣袋里仅剩1000美金，从旧金山到赫门花去200美元，又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就只有500元了。在赫门半工半读一年，我节省了不少钱，而且熟悉了美国和美国人，英语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年后，在长沙的美国教师埃勒来信了，他告诉我不要报考加利福尼亚大学，而应该报考加州的波莫纳大学，因为那里除第一个学期要付伙食费外，从第二学期就可以享受奖学金了，这对于没有多少钱的我来说，是十分适合的。于是，1916年暑假时，我从美国的东北部乘火车直奔西南，找到了在洛杉矶东边的波莫纳大学。主考人要求我用英文写一篇文章，由于在赫门一年的锻炼，这对我并不是什么难事。我拿起笔来，“唰唰唰”流畅地写下去，刚写到一半，主考人就说：“你不用写了，可以进来了！”我顺利地考入了第一所美国大学。说到波莫纳大学，还有一段趣闻，68年后，即1982年，一天我突然接到两位自称“校友”的人的贺年片，待我将这二位请到家中后，既不相识，年龄也几乎相差一半。一问才知道，这夫妻二人来北京工作之前，从母校波莫纳大学的校友簿上查到了我的名字，才找来的。1986年12月，即我离开学校72年后，波莫纳大学又给我寄来一本校刊。这说明美国学校的工作做得好，对毕业出去的学生是关心的、负责的。

我是个穷学生，租不起公寓住，只好接受一个朝鲜留学生的邀请，住到他自己建造的木棚中去。这个木棚大约有十几平方米，除了两张木床外一无所有。但是，要维持这样的生活也很困难，我只好利用假期去附近帕萨蒂纳（音）的饭馆端盘子，侍候人。这种工作一般没有工资，靠顾客给的小费攒钱。那些富人们往往一边吃一边谈，如果你在旁边侍候得好，他们一出手就是几美元。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妇带了一个小孩来吃饭，我除了照顾大人外，还格外照顾了那个可爱的孩子，这夫妻俩十分高兴，连声称谢，还给了五美元小费。就这样，我有两个暑假都去端盘子，每个假期都能拿到几百美元小费，够一年零用的。我还利用一个假期去市立图书馆学习图书管理学，学会了采购、分类、管理图书。这以后，每到假期我就去学校图书馆帮忙，虽然每小时只给两角伍分，但却可以看到许多书，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大学里学习，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一个人的发展和前途



是至关重要的，我的专业选择就颇费了一番周折。第一个学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植物学，这当然是金山橙的吸引力了。谁知，学年快结束时，克洛弗特教授将我叫去，对我说：“陈呀，你的生物进化课学得不错，但由于你视力不好，看显微镜看不清楚，对植物分类老是搞错，以后要继续深造一定会有困难，你考虑改行吧！”老师一说，我就明白了，没有办法，第二个学年我就改学了地质学。因为我想中国地大物博，但工业却极落后，只有将工业搞上去，才能国富民强。而埋藏在地下的铁、煤等矿产，对于发展工业是多么急需啊！可是，一年下来，我的指导教授又对我说：“陈，你的理论课学得很好，可为什么去野外考察时，每次拿回来的报告总是错的？你只会看书，不会观察，怎么能学好地质呢？”唉，倒霉的眼睛，看来还得改行，不然是没有前途的，那么，我学什么合适呢？

这时，卫斯特加德，这位后来成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将我引上了学习历史的道路。卫斯特加德是丹麦人，他的夫人是位很有钱的船长的女儿。他到美国后，在波莫纳大学教历史课。他很喜欢我，经常找我谈心。当我将自己学什么都学不好的苦恼告诉他之后，他想了一会儿说：“你跟我学历史吧。你的视力虽然不好，但学英文、学历史没有问题，只要学得好，也是很有前途的。”我虽然是奔金山橙而来，想的是“实业救国”，然而眼睛偏偏不作美，真是莫奈何。我忽然想起明德中学的傅熊湘先生，傅先生是学历史、教历史的，他讲的历史，是多么鼓舞人心啊，当年我不是就在傅先生的课堂上画过刀砍卖国贼曾国藩吗！我决定从师卫斯特加德教授，学好历史。

卫斯特加德教授对我很关心，他看我经济拮据，就安排我帮他批改同学们的卷子。这种卷子很容易看，一般是一个题目，两三行答案，每个小时可以拿到两角五分的工钱。为了怕同学们看到，卫斯特加德先生让我每星期两次去他家中看卷子。这时，卫斯特加德先生也在工作，他工作是那么专心致志，以致有一次竟



将在身边工作的我当成了他的夫人，叫“亲爱的，你……”我一愣，先生发觉了，不好意思地耸耸肩头。

教我英文作文的教授叫爱曼特（音）。他出身于一个教会家庭，父母亲都在中国传过教，所以他对中国学生也很好。爱曼特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每星期都要求学生用两个小时写篇英文作文，然后进行评讲，说××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没有写好，为什么没有写好，等等，对同学们帮助很大。由于我英文成绩不错，爱曼特教授介绍我参加了一个文学会。这个文学会每两周开一次会，会员们将自己写的文章都拿出来当众朗读，请大家评论。到四年级的时候，文学会又推荐我到学校办的刊物《学生周刊》当编辑。在这里，我锻炼、提高了英文写作能力，也积累了当编辑的经验。

当时在波莫纳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还有李景汉、陈遼、曹修干、何廉、邱昌渭、焦墨筠六人，其中，我与焦墨筠往来较多。焦墨筠是1917年来波莫纳大学的，她是青岛人，全家为基督教徒，她到美国学习，是由基督教会中一个很有钱的美国独身女人罗曼丝（音）资助的。我同她经常在一起散步，谈心，也有时一道写文章，去图书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们有了感情。这时，我与徐冰文的婚约已等于解除了，所以就对焦墨筠说：“我这方面是没什么障碍的，就看你了。”可是供给焦墨筠经费的罗曼丝坚决反对，她说要想结婚，除非男方也信教，而我是坚决不做基督教徒的，这件事就搁下来了。1921年焦墨筠回国时，曾去无锡看过我的母亲，送给我母亲一个亲手做的针线盒。等我回国时，她已做了青岛女子教会中学的校长。1932年，我去东北调查中东铁路问题，曾绕道青岛去看过焦墨筠，那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1959年，焦墨筠去世了，诀别之际曾要求儿子费筱墨来看望我。费筱墨遵母命拿着当年我送给她的支派克笔来北京看望过我。我俩虽未能结为终生伴侣，却是一世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20年夏季，我在波莫纳大学修业期满，在同届70多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三，被接纳为菲尔培塔凯巴协会会员。这个全国性的荣誉协会成立于1776年，只有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成为该会会员。我得到了一把协会颁发的金钥匙。

我在波莫纳大学除了学习英文外，还学了两年法文，一年德文。

我从波莫纳大学毕业后，由于卫斯特加德教授的推荐，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做了助教，一年可拿2000美元，那时美国生活费用低，用这些钱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是足够的。芝加哥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文化科学中心，全市有许多大学和图书馆，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我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选学了三门课——美国宪法史、古代埃及史和俄文。我学习了英、法、德文后，为什么又想学俄文呢？这是因为我听说在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生了一种欲望，渴望到革命了的俄国亲眼去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要想去，就得学习、掌握俄文。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卡帕，曾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当过大使，他任校长后，便独树一帜，在自己的学校里开设了俄文。于是，我就跟着卡帕校长的儿子卡帕教授学了一年俄文。我后来几次去苏联，为共产国际工作，学这点俄文还真有用呢。

为什么要选学美国宪法史呢？美国独立后就有宪法，中国辛亥革命时也搞了一部宪法，两国既然都有宪法，社会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我想自己研究比较一下，美国的宪法与中国的宪法究竟有什么不同。讲美国宪法史的教授叫安德鲁·麦克劳夫林，苏格兰人，是讲宪法史最有名的教授。他带个研究生班，每星期都讲宪法史，我就跟他学了一年。听说教埃及古代史的布莱斯代特教授曾几次到埃及去参加过考古发掘工作，我对古代史很感兴趣，也就选了他的课。

该写毕业论文了，写什么呢？那时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眼里，



学位是了不起的，对于它，象小孩子想吃东西那样，馋得很。后来才认识到，一个人学问的好坏，并不是学位决定的。谈起当年，同学们之间都不免要开玩笑，说那时简直是“发疯的驴子”、“可笑的狗”。对于写什么样的论文，我思来想去，认为自己虽然学了外国历史，但是却赶不上美国同学熟悉本国的历史，还是选个中国历史题目吧。于是我决定写《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中，英国政府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西方殖民者涌进中国的大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没有去论述整个鸦片战争的政治原因和严重后果，而只想论述其中的一点，即根据南京条约，中国要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这些通商口岸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呢，我决定从这里着手写论文。我到华盛顿、芝加哥的几家大图书馆翻阅资料，发现这里收集的资料比国内还丰富，我很快写成了论文。论文说，中国的茶叶闻名世界，允许五口通商后，茶叶主要由广州出口，远销欧洲。可是，茶叶的主要产地在浙江、福建，从这些地方去广州，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那时中国既没有火车，又没有汽车，运输全靠人夫挑运。挑茶叶去广州，要用几批人分段运输才行。第一批人将茶叶挑到江西，再换人过赣江，再经过广东省的北江，才能到广州。这样，从浙江、福建到广州这条很长的路途上，挑茶的人整年络绎不绝。这些人在路上要喝水吃饭，要抽烟，要住宿，也要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沿途的手工业、饮食业、商业就发展起来了……指导教师对我这个题材新颖的论文十分欣赏，顺利通过，授予我硕士学位。

在芝加哥大学时，中国的同学们组织了“中国留美同学会”，由周明衡任会长，我做秘书。我负责编一个季刊，叫《中国留学生季刊》，是中文的，借以联络会员。同学会每年要组织一次夏令营，即召集全体留美学生开会，一般为期一周。



1921年冬天，我在“中国留美同学会”听说，中国要派代表团来参加华盛顿会议了。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未能完全解决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问题，为了进一步瓜分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英、美、法、意、日、葡、比利时、荷兰等国于1921年11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新的分赃会议，把软弱无能、受分割、被瓜分的中国代表团也请来了。中国代表团是以驻美大使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驻英大使顾维钧为第二全权代表，王宠惠博士位居第三。中国留美同学立即组成“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我和查良钊、段锡朋、罗家伦是“留美同学会”派去的代表。我们见到了中国代表团，劝阻他们不要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尽管爱国学生力阻苦劝，后援会的段锡朋为此还打了顾维钧，但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仍授权顾维钧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1922年2月6日签订了《九国公约》。这次会议解决了三方面问题：①限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力；②抵制英国在中国的势力；③限制英国海军的扩张。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几个人。一是高仁山，他是南开的毕业生，新中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新中学会是以留日的南开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组织，周恩来也参加过新中学会。高仁山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学，没有拿到硕士学位就回国了，待我回国时，他已是北京大学教育系副主任了。另一个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查良钊，他也是新中学会的，后来做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经高仁山和查良钊的介绍，我于1921年参加了新中学会的美国分会。另一位是何思源，北平解放前他当过北平市市长。

在此期间，我同顾淑型结成美满姻缘。前面已经介绍过，她的父亲就是我去北京考清华学堂时拜见过的顾枕良先生。顾淑型从北京女子师范毕业后，于1917年来美留学，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学习。1918年，顾淑型回国，她父亲在天津病故，只剩下她与姐姐顾淑礼二人了。1919年，她又来美国勤工俭学了。有一天，波莫纳大学同学焦墨筠约我去旧金山码头接一位朋友，我



一听她这位朋友也是无锡人，就陪她去了。这是我初见顾淑型，她是那么婉丽秀美，举止文静飘逸，我们很快就象老朋友一样用无锡话攀谈起来。我告诉她，我曾给她的父亲磕过头；我母亲也是顾家人，论起来，我还得叫她阿姨呢。我俩忘情地说着，竟将焦墨筠冷落在一边，后来一看，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原来她这个青岛人，对无锡话是一句也听不懂的。

从那时起，我与顾淑型的往来逐渐多起来。顾淑型学教育，她是勤工俭学的，经常利用假日去帮人家带小孩，或去工厂做工。闲暇时，我们两人在花前月下、河畔林边，海阔天空地谈个没完。我们都有蓬勃向上的朝气、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报效祖国的伟大理想，命运之神将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了。1921年冬天，我去华盛顿参加“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之前，顾淑型毕业了，我们到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请七八位美国朋友，一道吃了顿饭，就结了婚。没几天，我动身去华盛顿了，顾淑型就留在西雅图，帮人家看小孩，等待我归来。

婚后，我与顾淑型一道去美国东北海岸城市波士顿，我到哈佛大学学习，顾淑型则外出做工，或帮人料理家务。她在罐头厂做过工，经常带桃子回来给我吃，至今我还比较喜欢吃甜食呢！波士顿是著名的文化城市，哈佛大学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都座落在坎布里奇地区，两校一水之隔。哈佛大学是1636年创立的，学校占地很大，校门也很多，同学们之间接触，往来都不多。我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奖学金，我先选学了两门课，一门是哈佛大学教务长、欧洲史权威恰斯·哈斯根思教授的欧洲史，另一门是俄文，由劳得教授讲授。

我有个表弟叫唐炳源，号星海，他是清华学校毕业生，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唐星海是我大姑妈的儿子，唐家很有钱，开纱厂、糖厂、面粉厂。他父亲兄弟几个，大伯父在北京做法官，他父亲行二。星期天他经常到哈佛来，我俩一起吃早饭，然后外出游玩。有一次，我俩沿河边散步，唐星海又说起他们家



作生意的事，我问他：“你回去以后准备干什么？”唐星海说：

“我学的是纺织机械，将来要自己设计纺织机，扩大纺织厂，将来做个百万富翁。”我说：“你不能老做生意吧，做了百万富翁又干什么呢？”唐星海说：“当总统！”我笑了，说：“将来你当了总统，我第一个起来把你打倒！”20年后，我们这对表兄弟于1940年底在香港相见了。这时的唐星海确实成了富翁，在香港开了家很大的南海纱厂。他问我：“表兄，你看眼下时局如何？”我说：“时局不稳哩，恐怕日本会打仗啊。”唐星海一言不发走了。一个星期后，他来告诉我说，他已将所有的存款换成美金，存入美国银行了。半年后，果然爆发太平洋战争，看来，我一句话却帮了唐星海一个大忙。唐星海活到71岁，于70年代末病故，他的夫人是宋庆龄的表妹，现在仍健在。

1922年春天，我正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准备取得博士学位时，忽然有朋友从欧洲回来。他对我说，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而且贬得惊人，一美元可以换好几亿马克。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动了脑筋，美国生活费用很高，我手头只有两千美金，两个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如果去德国，这点钱足够两个人舒舒服服地过上几年，那样就可以安心做论文了。经商议，我与顾淑型决定去柏林。

这里要加两段小插曲。1921年的冬天，西雅图的一位朋友突然给我寄来一份加拿大温哥华出版的《华侨日报》。我很奇怪，翻来复去看，发现一则这样的广告，写道陈枢要去法国学习航空，请大家捐助。我想这个人竟与我同姓同名，不要让人家误会是我吧，我得赶快改名。改叫什么呢？我想起我的小时候叫“翰生”，据父亲说，这个名字还蛮有讲头，古书《幼学》上有：“鸡曰翰音”，因为我属鸡，故起名“翰生”。于是，我决定改名为陈翰生，为了好看，又在“生”上加了个竹头，从此，陈枢就变成陈翰笙了。另一件事，是1921年，我在芝加哥火车站见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自己挟着皮包上火车，身后只有两名随从。



我见后，很有感触，要是在中国，别说皇帝、总统，就是巡抚出
嘲，也要地动山摇啊！旧中国的社会制度真是太腐败了。

我们动身去欧洲，先到法国，在风景秀丽的地中海边住了几
个星期，然后又去意大利、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住了几个星
期，度过夏天后，才前往柏林。柏林的住户都争着拉留学生到家
中食宿。我们选择了一个寡妇家，这家只有寡妇和她的女儿，十
分清静。我俩租一间房，连吃饭、洗衣服都包括在内，每月只要
付5美元！那时的欧洲，美金最值钱，1923年我和顾淑型又去意
大利旅行，火车乘坐头等车厢，旅馆住第一流的，6个星期走了
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等6个城市，却只花了8美元，真是令
人难以置信，这说明意大利的里拉贬值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柏林，顾淑型攻读德文，我去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工
读。该所的领导人叫奥托·赫曲。他对东欧的历史地理十分熟
悉，是个权威，他主编了季刊《欧罗巴》。他反对纳粹，希特勒
上台后，他跑到巴黎去了。我在柏林大学两年，主要做了两件
事，一是听讲，听世界经济的讲座，主讲人茹巴特（音）是位经济
学家，他讲课从来不用讲义，到了课堂上就能滔滔不绝，而且很
有条理。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欧洲资本主义所以发展，是由于
从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黄金、资源。这篇文章使他出了名。我做的
第二件事就是写论文。论文题目是《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
敦使节会议》，是用德文写的，由三位德国同学帮助修改，1924
年完成。赫曲教授看了论文，认为写得不错，就通过了，授予我
博士学位。

在柏林，我又碰到了何思源，他是从美国芝加哥来的，我们
仍是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研究所，但都在柏林大学。

1924年春天，旅居欧洲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托人来找
我，邀我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出来多年，我也很思念自己的祖
国和亲人，于是接受邀请，和顾淑型一道返回中国，住在北京北
河沿顾淑型的姐姐顾淑礼家。



年轻的北大教授

去国离乡近十载，我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呵！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实行了改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我进入北京大学，在历史系担任欧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当时我只有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民国以来，北京大学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前清时代一些腐旧传统却很难打破，这就使它成为新旧教育思想斗争的场所。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奔波半生，此时已年过半百，他上任后，满怀信心，想在北大实现自己以教育出人才、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他坚持以考试成绩录取学生，并四处奔走，聘请当时颇具进步思想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夏浮筠为理科学长，还聘用了一批或有真才实学，或有进步思想的人到北京大学任教，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朱家骅、沈尹默、鲁迅、周鲠生、王世杰等。此外，他兼容各家学派，使之各显所长，北大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当时国内时局动荡，各种思潮并存，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也有表现。北大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历史系的系主任朱希祖是日法派的，他对我这个从欧美回来的人很不喜欢，想把我排挤走，要他的留日朋友代替



我。不久，他就想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办法。他伪造了一张名单，共有十几个人名，都是听我课的学生，以这些人的名义写了一封短信，说：“陈翰笙是南方口音，我们听不懂，他讲课的内容也不适合，不配教授我们！”他将这份东西拿到学校评议会上，想借此把我挤走。代理校长蒋梦麟将这个信拿给教育系副主任高仁山看了。高仁山是我的朋友，立即来找我告之，他说：“你不是同王世杰在搞《现代评论》吗？你可去问问他。”我去问王世杰，他说：“这事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据我看是假的，如果去问问签名的人是可以搞清楚的，但那样做就会把朱希祖搞臭了。”王世杰又建议我去找李大钊商议一下。李大钊又和陶孟和讲了，陶孟和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说东南大学可以聘请陈翰笙做教务长。但我对陶孟和讲不愿意做行政工作，此议只好作罢。

李大钊又找到法学系负责人周鲠生，将这件事对他说了，还说：“王世杰是胡汉民的人，《现代评论》也是胡汉民出钱办的，找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李大钊同志建议我直接找一下周鲠生，说周人品好，是个正人君子。周鲠生对我说：“不要同王世杰讲了，我聘请你到法学系兼课，讲授美国宪法史。”这样一来，朱希祖没有办法了，陈翰笙既然能被外系聘用讲美国宪法史，为什么不能在本系讲欧美史呢？我继续在北大任教，只是从1924年下学期又多了一门美国宪法史，到北河沿的法学院去上课。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也请我去兼课。当时北大学生比较自由，听课也要选择老师，据后来一些学生告诉我说，当时一些向往革命、思想进步的学生都崇拜李大钊；一些主张改良，或有些封建思想的“老夫子”们都信仰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梁漱溟那道貌岸然的学者风度，而那些喜欢读书、一心做学问的学生，都愿意接近我。

这时，顾淑型在北京艺文中学（即现在北京二十八中）教书。这所学校是新中学会为了推行教育救国的方针而创办的，高



仁山任校长。由高仁山、薛培元、查良钊和我组成学校董事会，查良钊为董事长。艺文中学一反中国学校传统的灌注式教学方法，而采用美国人创制的道尔顿教学法。这种教学法使学生能有计划、主动地学习，以讨论钻研为主，教师辅导为辅，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顾淑型在这所中学担任英文教师兼教务长。说到道尔顿制，还有这样一件趣事：1981年，我在英文版《中国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教育应该搞道尔顿制。不久，接到一个美国人的来信，说他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了，对它很有兴趣，希望和我面谈。后来，他到我家中来了，原来他是从纽约道尔顿学校毕业的，怪不得那么感兴趣呢！那时，我与王世杰一起办《现代评论》，常在一起聚餐。有一次我们在前门外吃饭，王世杰说：“将来社会主义要人人平等，那么北京有三百多掏粪的，到社会主义了，谁还掏粪呢？”我说：“到那时，社会进步了，有自来水了，就不用掏粪了！”可见当时看问题还十分简单、幼稚。

有一次同周鲠生教授谈起来，他还认识明德中学的傅熊湘先生呢。傅先生曾向周鲠生打听陈枢，周告诉他，陈枢已更名陈翰笙，在北大历史系教书呢，傅先生很高兴。1924年冬天，我到湖南醴陵去看望傅先生。从言谈中得知，他给湖南军阀赵恒惕当了几年秘书。同时，他的生活也开始腐化起来。我觉得他变了，与他谈不到一块儿了，以后也就中断了交往。听说，北伐战争开始后，傅先生家遭到冲击，他携老父逃往武汉、上海。“四·一二”以后，又出任湖南沅江县长、何键的参议和《国民日报》的总编辑等，完全堕落成一个反动的官僚。

1924年4月，我回到离别了9年的无锡去探望母亲。在家门口，我看到几个小女孩在玩耍，却不认识其中的妹妹素雅。1914年，小妹出生时，我曾在房门外听到她的第一声啼哭，以后出国，再也没有见过她。当惊喜交加的母亲哭够、笑够之后，才对我说：“阿翰，你的妹妹，还没有见过吧？”说着，从门口唤进一个挺秀气的小女孩来，我想，啊，原来我妹妹这么大了，一



把她抱起来：“小妹！”小妹却哭了，她看到了一个戴夹鼻眼镜的陌生人，还以为是个外国人呢！我母亲一共生过八胎九个孩子，只有最后一个是女儿。然而存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即我，小妹素雅，还有老五克敏。克敏是父亲外出做官时生的，很聪明，却不喜欢读书，一副少爷派头，一天到晚嚷嚷买自行车、留声机等。1924年我曾介绍他入黄埔军校学习，是第四期学员，参加过汀泗桥战役。“四·一二”大屠杀后，他退出军队，到粤汉铁路上当了站长。父亲娶妾之后，母亲遭到冷遇，她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儿女身上。听家人说，我走后，母亲十分想我，每天早晨，天不亮她就起来，坐在床边呼叫：“阿翰哟，回来呀！”声音是那样殷切凄婉，小妹素雅常常为之落泪。

素雅7岁时，进二伯父陈梅轩办的义学读书，这也是母亲争取来的。那年头，女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机会，我家虽然自己办有义学，女孩子也不能去，只能在家读《女儿经》，绣绣花等。母亲认为，我父亲所以后纳妾徐氏，是由于她有文化而自己识字，这样的命运决不能再落到女儿头上，所以她坚持要女儿上学读书。可是，母亲也有许多封建思想，她在祖母的支持下，为素雅包了小脚，这样素雅在学校就无法上体育课了。老师说，现在民国了，不兴包脚，还是放开吧。可是，母亲却说：“告诉你们老师，说你母亲是毡毛落在毡毯上，毡毯铺在毡地上！”意思是顽固得很，说不通！素雅上初中时，有一次，一个教数学的男教师带着她们几个女学生去青山玩。回家后，我的母亲就拿来一条绳子、一把菜刀丢在地下，对素雅说：“你自己决定吧！”听说了这些事，我感到母亲头脑中的旧思想真不少，后来我写信劝妹妹上高中时，嘱她一定要考男女混校的江苏省立中学。

团聚是短暂的，这此后几十年，我由于参加革命工作，国内外奔波，一直未能将母亲接到身边奉养。而我的小妹素雅却一直事母至孝，真令我感激不尽。



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4~1927年，中国正处于汹涌澎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大革命中，各种思潮都活跃起来；青年学生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参加各种各样革命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北京大学集中了国内外许多优秀学者、爱国进步人士、教师、学生的思想都比较活跃。我刚刚从国外回来，一时间看不清国家的前途和出路，这时候，李大钊同志来到我的身边，将我引上了革命之路。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我一到北京大学，就听说他了，但由于他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没什么接触。高仁山是我在美国认识的，这时在北大教育系工作。他为人爽直，有什么说什么，平日与我常有交往。有一次，我同他谈起对时局、前途的看法和内心的苦闷，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主张不错，咱俩去加入共产党吧！”于是，我俩一道去找李大钊（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大家都知道李大钊是共产党），请他介绍入党。李大钊说：“现在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共产党人也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最好先加入国民党吧！”经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我和高仁山于1925年一同加入了国民党，并领到一个党证，但从来没有开过会。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的学生也经常上街示威游行，我每次都参加，还常常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当时，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少年国际都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提供大批救济物资。记得有一次北京5万多学生上街游行，召开有20万群众参加的大会，并准备发放从共产国际太平洋地区工会运来的衣服和面粉。我和朱家骅各扛一面大旗走在队伍前面，朱家骅一见救济物资，就对我说：“赶快去抢，抢过来用我们国民党的



名义分发，别让他们用共产党的名义分发了！”我俩经常在一起，他却不知我名为国民党，却心向共产党，真可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次发放物资的事，使我对朱家骅也有了新的认识。1925年底，他与陈友仁一同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曾两次打电报给我，邀我去中山大学，我都拒绝了。志不同，道不合，是无法在一起共事的。后来一些北大的学生要去南京请愿，我到车站送他们，记得其中有千家驹。

五卅惨案后不久，我奉命去上海，准备运动租界里的印度巡捕罢工，估计要花费70万元，可是我只募捐到30万元，策动没有成功。那时我去商务印书馆找工会，见到陈云和李立三了。

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各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行为。游行队伍先在天安门前集会，午前十点半钟我赶到天安门时，约有三千余人环立讲台前面。大会通过议案六条，反对八国最后通牒，要求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然后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请愿。李大钊同志领导了这次活动，并亲自扛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与顾淑型的姐姐是一道去的，顾淑型当时是艺文中学的教务长，她带着学生参加了游行。各团体高揭旗帜，排队东行。过东长安街即转向北，自东单至东四约计2000余人。我沿途散发反抗八国通牒的传单。遇到许多相识的学生。从前我在女师大授课，认得刘和珍女士，此时看见她也在队伍中。将近下午1点，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当游行队伍走到执政府门口时，反动军阀即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重伤300余人，李大钊同志的头部和双手都受了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枪响时，我正走在离西辕门不远的地方。我闻枪声，立即伏地。枪声甫毕，我即见血溅满地。我所听见的枪声，都是排枪声，计共两次。我于是急向西滚，滚入停车场。向东窥见卫队退入铁门内，从栏杆后任意射击。当时人群乱了，警察挥舞大刀、



铁棍冲过来，乱杀乱砍，许多人受伤。我和顾淑礼从西辕门冲了出来。到家不久，顾淑型也回来了。原来，枪响后，她指挥学生趴在地下，她自己也用大衣一裹就地倒下，才没有受伤。当晚阅报，知道中弹丧命者26人，刘和珍女士也死于国务院的东口。后来，我写了一篇《三一八惨案目击记》，详细地记述了“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经过。这篇文章3月24日发表在《现代评论》上。

19日，段祺瑞政府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为了安全，李大钊同志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这里是使馆区，军警不敢随便进去抓人，但却进行了严密的监视。苏联大使馆门口总是停着几辆人力车，那些车夫都是密探化装的，他们跟踪进出大使馆的人。这期间，我经常去苏联大使馆看望李大钊同志。

有一天，我又去看李大钊同志。他从院内小门将我带到苏联大使馆去，介绍我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相识。加拉罕又将我介绍给大使馆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加托诺维奇20多岁，人虽年轻，却博学多才，并能讲一些英语。我英语比较好，俄语也学过，我俩用英语、俄语互相补充着交谈。后来，我又结识了俄专教师格里涅维奇。他拿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看。我看得很认真，哪一章哪一节，甚至哪一页讲什么都能背下来。有什么不懂的，晚上我就去找格里涅维奇请教、讨论，天晚了就住在他那里。通过学习《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成的《资本论》，对解释社会发展史确有独到之处。相比之下，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格里涅维奇是最早影响我思想的朋友。

在与加托诺维奇的交往中，我了解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详细情况，经他介绍，开始为共产国际做些工作。那时，共产



国际在柏林有个机关刊物，叫《国际通讯》，是周刊。它刊载共产国际的文献和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情况以及各国政治经济述评。加托诺维奇问我可不可以为《国际通讯》供稿，我很高兴地答应下来。这之后，我就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围绕“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国内大事，写了几十篇文章寄给《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问题的一些了解和看法，许多都是从我写的文稿中得到的。

过了不久，李大钊对我说：“他们（指苏联人）希望你为共产国际做些工作。”我说：“是呀，我不是在为他们的《国际通讯》写稿吗？”李大钊同志说：“不，不是指这件事，他们希望你为共产国际做些地下工作，就是情报工作。”我立即答应下来。这件事，我一直没对什么人说过，直到1980年填干部履历表时，我才填上：“1926年在北京由李大钊同志和苏联加拉罕大使介绍为共产国际工作。”9年之后，即1935年，我在莫斯科由王明、康生介绍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李大钊、于树德又负责选派革命青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乌兰夫、屈武、康根成等近百人赴苏学习，顾淑型也去了，一年后回国。

1926年7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由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秘书的陈友仁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大会，英帝国主义分子乘机挑衅，冲入华界，当场刺死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为了惩治英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暴行，1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为了同外国人打交道，国民政府需要懂外语、能做外交工作的人才。于是，陈友仁给王世杰、周鲠生和我拍电报，聘请我们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当顾问。我接到电报后，立即与王世杰、周鲠生准备南下。当时，北京已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下，我们三人只好悄悄南



下。我们先坐火车到天津，从天津坐海轮统舱去上海，拜访了著名的女律师郑毓秀。换乘江轮，溯长江而上，到达汉口。

我们上任后，就同英国政府办交涉。经过一番据理力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于2月19日与武汉政府签订汉（汉口）、浔（九江）案协定，正式承认汉口、九江英租界行政事宜无条件交还中国管理。

到武汉刚刚两个星期，突然接到李大钊同志急电，要我立即返回北京。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但我还是决定立即回京。由于怕陈友仁拦阻，我先将行李搬上轮船，才上江汉码头对面的外交部大楼找陈友仁请假。我假说母亲生病了，请两个星期假回去看看再来。陈友仁见我已买好船票，不便阻拦，就答应了。

我离开武汉时，郭泰祺让我带一封信给安徽督军陈调元。我把信藏在鞋底里，到安庆下船，将信送给陈调元了。原来，郭泰祺和陈调元私交很好，写信动员他参加国民革命军。果然，一个月后，即3月份就传来了陈调元反正（原为孙传芳部下）、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七军军长的消息。

我经上海、天津回到北京，正是2月底。李大钊同志向我介绍了面临的险恶形势：隐藏在国民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蒋介石拒不服从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准备在南昌建立新的国民党中央。2月初，美帝国主义派代表前往南昌与蒋介石会谈。接着，各帝国主义的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政客们都跑到南昌，一道秘密策划贩卖革命的阴谋。李大钊同志嘱咐我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自己。

1927年初，一天晚上，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约我到郊外一个地方会面。我与一个姓胡的一道去，谈了一通宵，回来时天已亮了。我们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怎样革命的问题，蔡和森介绍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对此我很有兴趣，这也可以说是我在30年代搞中国农村调查的契机。



1927年4月，白色恐怖笼罩全国。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出动几百名警察、特务，悍然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了李大钊同志。那时，我常去中东铁路办事处，他被捕前两天我们还见过面呢！据我所知，李大钊同志被捕还有这样一个背景：李大钊被捕是李石曾去张作霖那儿告的密，原来，李大钊、李石曾都在军队中活动，争取军界有才能的人。当时冯玉祥、吴佩孚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都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这是李大钊的功劳。作为国民党老右派的李石曾十分妒恨李大钊，就告诉张作霖说李大钊是共产党人物，借用东交民巷活动。那时，要去使馆区抓人，必须与使馆头头打交道。使馆外交团代理团长是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李石曾帮助张作霖疏通了欧登科，才得以到东交民巷抓人的。可见，逮捕、杀害李大钊，也是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的。4月28日，李大钊被秘密处以绞刑，同时牺牲的还有谭祖尧、邓文辉、路友于、张挹兰等19位烈士。

李大钊被捕后，我知道处境十分危险，决定出国躲一躲。当时我认识一个专给《奉天时报》写社论的日本人，叫中江丑吉，他认为我是国民党，就让我先住在他家中。后来，张作霖又封掉艺文中学，在外交部街逮捕了高仁山。中江丑吉帮助我和刚从苏联归来的顾淑型买了火车票，并把我們送上去天津的火车。到天津后，我们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对人讲是去神户看一个亲戚。中国二三十年代去日本办手续很简便，根本不用护照，与在国内旅行差不多。到神户后，在中国领事馆办了护照，便搭船去苏联了。



发生在莫斯科的一场争论

我同顾淑型从日本神户乘船，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到达伯力，再换车去莫斯科。

当时的苏联，虽然已经挫败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并采取新经济政策挽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然而，在苏联进入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又遭到国内外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党内反对派的干扰和破坏。农村富农的反抗，粮食生产的危机，使苏联军队和城市还没能摆脱挨饿的境地。我们来到莫斯科，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凋敝、凄凉的景象。

我和顾淑型被安排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当研究员，但由于各方面困难很多，尤其是房屋奇缺，因而研究所无法安排我们的住处，我们又没有钱住旅馆，处境十分困难。幸亏大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孙女（忘记其名）得知了这一情况，对我们表示十分同情，将她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房子借给我们住，不用付租金。我们高兴得前去看房，谁知房中连张床都没有，更不用说家具了，但总算有了栖身之地。那时别说我们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床。我们在地板上铺上厚厚的一层稻草，放上自己简单的行李，就算安了家。

这房子夏季凉快，可是一到冬天，简直冻得无法呆。莫斯科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冰天雪地，尤其是冬季几个月，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度。这时又没有煤取暖，冻得我们伸不出手来，晚上，只好两个人拥在一起，钻进薄薄的被子中，哆哆嗦嗦地熬过一个个寒风凛冽的冬夜。住房离市内不算太远，每天上班要坐一个小时的电车。我们与普通苏联公民一样，每天吃配给的黑面包，很少有副食品。日用品也奇缺，上厕所没有手纸，只好用报纸。而报纸



的印刷质量又很差，往往一揩屁股，就弄得一手、一屁股油墨！

研究所所长伏斯涅钦斯基和我相处很好，他将布哈林的父亲介绍给我。这位老人当时70多岁，身体很好，他经常兴致勃勃地向我打听中国的情况。每到发工薪的日子，我就会见到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她是研究所的会计。那时，她只有30岁的样子，长得胖胖的，很漂亮：鸭蛋脸，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鼻子有点往上翘。她经常披着一条大披巾，发薪时站在高高的桌子后面，将一个大算盘拨得“叭叭”地响。每当我去领我和顾淑型的工资时，娜佳·阿利卢耶娃都会亲切地问：“你的夫人好吗？”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农民运动研究所是共产国际筹办的，当时在研究所里工作的外国人不少，但中国人却只有我们夫妻俩。我们住在郊外，与其他人接触不多。工作的内容就是收集中国农民运动的资料，并有选择地将一部分资料译成英文。

二三十年代，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引起的。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问题一直十分关心，对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建立以及国共合作问题，都给予了直接的指导。鲍罗廷、布留赫尔（加伦）、维经斯基、马林、米夫、马季亚尔等苏联和第三国际的顾问相继来华，对中国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三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制定了实现革命纲领的统一战线方针；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并很快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胜利进行了北伐战争。在这种胜利的形势下，虽然也有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但都受到了抵制与批判，如魏特夫、瓦尔加曾提出中国前资本主义没有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和劳动者之分的谬论。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于是，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理论界，魏特夫观点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所采取的革命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所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将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引向高潮。

马季亚尔是匈牙利人，1926年到过中国。我到苏联时，他正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担任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和瓦尔加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我与马季亚尔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见面，他那时正在写那本《中国农村经济》，对于刚从中国来的我和顾淑型还是比较注意的。我们有过几次接触，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还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式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而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我说，你讲的那只是农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中国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季亚尔不以为然地说，资本就是资本，还有什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区别呀？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还是请你读读《资本论》吧！”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

在莫斯科的这场争论，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无法决定革命的方针政策，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

1928年1月，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好友高仁山被杀害的消息，十分悲愤。后来才知道，高仁山在北京天桥被杀后，他的家属不



敢去收尸，还是顾淑礼出面去收尸，将他葬在西山卧佛寺的东面东沟村。解放后，1960年10月23日我去扫墓，追念友人，口占七绝一首：“景色朦胧记忆新，平生友好无多人。西山佛寺仁山墓，不入阍黎自有因。”高仁山的儿子在成都当工程师。女儿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银行工作，女婿在海军研究所工作。70年代初，这对夫妇回国，到东华门寓所看我，我领他们去卧佛寺凭吊了高仁山的坟墓。

1928年5月，我们夫妇回到了祖国。



在商务印书馆的一年

我们回到上海后，即去看望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曾经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清党”，但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中也逐渐感到他并不象标榜的那样尊崇三民主义，这使他对蒋政权产生了看法。1928年4月，蔡先生辞掉几乎所有的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中的任职，举家迁往上海，去做中央研究院院长，决心在自己的晚年，专心从事、发展科学文化事业。蔡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从教堂出来后，他们三个人一道去看宋庆龄。宋庆龄不肯见，让人说生病了，不能下床。没有办法，他们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

蔡先生见到我很高兴，邀我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却遭到负责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王世杰的反对（王世杰是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的人）。他说：“陈翰笙是个左派，我们这里不能要他。”由于王世杰反对，蔡先生只好暂时打消让我进中央研究院的念头。正巧这时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弄来一批大百科全书的稿子，急需人去整理。他向蔡先生求援，于是，蔡先生推荐我去商务印书馆工作。

商务印书馆是私人资本，董事长张菊生（元济）是浙江海盐县的名门望族，曾参加过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上海，协助夏粹芳办起了商务印书馆。张菊生是有远见、有学识的人，他聘请社会名流胡适为总经理。但胡适当了3个月，又推荐自己的老师王云五接任，仍回北京大学工作去了。我去的是设在闸北宝山路的商务编译所，是以胡适的名义审定书稿的。我同商务签了一年的合同，月薪100元，主要工作是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稿子。这些稿子名义上是各大学教授写的，实际上多是他们的助教编的。



因为当时大学常常欠薪，教师们生活十分拮据，写点稿子，可以贴补家用。我上班后，每日埋头于书稿之中紧张地工作。经过9个月的工作，将所有的书稿审过，并分成三类：一类是比较好的，可以采用，放在大百科全书中，这类书稿约占五分之一；另一类是百科全书中无法采用的，但可以用来编词典，这类约占书稿的五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一，质量太差，只好作废。以后听说我整理过的书稿以《百科词汇》的名字出版，上面还署有我的名字。

这项工作刚刚做完，大约是1929年的春天，蔡先生打电话来，说要找我谈谈。见到蔡先生后，他问我：“不知你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进行到什么地步？”我说：“虽说签的是一年的合同，但我的工作已全部完成了。”蔡先生说：“那好，早点离开吧。因为你爱说实话，王云五也不喜欢你。前几天王世杰被胡汉民调到南京做法制局局长了，你正好可以到研究院来。”



30年代的农村调查

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部设在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331号，而社会科学研究所则设在劳利育路4号，是租的郭泰祺的房子。郭从1929年起连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驻英公使和驻英全权大使，因而他在上海的房子就空了出来，租给社会科学研究所使用。我到那儿一看，所谓研究所，仅20来人，什么资料都没有，房子也比较狭窄。原来王世杰当所长时并没有做什么工作。好吧，一切从头开始！我认为，要办研究所，第一要有得力的干部。于是我去找王寅生，请他帮忙多介绍些人来。王寅生不负所托，果然介绍不少人来。我讲明用人不讲资历，不凭关系，只是要问他愿不愿意干，再就是看他能不能干。一般刚来的人都要经过一两个月试用，确实能干，才上报院部，正式聘用。不久，我就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一批有能力、有气魄、热心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第二，要搞好研究工作，就需要充足的资料，有了资料，才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研究所要资料，就得有钱订阅大量报刊，还得雇用剪报人，而研究所的经费有限，大多数还要留做社会调查，那么这笔钱从哪儿来呢？我忽然想到顾孟余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我们颇有交情。当时，顾先生正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做铁道部长。其实顾先生是最不喜欢做官的，生活也很朴实，平日寡言少语，属国民党左派，与李大钊同志关系也不错，1927年我去上海组织工人罢工时，他还帮过忙。我去找他，相信他会帮忙。果然，他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需要钱啊？”我说明要订报，要雇人剪报，确实需要钱。顾孟余听后，连连点头说：“啊，这个工作是该做啊，不知你需要多少钱？”我说：“我大概算了一下，订一些必须



订的报刊，至少要180元；要雇四个人剪报，大概需120元吧。”顾孟余痛快地说：“给你个铁道部顾问，每月拿400元干薪！”他很信得过我，知道我拿了钱会干正经事儿的。我立即拿这笔钱雇了四个人，每人月薪30元；其余的钱都订了报纸、刊物。雇的四人中有一个叫李长江的，是宜兴人，后来参加洪湖赤卫队牺牲了。还有一个是曹轶欧，她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叫玛丽亚。直到1935年我到莫斯科后，在康生那儿见到她，才知她叫曹轶欧，与康生结婚了。另外两个人我记不清楚了。

下一步，就是怎样开展研究工作了。同马季亚尔的争论，一年来时时浮现在我的脑中。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我说得出来，但要拿出充足的证据，又感到脑中一片空白。对，工作应该从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入手。我们的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日资纱厂，调查包身工制。日纱厂中的包身工，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这些包身工，多是贫苦的农家少女，或受骗、或为生活所迫，签订了包身契。一般一包三年。这三年中，她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全部收入归包工头所有，包工头供给她们仅能活命的衣食，每天却要干12至16个小时的繁重工作，因而许多人死于非命。我们通过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写出报告，并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以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之衰落，在中国已成普遍之现象。水旱蝗蝻之天灾，兵匪苛税之人祸，物价之飞涨，举债之绝路；凡此种种，驱使大批穷苦无告者群趋城市以供包身制度之牺牲。这份调查报告所揭露的活生生的现实，刺痛了国民党政府中的某些人，他们声言这个调查是共产党支持搞的，要调查我的背景。蔡元培先生也对我讲，有人反对在日纱厂调查，劝我们改赴农村，去调查农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立即将调查研究转向农村。

我认识到，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



村的，因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中国地域广阔，农村情况也千差万别，经过分析摸底，我们决定调查从我的家乡无锡开始，然后再扩展到河北和岭南。所以选择这三个地方，是因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而对挽救中国农村的危机，也就易于找出有效的办法了。

我先着手组织一个45人的调查团，从1929年7月至9月，对无锡地区22个村进行挨门挨户调查，对55个村进行概况调查，并对8个市镇1204户的经济生活进行调查，同时做了详细记录。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我们又组织了对广东农村的调查。由于孙夫人宋庆龄的帮助，调查工作得到广东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的协助，调查顺利进行。调查团员由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派人组成，首先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月时间在番禺10个代表村中调查了1209户。同时进行的还有50个县335村的通信调查。

保定是自耕农最多、而工商业不十分发达的地方典型。对保定的调查，是在1930年5月至8月进行的。由68个人组成的调查团共调查了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中1773个农户，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过去，也有人搞过一些农村调查，不过那是为了慈善救济事业，或为了改良农业，或为了完成某个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而已，这都是些表面的，没能深入下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而象我们这种深入到农村最低层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在中国是一创举。农民和被调查对象对我们的调查也深表怀疑，以为我们也不过做做官样文章罢了。比如，在无锡调查后樟径时，到贫苦的佃、



雇农家去，他们不是说没人在家，就是说不懂得。后来想在茶馆中开一个座谈会，他们就大骂我们是“脚客”（即为地主绅士跑腿的），说我们调查他们不怀好意，是要准备抽丁加税的。在任巷调查时，男人不出面，却指使妇女们出来，对我们嘻笑怒骂，无所不至，后来甚至用刷马桶的扫帚向我们调查员的头上乱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来解除他们的怀疑和敌对情绪。比如，先让地方行政局将地保们找来，拉拢他们，请他们挨家挨户介绍我们调查的意图，果然消除了许多障碍；乡村的小学教员是村民们尊敬的人物，请他们帮忙解释，一切怀疑就烟消云散了。采取了这一系列办法后，调查顺利多了，所得材料的可靠性约在90%以上。通过对无锡的调查，我们看到：“借贷、押当、起会、放赈等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在无锡农村中具有雄厚的势力，百分之八九的农户差不多都负有债务。近年来，因为战争和农村骚动的影响，乡村资本愈益趋向城市。农户借贷，更加困难。”（见《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

1929年夏天，我又组织了调查团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流亡“国内”的东北难民问题。

被天灾人祸逼着，不得不离开本乡，一群一群投奔他处去谋生的人们，普通称为难民。流亡东北的难民一向是山东人最多。据长春总商会会长董立广先生的估计，1927到1929年来长春的难民，山东人占95%强，河北南部人占4%强，其余的是河南、安徽和热河人。近年来，山东、河南的天灾人祸连续不断。水、旱、蝗、雹和兵匪差不多遍地皆是。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使大多数人民陷于破产的境地。粮食的缺乏逼着一般的灾民连种子、耕畜一齐吃尽，甚至草根、树皮、滑石粉都用来充饥。求生的希望逼得他们东奔西窜地流亡，地广人稀的东北吸引了大批难民。山东去东北的难民，大部分是凌乱地各自逃生，而河南的则完全是由赈灾会移送去“垦荒就食”的。据了解，从山东三五成群流亡的难民，流亡途中常有被逼卖儿卖女，过后又因悲哀、懊悔、愤懑



而自杀的。而被赈灾会移送的河南难民，沿途很难得到饮食，加之风餐露宿，老人、儿童及孕妇等染上疾病，常有死亡的。到了吉黑两省的难民，多数成为雇农和佃农，也有一部分人在铁路上当了苦力，或迫于生计投靠了土匪。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研究各国生活水平的书，用意在于了解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我决定研究一下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草生产地区烟农的生活。这年，我带调查组到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做了调查，后因其他事离去，大量的工作由王寅生、张锡昌等同志在1934、1935两年完成，并整理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到1939年，我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又在美国搜集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副题为《中国烟农生活研究》。这是用英文写的，它通过烟草这个最典型的商品作物，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中国的中央政府到地方政权，从军阀官僚到土豪劣绅，直至买办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画面，很有说服力。过去，一般人认为商品作物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可是，事实上，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烟的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上中农和富农不依靠借贷，也不热心种烟。这是对中国烟草生产区调查的新发现。

从1928年至1934年，在6年的时间里，我们农村社会调查团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脚踏实地的调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加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使我们终于得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结论。大量的调查材料表明，当时的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因此农村的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事实证明，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农村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和农村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面临着破产的威胁。由此我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纯粹的封建已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



· 田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种合并起来，以农民为剥削的共通的目标。”（《中国田地问题》）过了不久，我更明确地看到中国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后来，主要是旅居国外期间，我就调查得来的材料写了一些论著。1929年写了《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1930年写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1934年写成《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被译成日文）；1936年用英文写了《中国南方农业问题》；1940年写了《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6年在印度用英文写成《中国农民》等等。另外，还写了一些论文，发表在《劳动季刊》、《中国经济》、《农业周报》等报刊上。其他参加调查的同志也写下许多论著。目前，这些调查报告、专著、论文等，已由冯和法同志负责搜集、编排，合为三辑计300余万字的巨著——《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由展望出版社陆续出版。这部巨著的出版，为研究旧中国、研究党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对于广大青年了解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也会起一定的启迪、推动作用。

1933年8月，我出席了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散发了英文论著《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论著从两个方面陈述了中国土地问题的真实情况：第一，贫农耕地不足，土地分配不均，耕地分散；第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地主、富农残酷剥削农民，农业生产力低下。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这篇论著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著作。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这次农村社会调查，其范围、时间、影响都是空前的。我终于能够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充分的事实来驳斥马季亚尔及中国托派的谬论，也揭穿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关于“农村复兴”的谎言，为我党在农村实行正确的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我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国民党是不知道的，这次调



查是在国民党民主人士蔡元培和杨杏佛的支持和保护下，利用合法机构和合法身份进行的，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专业理论队伍。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发祥地是无锡，无锡进步青年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参加了这一工作，后来都成为我党有名的经济学家。参加三江流域（珠江、长江、黄河）调查的还有王寅生、张稼夫、张锡昌、刘瑞生、秦柳芳、姜君辰、陈洪进、石凯福等，他们也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我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八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我被推选为理事会的主席，并一直担任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后我在国外期间，由吴觉农代理主席。为了配合农村调查，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登载大量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以合法公开的活动方式，有力地支持了我党的土地革命，对反对封建土地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虽然蔡元培先生自己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所内的具体工作，全部放手让我主持，他从不干扰。遇有重要的事情，我就去找他报告。他总是仔细、认真地听取报告，先征求我的处理意见，然后提出具体办法来同我商榷。有一段时间，他在青岛休养，我有事去信请教，他都亲笔回信，答复具体而切实，从没有训人的口吻。他不仅对我是这样，对所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这样平等相待。尤其是我当时做地下革命工作，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那样的知人善任和兼容并包，我简直没有立足之地。因而，说到我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时所取得的一点点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蔡元培先生。



为革命不避风险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等人愤然出走，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我到莫斯科后，在陈友仁处结识了邓演达同志，两个人很谈得来。有一天早晨，邓演达来约我一道去看望孙夫人。我很敬仰孙夫人，早想拜访她了，于是愉快地同邓演达一起到了红场附近的苏维埃旅馆。初次见面，我们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我看他们好象还有什么事似的，就先告辞了。然而，这次见面，却奠定了我们两个人多年的友谊。

在苏联，我与孙夫人没什么来往。回到上海后，尤其是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后，我经常去莫里哀路（现香山路）29号宋宅拜访，与孙夫人的接触逐渐多起来。

蒋介石上台后，一面加紧进攻红军、围剿苏区，一面进行绑架、暗杀、镇压一切进步民主势力。1931年8月，蒋介石政府缉捕了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宋庆龄闻讯积极进行营救，蔡元培先生也写了保释信，派我去送给陈诚。邓演达被害后，宋庆龄万分悲痛，用英文写一份抗议宣言，又派我将它送到《申报》馆，转交给《申报》经理史量才。随着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宋庆龄感到必须组织起来，争取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总干事是杨杏佛。孙夫人劝我不要加入这个同盟，以免受到蒋介石政府的迫害。但我秘密参加同盟的重要活动，如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1931年6月英国警察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国际间谍”罪拘捕了牛兰夫妇，后交给国民党政府处理。当时，法国有百余名教授拍电报给孙夫人，要求援救牛兰夫妇。著名画家珂勒·惠支教授，德国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也拍电报要求援救。同盟成立后，1932年4月5日，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去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探监，支持牛兰夫妇的绝食斗争。他们经常写文章送到《申报》、《大公报》发表，并聘请瑞士律师为牛兰夫妇辩护。给报社送材料，为宋庆龄与律师之间传递信件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在特务遍布的上海，做这些工作是十分危险的，随时可能被捕。为了保险起见，每次送信、送材料都是两个人一道去。一个在前面走，一个在后面拉开一定的距离跟着，如果前面一个被捕了，后面的人要赶快回去报信儿。那时经常与我一同送信的是谢树英，他是留德的，现在在钢铁学院授课。

那时，我还经常负责护送有危险、需要离开上海的同志离沪，这样的事一般都是孙夫人委托史沫特莱女士通知我做的。埃格妮丝·史沫特莱是有印第安血统的美国人，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是由德国共产党员尤里安·古姆佩尔茨介绍来的。我到上海不久（大约是1929年2月），就在宋庆龄的住处认识她了，她那时大约40岁的样子，很是和蔼可亲。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情况不熟悉，要求我帮她的忙，于是我们有机会经常在一起谈谈。九一八事变那天，我正在街上走，史沫特莱从电影院出来碰到我，就一把抓住我说：“翰笙，你知道日本侵占沈阳了吗？真卑鄙！”这一天我们谈了很多，谈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际法西斯的猖獗，一直认为正直的人都应该为国际和平做出贡献。这时，我不知道史沫特莱在为第三国际工作，史沫特莱也不知我是第三国际的，然而对和平、进步事业的关注，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9年的秋天，史沫特莱要求让她到无锡的农村去看看。那



时，我们正在无锡进行社会调查，就由我陪她下去转了大约一周时间。对这段生活，她曾记载过，现摘几段：“有一个土地问题专家来到南京，申请在南京上海之间某一县区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得到官方许可。这个专家邀我同行。”“我们一直等到秋收季节，在无锡坐大运河上的小火轮，嘎吱嘎吱北行。机缘凑巧，那个最有权势的朱大土豪地主老爷和我们同船。朱某人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我们答应了。我的朋友、土地研究专家说，我们如果拒绝作客，那我们就休想到该区调查。”她下面还记述了我们一道去宋家作客，朱家恰为小儿子娶媳妇，我们入乡随俗，去看了新娘子。史沫特莱问新娘受过什么教育，新娘却说中国人要比外国人低一等，中国的教育也实在落后。朱家一边办喜事，一边却抓了一些农民，这些事我们是司空见惯的，史沫特莱却对我的“神色自若、毫不动容”十分吃惊。她要我设法营救，我对她说：“外人插手是危险的，为了不妨碍我们的调查工作，只好视而不见，^①才能平安无事。”

那几天，我们走了一村又一村，看到的是又矮又湿的茅屋、屋内的破烂棉絮被头、旧农具和蓬头散发的妇女。当史沫特莱亲眼看到白首垢面的老农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地主行善减租时，她气坏了，她说：“要是来一支军队将朱家人关起来，救救老百姓才好！”

有一天傍晚，史沫特莱对我说：“你今晚12点雇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我的住处来，要送一个人去黄浦码头。你不要同她说话，她也不会同你讲话的，明白了吗？”我知道又是掩护革命同志离沪，就一口答应下来。晚上，我按时叫车开到史沫特莱住处，只见她陪一个女人下楼来。我请那女的上了车，我们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直到黄浦码头送她上了船，也不知她是谁。因为听说丁玲那些日子离沪避难，我一直以为送走的是丁玲呢，直到解放后才知道是胡兰畦同志。那时，由于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许多爱国人士受到威胁，要离沪避难。这不能让他（她）一个人走，必须



由人送，如遇到盘问，就说是亲戚；如果不幸被捕，也好有人报信，否则避难的人失踪了、被捕了，组织上不知道，就无法及时营救。后来，我又掩护了几位革命者离沪。

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我又认识了传奇式的人物里哈尔德·左尔格。他的祖父弗里德利赫·左尔格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挚友。左尔格早年投身革命，为第三国际和苏联做情报工作。1929年来中国，公开身份是经济学家，来中国研究银行业务的。实际上，他在搜集国民党政府武装力量的资料、观察最高军事指挥部的人事变化。他这个人活动能力很强，到中国不久，就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结识了何应钦，并被引见给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正廷。左尔格初到上海时，与史沫特莱住同一家旅馆。他很快发现与史沫特莱来往的进步人士很多，不仅有蔡元培、鲁迅等，也有一些日本进步记者，于是他也参加到这个进步圈子中来，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他的。

左尔格认识我之后，又要求我给他介绍可靠的年轻人。那时我与孙冶方很熟，就与他讲了，要介绍他与左尔格相识。有一天，我与左尔格在楼上说话，事先嘱咐孙冶方在楼下等着。不大一会儿，左尔格在前、我在后从楼上下来。孙冶方一见，没等我介绍，就用俄语先讲了起来。左尔格一声不响走了，后来告诉我以后不再同孙见面。原来，左尔格为避免暴露身份，在公开场合只讲德语、英语，不敢讲俄语。而孙冶方只会讲俄语，自作聪明，抢先打招呼，倒把左尔格吓跑了。

1932年2月，史沫特莱要求我从南京去徐州等一个人，陪她去西安。去做什么，她没有说。我按规定手提打字机在徐州车站等，却见拿着报纸来会面的是左尔格，他是从上海来的。我俩一道乘火车到西安。下车时，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南汉宸早已等候。我们被安排住高级宾馆并设宴欢迎，主人十分热情。我不知道左尔格见杨虎城的目的，也绝不过问，这是秘密工作的规定。我们要从西安返回时，听说因为当地瘟疫流行，不准人们过潼关东



去。左尔格很有办法，他找到一个德国军官，让他开飞机将我们送到洛阳。到洛阳后，两人分手，左尔格搭车回上海，我则去太原。我的朋友查良钊当时在冯玉祥处，很受冯玉祥的重用，成为他的谋臣策士。通过查良钊，我认识了冯玉祥。在那里，我还见到了薛笃弼。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为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除前面讲过的营救牛兰夫妇外，还营救过陈独秀、廖承志、罗登贤及丁玲、潘梓年、许德珩等。因此，蒋介石将同盟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一面叫嚣蔡元培、宋庆龄破坏国民党的威信，通电“警告”，一面派特务于1933年6月18日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我和杨杏佛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住在霞飞路，我的房后门对着杨宅前门，因此两人经常见面，谈得很多。国民党派人暗杀杨杏佛，是为了吓唬蔡元培和孙夫人。可是，蔡元培和孙夫人不但怕，而且隆重地为杨杏佛办丧事，以此推动爱国运动的开展。这件事，使蔡先生彻底认清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他对谢树英说：“我从此不再进南京城！”上海沦陷后，他果然不随国民党去陪都重庆，而去了香港，一直到去世。杨杏佛去世后两个月，我也辞掉中央研究院的职务出国了。

我在上海这几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卖国投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和顾淑型也参加了一些抗日救亡工作。“一·二八抗战”后，上海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十九路军。宋庆龄发起募捐活动，她要我迅速给在北京的顾淑型打电报，要求她来上海参加募捐工作。我们在交通大学找了房子住下来，一道工作的还有黄洛峰同志。

有一次，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的夫人举办茶话会，邀请顾淑型参加，她正要去向那些太太小姐们募款呢！她顺路去看望史沫特莱女士。史沫特莱由于经常写文章，触犯了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因而胡适、丁文江等去上海德国领事馆诬告史沫特莱。不



久，史沫特莱被报馆免职，靠写文章过着清苦的生活。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募捐簿上签了名，尽自己所有捐了20元钱。而那些出席茶话会的客人都是军政界长官的太太小姐，她们个个打扮得珠光宝气。有一位穿着华丽的绣花新衣的太太，大讲自己的宝石戒指只花700块大洋，这些人打麻将，每桌的输赢成百上千，她们毫不在乎。可是当顾淑型为伤员向她们募捐时，她们看到史沫特莱名下是20元，就一个个都拿出20元，多一元也不肯。顾淑型又动员她们到医院去帮助护理十九路军的伤兵，她们竟说自己是女士、是千金，和那些出口粗野的“丘八”说话可受不了。

为了募款，顾淑型去山东找何思源。我与他在美国、德国都有过接触，可以说是朋友，但何思源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这时，何思源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处做教育厅长。何思源所以在山东吃得开，其原因有：第一，何思源是山东人，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第二，何思源与CC的上层人物比较接近；第三，何思源是留学生；此外，何思源的老婆是法籍西班牙人，她与韩的小老婆很要好。顾淑型去找何思源，走的就是夫人路线，从韩复榘处为十九路军募了一笔款。

这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32年汪精卫要做南京行政院院长时，有一天，陈公博、顾孟余、唐有壬给我打电话，要我到法租界的汪家。我到那儿一看，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在炉边打毛线，唐、陈、顾三人坐在客厅里说话。见到我，唐友仁劈头就问：“汪先生要去做行政院长了，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在研究院。”顾孟余说：“你呀，最好去做江苏教育厅厅长。”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他们想为汪精卫拉人，于是笑笑说：“我是个书呆子，是不会做官的。”后来，陈公博又请我吃饭，劝说我到南京外交部工作。我说：“我是搞研究的，去那儿不是改行了吗？”那时，我与许多国民党人有来往，他们却不知我做秘密工作。后来，顾孟余去做了铁道部长，唐有壬做了外交部副部长。

当时中央研究院共分八个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是傅斯年。



他是山东聊城人，曾留学英、德，全国解放后，他到台湾做到中央研究院院长、台大校长。傅斯年和蔡元培很接近，却对我抱有成见，常在蔡先生面前讲我的坏话。他说，陈翰笙可能是共产党，不可不防。蔡先生比较了解我，当然他不知我是共产党，只是认为我踏实肯干，为人正直，所以不听信傅斯年的谗言。傅斯年并不罢休，又故意提议将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到南京去。由于他在国民党中有关系，蔡元培、杨杏佛拗不过他，社科研究所于1933年4月迁到了南京鸡鸣寺。

刚刚搬到南京，麻烦事就来了。当时，陈立夫是南京国民政府宣传部长，他听说社科研究所迁到南京来了，就对蔡先生说，要请我去中宣部讲演一次。蔡先生问要讲什么，陈立夫说，讲什么我不管，让他自己选题目吧。蔡元培将陈立夫的话转达给我，我感到很为难。不去讲吧，得罪了陈立夫，以后无法开展工作；讲吧，讲什么好呢？投鼠要忌器呀！我对蔡先生讲了自己的想法，蔡先生却竭力劝我去讲，他说：“反正讲什么由你决定，你就去讲吧！”我左思右想，终于选了个“田赋和田租的关系”来讲，将历代的田赋、田租进行了对比。讲完后，陈立夫表示消意，他一边送我出来，一边对我说：“今天讲的，是恐怕财政发生问题，我告诉你，这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发行无数的纸币，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他把手举起来往下一甩，神气得很。陈立夫以为我真的关心国民党的财政收支呢，所以告诉我不必担心，可以印钞票补空嘛！我去讲了一下，不过两小时，是应付差事的，谁料到3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竟以此为根据，硬说我是CC，关押了我整整9个月！

社科研究所迁到南京两个月，即发生杨杏佛被刺的事。这之后，傅斯年又对研究所工作横加干涉，对我下面的工作人员继续排挤，第一个被开除的就是钱俊瑞，我很气愤，预料到傅斯年还会压迫我们，因此我们就一一设法离开了：张稼夫回北京去了，张锡昌回了无锡，我将钱俊瑞介绍到塔斯社工作，薛暮桥早已去



桂林两湖书院教书。孙科当时在上海办了个“中山文化教育馆”，我辞职后，就去教育馆工作了。1934年冬天，左尔格通过史沫特莱，动员我去日本东京，为第三国际做些工作。我同意去日本，表面上说是去东洋文库做研究工作。蔡先生对我的辞职本来十分惋惜，听说我要去东洋文库做研究工作，立即给我发了一份聘书，请我做通讯研究员。孙科也表示邀请我做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研究员。

那时去日本很方便，我和顾淑型略微收拾一下，就动身了。



流亡日、苏、美三国

1934年冬天，我同顾淑型到东京，租了间房子住下来后，我即去东洋文库研究经济。东洋文库藏书十分丰富，关于中国的资料很多。说起东洋文库，有这样一个故事：澳大利亚人摩尔森是《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他中文还可以，讲汉语就差劲了。有一次一位清朝官员问他：“您府上有几位令郎？”他忙说：“好说，好说，只有两扎！”闹得人啼笑皆非。他于1900年去世。摩尔森有许多藏书，大部分是来中国的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他的妻子打算出卖这些藏书，问袁世凯当政的中国政府要不要。袁世凯一听要几十万两银子，嫌太贵了。这事让日本人知道了，就全部买去，成立了东洋文库。我就在这里整理农村社会调查材料，撰写论文。

在东京一年的时间里，我用英文写成了《中国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两本著作。1940年这两本书由太平洋学会出面在纽约出版时，在中国大量收购烟草并加工推销烟卷的英美烟草公司认为《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触犯了该公司的利益，败坏了公司的声名，要向法院提出起诉。后来，由太平洋学会聘请律师出面调停，才平息了这场诉讼。

在东京，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记得1933年8月的一天，我与日本友人平野义太郎及他邀请的英国人拉斯卡、德国人魏特夫去游镰仓。魏特夫对东方社会颇有些荒谬的看法，我与他经常争论不休，有感而作七律一首：“寂寂镰仓碧海滨，同游四士亚欧人。弥陀座下襟怀畅，景物当前舌战中。日夜风涛松自老，春秋山谷稼常匀。源家尚武书青史，藤谢平雕似转轮。”

当时，我用英文写东西，要打字，所以家中除了雇用一個清



洁女工外，还要请一个打字员。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位朋友给我介绍来一个年轻的日本姑娘，叫中岛节子。她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刚刚从东京女子大学毕业。她不会说中国话，我们夫妇又不会讲日本话，我们与中岛节子之间只能用英语交谈。她在我这里帮了八九个月的忙，没有收过一分钱的报酬。1935年我突然回国，后来由于中日处于交战状态，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斯诺去东京参加一个演讲会，演讲中国问题。一直挂念着中国朋友的中岛节子也去听了演讲。散会后她找到斯诺，问他认不认识陈翰笙。斯诺告诉她，他熟悉陈翰笙，在上海、香港、纽约都见过，并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她。到1951年，我与中岛节子又联系上了，以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近50年后的1982年，我与中岛才有机会再见面。这年4月，中岛来中国看望我，彼此望望如雪的双鬓，不禁感慨万分。中岛节子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均已成婚。她丈夫是搞无线电的，业余喜欢爬山，虽然早过花甲之年，却一心要来中国爬喜马拉雅山呢！中岛节子从信中得知我眼睛视力极差，特意带来一个大字的电子闹钟送给我，这对我非常适用。

在东京，我还有幸结识了郭沫若同志。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1928年初，郭沫若按照党的指示，流亡日本，住在东京附近千叶县市川镇，过着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历史、甲骨文。经朋友引见，我认识了郭沫若，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得很投机。我们讨论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郭沫若也让我给他讲欧美的一些情况。我对他的多才多艺、学识渊博非常佩服。记得1935年元旦，我在郭家喝得酩酊大醉，倒卧在“塌塌咪”上。郭沫若夫人安娜急忙通知顾淑型，雇车子将我拉回家去。以后，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直到全国解放后才经常见面，两次一同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我受左尔格的委托，在东京主要是在满铁株式会社中做日本人的工作，尾崎秀实帮了我的忙。尾崎原为《朝日新闻》记者，



认识史沫特莱和左尔格，后来为左尔格情报小组的成员。1937年当了近卫首相的中国问题私人顾问，实际做地下工作。

我在东京住了几个月，仍得不到上面的指示，很是苦闷。1934年冬天，我和顾淑型在东京街上曾看见左尔格，左尔格装作不认识我们，从此再没见过他。原来，1933年9月左尔格就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身份来日本。他在日本组织了一个有9个国家的人参加的“国际主义反战小组”。这个小组在日本活动了8年，共发出23000多份秘密报告，对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一直到1941年，这个特工小组才被破获。1944年，左尔格被绞死。

1935年4月，远东情报局的华尔顿约定从上海来东京看我，可是，他逾期未来，我很奇怪，一天我翻阅报纸，突然在《字林西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约瑟夫·华尔顿因身带三个护照，以间谍嫌疑在中国被捕。我一看不好，没敢回家，直接从横滨坐船回国了。同船的有《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到上海后，我与他一起去新亚旅馆登记了房间。然后，我出去找史沫特莱，想了解一下上海方面的情况。

敲开房门，史沫特莱一看是我，急忙将我拉进房去。她问我是怎么来的，并不许我出门，怕被国民党抓去。史沫特莱派人去新亚旅馆探一下，果然在我刚走不久，就有国民党特务前去搜寻。我在史沫特莱处呆了一天，到夜幕降临时，她将我送到法租界路易·艾黎的住处。艾黎与一位叫钱伯林的英国工程师住在一起，在这里躲避还是比较保险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艾黎。

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当工厂视察员，他同情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赞成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将他住处的楼上供给共产党装秘密电台；一些遇到危险的地下党的同志，也多得到他的庇护和帮助。

我住下之后，又请王寅生坐船去东京，将顾淑型接回上海。史沫特莱将她安排在一个德国工程师汉伯克家中。两个星期后，



史沫特莱到苏联领事馆为我们夫妇办了去苏联的护照。然后由艾黎陪着我，汉伯克夫人陪着顾淑型，一道去黄浦码头上船。从表面上看，好象是两个中国人送两个外国人上船，这样，奴性十足的国民党军警就不过问了。这是一只不大的苏联船，一上船，船长立即将我们夫妇关在他的办公室旁边的厕所里，因为船只出港时还要受到检查。这个厕所很小，我们两人只好紧紧站在一起，一直到船开出了吴淞口，我们才被放了出来。

我出走之前，见了在上海读书的妹妹素雅一面，但什么也没敢告诉她。后来，家中很久得不到我的消息，母亲甚为着急，她知道我常去宋庆龄处，就让素雅去打听。当时20岁的妹妹急着找哥哥，就直奔莫里哀路宋庆龄那里问我的音信。孙夫人听说是我的妹妹，就亲切地接见了她，告诉她：“不要着急，等着吧，不久就会有信儿的。”素雅天天盼我来信，后来收到我托人带回的一个铝制录音带。这种录音带，要用木头针才能放，陈家没有这种针，只好留着。素雅出嫁时，将它带走了并一直珍存。60年代“文革”期间抄家时，这个录音带被抄走了。至今妹妹也不知我讲了些什么，我自己也忘了讲什么了。

我们夫妇俩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挂名研究员而取得生活费。我党刘少奇、任弼时、陈延年、赵世炎、向警予、王若飞、孙冶方都在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过。那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康生等；此外，1930年因“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批判、被撤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李立三也住在莫斯科。根据工作的需要，这年，王明、康生经手将我转入中国共产党。

大约在1936年春天，潘汉年到旅馆来看我。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国内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开始了万里长征。193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清算、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潘汉年是奉党中央之命，到莫斯科来与共产国际



取得联系的。潘汉年是个神出鬼没、传奇式的人物。参加革命后，他做过党中央宣传部干事、文委书记，协助鲁迅等成立“左联”。1930年调中央军委“特科”工作，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时隐时现，足迹遍及全上海。有时褴褛草帽，宛如苦力，有时西装革履，招摇过市。他经常出入史沫特莱的住所。为营救牛兰夫妇，他在上海汉口路老半斋菜馆以请客为名，邀请了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上海文化界名人，联名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抗议，要求释放牛兰夫妇。我们对他都很佩服。那次他对我说：“以后党内的事，由你与宋庆龄联系吧！”但由于我一直没有回国，所以直到1939年5月才在香港见到孙夫人。而潘汉年也就露了这一面，在苏期间再没见到他。

我在苏联期间，苏联要出版俄文的中国地图，请我为他们校订。

1936年，太平洋学会要在纽约出版季刊《太平洋事务》，由欧文·拉铁摩尔任总编辑。太平洋学会是1925年由美国、英国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发起成立的，参加该会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中国、法国、印度、缅甸、日本、荷兰、英、美等国的学术团体和个人，总部设在纽约。拉铁摩尔是美国人，大学毕业后来中国，会讲流利的中国北方话。他曾去我国的新疆考察，回来写成《亚洲内陆的边疆》一书。这本书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说话的，因而受到英国皇家学会的赏识，授予他金质奖章，由此出了名。拉铁摩尔对出任《太平洋事务》总编辑很高兴，但缺少得力的合作人，他向学会要人。作为会员国的苏联推荐我去。拉铁摩尔得知我曾在美国留学，也很满意。不久，我们夫妇就起程赴美了。

我第二次去苏联，呆了一年时间，给我的突出感受就是俄共（布）清党的紧张气氛。当时，从困境中挣脱出来的苏维埃政权正在凯歌前进，到1937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农民摆脱了贫困，工人没有失业的了，国民经济大大好转。我们这次在苏



联也没有去住郊外的冷房子，而是住在舒适的旅馆中。然而，由于斯大林滋长了个人迷信、独裁思想，因此对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作了错误的估计，将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看作阶级敌人和国际间谍，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就开始了大规模地“清党”。特别是1934年12月1日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谢·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反革命分子暗杀后，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党的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工商界领导人、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军界的将领们，都成了嫌疑、清洗的对象。我所认识的一些苏联研究员，有的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的开枪自杀了。到后来，加拉罕和马季亚尔也受到审查、被处死了！当时，我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很不理解，更没有想到，30年后，在中国这可怖的一幕会重演，而我自己也身陷囹圄！

1936年4月底5月初，我和顾淑型从莫斯科动身。我要去与拉铁摩尔合作，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苏联，必须先到巴黎。同行的有吴克坚，他是去巴黎参加吴玉章办的《救国时报》（中文版）工作的。（《救国时报》创刊于1935年5月，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的，在莫斯科组稿、排版，打成纸型后送巴黎印刷，再由巴黎向中国国内发行。）因他不懂外语，中途多有不便，因此与我们同行。在巴黎，吴玉章告诉我，《救国时报》可能停办，如果停办，机器将运到美国去办《华侨日报》。我们从巴黎经日内瓦、比利时，到了英国的伦敦。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伦敦一道去美国的还有太平洋学会总干事卡德和他的秘书，英国朋友邱茉莉女士，她是帮助我打字的，后来她到中国来，解放后一直在《中国建设》工作。

到纽约后，我们安顿好了住处，就去编辑部工作了。《太平洋事务》是一个季刊，工作量不大，除了撰稿、编辑外，就是送往迎来。我负责招待过许多国家的外交团体和个人，如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美国时，我们曾设宴招待。另一项工作就是联系各国的分会，每年召开一次成员国大会，讨论太平洋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在美国3年（1936—1939），我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帮助饶漱石办《华侨日报》。离开莫斯科前，康生代表组织向我交待过这项重要任务，他说：“你的主要力量应放在《华侨日报》上，通过这份报纸，联络海外华侨，为革命出力。”“你在太平洋学会工作，不过是为了解决生活费用问题。”我到纽约后，即与饶漱石取得联系，一起筹办《华侨日报》。不久，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办不下去了，就将机器、铅字都运到纽约来，创办起《华侨日报》。《华侨日报》是由华侨的“衣馆联合会”资助的，它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发动捐款购买医药及救护车等，赠送给抗战的中国八路军。我曾用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

当时，在海外有许多从事进步事业的中国人，与我经常保持联系的有著名的《大公报》记者杨刚。她刚毅、直爽，但不修边幅、很随便，平日不大讲话，但文笔极好。我们在纽约的中共党员每月开一次会，我与杨刚就是在会上相识的。我俩常常到一起谈谈，有时去唐人街吃顿饭，边吃边谈，处得很好。经常见面的还有冀朝鼎，他也是1936年从苏联来的，在纽约办一份英文报纸，介绍中国的情况。《华侨日报》的徐永瑛同志和我接触也较多。那时，我不但自己写文章，还为三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提供写作素材。我在纽约有些朋友，当我要知道什么消息，只消出去转一圈，通几个电话，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我们虽然身在国外，却时刻关心着祖国和人民。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起来抗战，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也被迫于7月17日宣布对日作战，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虽然在国外，也要为抗日尽自己一份力量。我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号召爱国华侨积极支持国内抗日战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人出人，有力出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妻顾淑型组



织起一个救济战争难民的机构，宣传、动员爱国侨胞和美国朋友为战争中的孤儿募捐。

1938年初，太平洋学会加拿大分会邀请我去，向加拿大人民讲述西安事变的真相。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从东到西，走遍了加拿大的十几个大城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 心 和 力 量，赢得了加拿大朋友的一致赞扬。



协助宋庆龄搞工业合作运动

1939年5月，我接到党的指示，要我携顾淑型立即回香港工作。

宋庆龄同一位女同志到香港码头来接我们。她将我们安排在中国银行大楼住下，然后对我说：这次请你们回国，主要是协助我搞工业合作运动。

原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平的卢沟桥，8月13日，又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22日，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多在华的外国朋友，如斯诺、艾黎、史沫特莱等，也都热心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37年年底，斯诺夫妇首先发起工业合作运动，他们推举路易·艾黎为中国合作社设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当时参加工作的还有卢广绵、上海电力公司的两位工程师——林福裕和吴去非。他们在一起开会，认为要坚持长期抗战，建立工业合作社是个好办法。小型合作社可以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随时转移，能够及时生产出抗战前方所急需的武器和工业品，有利于抗战的胜利。1938年，艾黎去汉口国民政府，筹措“工合”的经费。当时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看到战争时期进口工业品困难，她很想办工厂，这样一则可以赚钱发财，二则可以表现爱国，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忙呢！她见到艾黎，知道他在上海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科长，就请他做顾问。艾黎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一口答应下来，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要拨款支持办“工合”，孔祥熙果然因此拨了几十万元给艾黎，办起了工业合作总会。不久，斯诺也来到武汉，他找



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工作的周恩来，受到热情欢迎。周恩来又请博古多次与艾黎商议办法。他说，“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促进蒋介石抗战，不要让他投降，并且尽可能地争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经过一番努力，在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区很快建立起“工合”组织，在西北、西南、东南等后方地区也普遍建立了“工合”办事机构。

但是，国民政府并不真心支持“工合”运动，将“工合”总会的贷款大部分都拨到国民党统治区。针对这种情况，艾黎提议在香港筹建“工合”国际委员会，以保证国外的捐款能真正用于人民抗日战争。1938年武汉沦陷后，艾黎委托美国朋友普律德小姐去香港见宋庆龄，年底又派卢广绵前往协助。1939年7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

我到香港后，被委任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委员会的主席是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名誉主席是宋庆龄；委员有斯诺、艾黎、普律德和港澳爱国人士钟秉铎、郑铁如、何东、宋子文等20多人，会计由陈乙明担任。我的主要工作是接收各国寄来的捐款，并想法将它汇到解放区去，以支援人民抗日战争。那时，许多国家和进步人士都同情、支持中国抗日，在纽约、伦敦、马尼拉都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纽约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就是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

“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办了两年半，共收到国外捐款约2000万美元。这些钱，我都通过廖承志的关系，经由上海银行转到延安去了。延安方面经手收款的是李富春同志。每转去一笔钱，不久就会收到李富春同志签收的回条。得到回条，我们知道钱已到延安，感到自己为抗战出了力，我们再累也高兴。

在香港，除参加“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外，我还主编了一份英文半月刊，叫《远东通讯》。当时上海汪伪政权、重庆国民党政府都严密封锁中国人民抗日，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的真实消息。为了让国外的朋友们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相，争



取更多的国外朋友的支持和援助，新华社派胡愈之来香港，筹办一份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胡愈之与我商议，我又请了邱茉莉帮忙，很快办起了《远东通讯》，专门向国外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国外人士对中国的抗战有个正确的认识。现在美国国务院还存有此刊物的档案。当时在香港办的进步报刊，还有金仲华、刘思慕的《星岛日报》。

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上海沦陷后，她不肯去重庆，而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支持、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募捐，以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海内外有许多人仰慕孙夫人的高风亮节，乐意帮助她的正义事业，有的人甚至为了得到她亲笔签字的捐款收据而慷慨解囊。此外，孙夫人还在香港组织义演、义卖募集款项。有一次，宋庆龄在英京酒家的晚会大厅里，陈列出一些孙中山先生生前珍爱的墨宝和纪念品，当场义卖捐献。一些工商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争相购买，不多时就抢购一空。孙夫人将所得钱财全部设法送到了抗日根据地。一些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都由孙夫人亲自在寄送物品上签字，才能通过国民党的重重检查、阻拦。

国民党对孙夫人真是无可奈何，她软的不吃，硬的不怕，而她的一言一行在国内外影响又很大，怎么办呢？后来他们想了个办法，请英国驻华大使到香港，劝说孙夫人到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重庆居住，以便约束她的言行。孙夫人与英国大使会面那天，我也在座。孙夫人以极大的耐心听完了英国大使所陈述的利害关系，然后严正指出，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秋，国民党政府却对侵略者屈膝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这样的反动政府，我怎么能与它合作呢！1981年宋庆龄副主席逝世时，邓小平同志在悼词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以缅怀孙夫人的高风亮节。

我和顾淑型还为保卫中国同盟做了一些工作。同盟办公地点在香港西摩道，是英国人何东爵士府邸旁边的一座楼。同盟的实



际负责人是廖承志，秘书长为美国共产党员爱泼斯坦。经常参加工作的有邹韬奋、金仲华、陈乙明、司徒永觉夫人和我们夫妇。贝特兰、斯诺、史沫特莱、弗朗斯等外国朋友也都帮了不少忙。顾淑型还将徐舜英介绍到同盟下设的妇女促进委员会工作。有一次，孙夫人约我去她在九龙嘉林边道家中吃饭，在座的有孙科、陈君葆。原来是孙科从美国回来看望孙夫人了。孙科与孙夫人用英语交谈，谈了许多，孙科称宋庆龄为Madame Sun。

说到孙科，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926年，苏联顾问鲍罗廷从广州回到北京，去看陈友仁，当时我也在座。鲍罗廷往椅背上一靠，伸开双臂搭在椅子上说：“广州有一只虎，一只猫！”我觉得很奇怪，忙问：“这是什么意思？”鲍罗廷说：“孙中山是只老虎，孙科却是猫，咪！”我又问：“为什么这么说？”鲍罗廷说：“我来告诉你吧，孙科竟贪污！猫象老虎，却不是老虎。哈哈！”大家都笑起来。

有一次，廖承志突然对我说：“潘汉年来了，他们要来看望你。”我忙说：“不必了，我同你来往很方便，潘汉年是秘密的，来往不方便，以后还是通过你与组织发生关系吧！”因此没有与潘见面，以后10余年也没见过他。直到1951年我与顾淑型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后，4月在上海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请客时，才见到潘汉年同志。

到香港不久，我即去九龙柯士甸道去看望蔡元培先生，他是上海沦陷后来港的。一见面，他双手紧紧握着我，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我当时深受感动。知道他这是指周恩来妥善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的。

1940年10月，在港的工作稍有空暇，我决定去云南的西双版纳继续进行农村调查。一道参加调查的有陈洪进和新华社的刘述舟。当时，国内许多地方都被日本人占领着，交通极为不便。我先从香港乘船到缅甸，再由缅甸换船到云南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陈洪进、刘述舟则从重庆出发，到景洪会齐。我们深入傣



寨，了解傣族人的生活状况、土地所属关系等。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傣族人仍是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1946年陈洪进写出调查报告《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油印成册。由于另有重要事情，我仅在云南呆了一个多月，就绕道回港了，其余的工作都是陈洪进、刘述舟做的。回港时，我先到缅甸，由潞西乘飞机，经昆明、重庆、桂林（这几个地方飞机都要停）。我得知父母亲与妹妹一家也避难到了重庆，所以决定在重庆下飞机，探望双亲。

1940年底，我见到了父母和妹妹素雅、妹夫童一平。一家人已经五六年没见面了，妹妹在上海法学院会计系毕业后，在父亲属下的税局工作。父亲与徐氏常住上海，而我的母亲一直住在无锡。素雅刚刚工作三个月，抗战就开始了，上海遣散人口，首先遣散女职员，素雅也被遣散了。她仅带几件衣服就回了无锡，准备接母亲来上海。谁知这一去就回不来了。素雅先带着母亲躲到乡下；又从乡下逃到汉口，在我的弟弟克敏家住了一个月。那时，克敏在汉口粤汉铁路做路警。这期间，听说我的父亲随财政部到了重庆，素雅又带着母亲赶到重庆，与父亲汇合了。素雅的未婚夫童一平在香港中央银行工作，由于素雅坚决不去香港，也只好来重庆与素雅结了婚。

在重庆的4天中，我去看望了王世杰。王世杰已成了蒋介石的红人，任外交顾问、参政会秘书长。我在他那里的时候，见到他接蒋介石打来的电话。王世杰和我交谈中，提到国民党的参政会，他说：“参政会里有两个共产党人，是王明和吴玉章。这两个宝贝完全不同，一个是草包（指王明），一个是君子！”他还劝我说：“翰笙，你还是不要回香港了，日本人可能要打仗，要和美国打呀，在香港不安全，你还是留在这里吧！”我不好硬拒绝，只是说：“我在香港还有许多事情，总得回去料理一下吧。”

为了能用原来的飞机票乘坐下一班飞机走，我去拜访了当时



的交通部副部长,只有他签字,才能搭下一班飞机。当我顺利地坐上飞机后,看着身下雾气腾腾的重庆山城,我心中暗暗庆幸:“这次又让我脱险了!”

回港不久,“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依据规定路线移防,行至泾县茂林时,突然遭到国民党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血战七昼夜,抗日战士7000余人惨遭杀害,军长叶挺被俘。我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气愤。对于叶挺及新四军的处境,我有所了解。记得1939年深秋,叶挺带着军医沈其震来香港,孙冶方同志介绍我同叶挺相识。叶挺说,新四军经费十分困难,他去重庆找蒋介石,几经交涉,蒋介石才答应每月增加经费132000元,其中2000元是医药费,这点钱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叶挺又去香港找宋庆龄想办法。宋庆龄十分热情地接待叶挺,在家中设宴欢迎,对他说:“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尽量多带些回去。”当时,我们保卫中国同盟的同志帮助清点仓库,打点物资,忙了好几天,将药物、衣服、鞋袜、奶粉等物资装了整整一船,运回皖南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消息,陈毅代军长派沈其震专程去香港,向宋庆龄面告事变的真相。我认为应该尽快向国内外披露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日、实际反共的罪恶阴谋。我在《远东通讯》上写了介绍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寄到国外。这份英文刊物是第一个向国外报道皖南事变的。我们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又筹集了一大批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到国内支援重建的新四军。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即进攻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人都忙碌起来,不能让辛辛苦苦筹集来的物资和款项落到敌人手中。我们清理、打包准备内运。大家都很关心宋庆龄的安全,劝她赶快离开香港,可她就是不肯走。直到日本侵略军到达机场前6小时,她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了重庆。我同顾淑型、邱茉莉等人留下来做善后工作。



1941年除夕，我们是在香港过的，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我的寓所里谈话，而日本军舰在海面上放炮，炮弹就落在我的门前，逼得我们躲出去。1942年2月，我剃了光头，穿上一件旧长袍，装成一个店铺里的会计。与顾淑型及外甥女孙少礼、孙幼礼等乘坐送难民的船去澳门，又从那里经四会、梧州，到广西的桂林。

桂林到处都是难民，我们一时找不到住处，恰巧碰到简竹坚。她在香港办学校时，曾请我去演讲，彼此比较熟悉。简竹坚看我们无处安身，就邀请我们与她同住。她建有一座小房子，只有母亲与她住在一起，她让出一半房子给我们夫妇住。

到达桂林的第二天，我就碰到了范长江、张友渔、萨空了、田汉等友人。不久又见到了柳亚子、丁燮林等。我们经常在文化供应社会面，一起谈遭遇、谈时局、谈工作。张友渔见我是从香港逃出来的，就拿出100美金支援我；我说手头还有一些钱，婉言谢绝了。

“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国内依然开展工作，艾黎、史沫特莱、廖承志、廖梦醒等人协助宋庆龄一道进行这项工作。我没有去重庆，就主持“工合”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和“工合”研究所的工作，同简竹坚、张锡昌一起出版《中国工业》月刊。顾淑型组织起一个化工合作社，在我们的住房后支起一个破铁锅，试验熬油做肥皂，后来就专门生产市场紧缺的肥皂、牙膏等生活用品。我们在工作中，结识了孟用潜、高士其等同志。

我在桂林期间，还应桂林师范学院院长林励儒之邀请，担任该校西文系主任职务，每周讲三次课。1943年暑假，应陈竺同先生邀请，又给这所学校讲了三个星期印度地理。我到桂林时，王易今同志等在桂林仍出版1934年在上海创刊的《中国农村》月刊，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徐特立同志在桂林时，还访问了月刊编辑部。

当时，在桂林担任广西民政厅长兼教育厅长的湖南人邱昌



渭，是我在美国大学的同学。他常来我家访谈。邱昌渭以为我是汪精卫、陈公博等一伙的，因此常与我谈重庆的政局和人事问题；我也得到桂林文化供应站与中外人士闲谈。有一次，我看到蒋经国也在这里。他坐在桌子上，两腿不断摆动，同一个美国新闻记者谈得十分高兴。那时他在赣州当官，时常乘飞机到重庆看望宋美龄。路过桂林时，便停下几天，去看他那位姓张的情妇。

1942年2月初，我在桂林又碰到了邱茉莉和爱泼斯坦，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从外表看，这两个人很不相配，妻子邱茉莉长得又高又壮，颇象男性，而丈夫爱泼斯坦却又瘦又矮。说起他们的婚姻，真是天作之合。原来，日本占领香港后，邱茉莉和爱泼斯坦都被抓进集中营。这个集中营设在海边，三面架设铁丝网，临海一边没有铁丝网，但没有船，谁也难以逃掉。邱茉莉常常到海边散步，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只破烂不堪的机动船。她悄悄地告诉了爱泼斯坦。以后，两个人一有机会就偷偷地去修理那条破船。过了不久，船居然被他们修好了。于是，他们两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驾船逃出了集中营。患难与共，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了。老朋友相见，我们着实热闹了一番。当时，廖梦醒对人说：“我看邱茉莉和爱泼斯坦是不会偕老的。”事实上，尽管他们两人外表那么不相称，但几十年来两个人却一直相亲相爱，现在已是白头偕老了。

我在桂林时，还结交了一些外国朋友。驻桂林的英军服务处主任，是澳大利亚人赖亚德，他曾要我介绍一位懂中文和日文的人给他做秘书，我便介绍孙亚明同志去帮他的忙。驻桂林的美国副领事查理·苏维斯是美国波莫纳大学毕业生，算是校友，只是他比我晚十多年毕业。他需要一位中文秘书，我就介绍杨承芳同志去他那儿工作。此外，桂林英国新闻处负责人史密斯，美国新闻处主任格兰姆·派克，我也都很熟悉。我结识了这些人，就使我能经常去这些机关里看国外寄来的报刊。后来，他们还帮助我逃离桂林去了印度。



在桂林期间，我还利用合法的教授身份，向外国记者公开了廖承志同志被蒋介石秘密逮捕的消息。外国记者一报道，何香凝、宋庆龄就出面要人，国民党政府只好开释廖承志。事后，何香凝连夜画一枝老梅送给我，以表示感激之情。



流亡印度

1943年11月，桂林召开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大会。我邀请英国驻两广代理总领事班以安到会，报告英国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桂林的中共党员有许多人到会听班以安的报告。此事传到重庆后，惹起了麻烦。1944年3月，我的朋友陈此生忽然来到我家，约我次日去他家吃早餐。我到他家后，他立即拉我坐在台阶上说话。他告诉我，前天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接到重庆军委会来的密电，要逮捕我。因此，李济深厅长要他私下通知我，让我们夫妇设法立即离开桂林。

回家后，我马上告诉在重庆交通部工作的亲戚，用假名字给我和顾淑型办了去印度的护照，又在桂林找了铺保，简竹坚同志送给我600美金的旅费。我们很快乘英军服务处的军车离开桂林去昆明。到昆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张奚若先生；随即乘人力车去机场，搭英国军用飞机离开昆明，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我们很快从加尔各答到了新德里。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情报部在新德里设有分局，叫远东情报局。我进了远东情报局，具体的工作是编写新闻材料或电台讲稿，是供对外宣传用的。工作一段之后，我感到这里的工作很重要，就写信给在重庆的陈洪进同志，请他也来印度一道工作。不久，陈洪进夫妇来了。大战结束后，我去了美国，而陈洪进却留了下来，在华侨学院教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国。

初到印度，我们对这个佛国的历史很感兴趣。就说德里吧，在朱木拿河的两岸，南北相对地耸立着两座城市：一座高楼成群，一座寺庙林立，这就是新、旧两个德里。旧德里是莫卧儿王



朝第五代帝王沙杰罕建造的，新德里是1911年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建设的，1929年才建成。我们畅游德里，那举世闻名的泰姬陵，耸入云天的库杜布高塔，沙杰罕王的皇宫——红堡，都使我们流连忘返。德里的寺庙很多，有印度教的、佛教的、锡克教的和基督教的，还有众多的清真寺，这一切都显示出印度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到印度后，我一直想为《工业月刊》写一篇稿子，或讲印度工业之现状；或讲印度国内外财务对工业之影响；或评述最近印度工业家自拟之战后计划，但终因事忙而未能成文。直到1944年6月25日才抽空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信给在桂林的张锡昌同志，介绍印度的概况，以供诸位友人参考。

为了更方便地工作，我和淑型每天下午学习印度语，还准备学习乌尔都文（印地文）。

在远东情报局工作的同时，我还担任了德里大学的评卷员，结识了许多印度学者，与当时国大党的名学者马哈拉努比斯、尼赫鲁都有交往。我的住所，是英军用铅皮搭的棚子，当地人称做“板加罗”。棚子很矮，印度天气又十分炎热，十一二月还常有人住在室外，我却每天钻在棚子里翻阅英国皇家学会对印度调查的大量档案。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离开远东情报局，到印度史学会工作，参加了两次年会。1944年冬天，印度史学会在乌岱普开年会，我列席了这次年会，住在匹左拉湖畔腊奇普特首相之官舍，有幸游览了匹左拉湖。我曾写诗，记得最后几句是“乌岱普乎乌岱普！地富民贫成对比。安得甘地重降生，唤醒斯民造福祉！”1945年12月，印度史学会在白沙瓦开年会，我和德里大学史学系主任冠来希教授一同出席；会后，同游阿富汗边境开伯尔山口。在山口中乘火车行了一个半小时，次日做古诗以纪念。

（一）

陆行铁轨似长蛇，轰轰列车近朝霞。



一片苍翠夺我目，几阵香袭是野花。

(二)

流水潺潺急如呼，丘陵重叠无坦途。
此去逼近喀布尔，林鸟亦唱普什图。
八十年前称险隘，英俄对峙分胜败。
为防南下哥萨克，五里一库储军械。
埋弹如瓮存库前，备创敌人山口边。
于今火箭飞万里，俯笑地雷会长眠。

1945年12月21日

我发现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那么，印度的农村情况如何呢？于是，我利用在史学会工作的便利条件，开始对印度进行经济区域划分的考察。我走了许多地方，北到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信德，南到印度洋海岸，东到加尔各答，西至孟买，搜集积累了很多资料。

后来，我侨居美国期间，才有时间整理在印度调查农村经济的资料。我参考了1927—1928年英国出版的“皇家印度农业调查团证词”（共14巨册）等材料，制定出划分印巴经济区域的五项标准——第一是地形，山谷和平原在生产和生产关系上显然有些不同的地方；第二是水利，就是说包括雨量和灌溉。半沙漠地区和河流的三角洲地带就有很大的差别。第三是耕作方法和农作制度，这比前两项更为重要。大家都知道，棉花、烟草、黄麻等经济作物区和小麦、大米、杂粮等产粮区是大不相同的。第四是土地制度。这是区域化的一个关键。土地制度的差别表现在田赋制度、租佃制度和雇农制度等。因此，种植园多的阿萨姆区就和佃农多的孔坎区不同。最后还有第五个标准，那便是当地一般经济发展的情况。有的区域近代工业相当发达，有的就没有什么工矿企业，因此经济情况有明显的差别。根据以上五条标准，我将印巴地区划分为21个经济区，用英文写成《南亚农业区域》，于



1949年完稿。50年代初，出版界负责人陈原同志得知这部英文手稿，组织黄季方、曹婉如两同志译成中文。1959年，中文本《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30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英文本《南亚农业区域》在印度出版。1982年印度德里联合出版社分上下册重印此书，1983年，商务印书馆也重印了这部著作。



再次寓居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有三个地方向我发来邀请信。一个是在新加坡创办出版社的英国朋友，请我去做编辑工作；第二个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请我去当教授；第三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请我去任课。我权衡了一下，觉得自己对美国比较熟悉，便于工作，因此接受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邀请。1946年4月，我与顾淑型离开印度，奔赴美国西海岸，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做特约教授，讲授印度史。后来，我又应邀到约翰·哈近大学、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亚洲研究所讲课，同时做研究工作。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猖狂反共反人民。我应邀返回母校波莫纳大学做了四周的演讲，讲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后来我又去过华盛顿州、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发表演讲。我用英语讲，一般不用稿子，这样美国人容易接受。我对他们说，美国政府如果援蒋反共，就是走进了死胡同，就是以全中国人民为敌。我告诉他们，在中国搞土地改革，推翻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大家赞成的，我陈翰笙赞成，中国的高级和中小知识分子也都赞成。与此同时，我还写了几篇文章，揭露蒋介石政权的封建腐朽性。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46年10月发表的《中国官僚资本与内战》，文中指出：“中国的政府垄断企业不能与现代国家资本相提并论。它的商业性质多于工业性质，它集中在高级军官、文职官员、政客、地方军阀手中。他们的存在依靠独裁政治和外国援助，并且阻碍中国自由经济的增长。”“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趋势，一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地区里已经开始发展前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的趋势；另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显著的趋势是国民党地区的前



资本主义的、买办性的、由军事独裁所统治的政府垄断企业。它所依靠的是：政府垄断、一党专政、外国援助。中国目前的内战是这两种经济趋势、两种原则的斗争。”

到美国后，我与国内的党组织也一直保持着联系。1946年刚到美国不久，我接到一个秘密通知，由周恩来和廖承志同志签名，要求我与美国共产党联系。通过共产党党员，我很快见到了美共总书记福斯特。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关系。

40年代，国民党驻美大使是胡适，我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相识了。在美国时，一次我去纽约办事，顺便去拜访他。胡适租了一套很华丽的公寓，房子很大。我一进大门，见到房门外放着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放一大摞电话号码簿、报纸，旁边还有一个本子，这是预备主人不在家时，客人留言用的。奇怪的是留言簿上方的墙上挂着博士帽和博士服。我知道胡适向来喜欢自己做广告，是个很注重名声的人，心里感到很可笑。这时，胡适从房里迎出来，连说：“翰笙，久违了！”我也拱拱手，随即指着挂在墙上的衣帽故意问：“适之，把这个挂在这里干什么？”胡适的脸腾地红了，很是尴尬，连说：“我忘记拿进来了。”

1946年9月，冯玉祥将军被迫退伍、来美国“考察”水利。不久，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反对祸国殃民的蒋介石。他在美国演讲，揭发蒋介石独裁统治。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华侨日报》的支持下开展的。我去看望冯将军，请他们夫妇吃饭，与他们谈话，做他们的工作。冯将军送我一幅自己画的雄鸡和一副对联。可惜由美国途中全遗失了。1947年，有一次冯玉祥对我说要去华盛顿看望马歇尔将军，并说马歇尔在华时，他们很熟悉。我知道，冯将军找马歇尔去不过是个借口，他是要设法归国。不久，杨刚来找我，说在香港的章汉夫来信了，责备我不该同意冯玉祥去找马歇尔。我想章汉夫是怕冯玉祥与马歇尔搞第三势力，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冯玉祥夫妇摆脱掉特务的监视，终于与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



联系上了，并由潘友新为他们安排船只，以绕道苏联回国。不幸，冯将军在去苏途中遇难。

1947年冬天，国内解放战争形势大好，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消息传来，深受鼓舞的中国留美科技人员组织了“建社”，准备动员爱国的科技人员回国参加解放区的建设。在一次“建社”组织的座谈会上，我谈解放后的中国将采取的生产方式、建设步骤、建设资金来源等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来源，一不能象资本主义初期那样搞原始积累，二不能靠帝国主义的恩赐，三不能靠出卖自己的领土和主权，而只能靠自己发展工农业生产，搞好城乡的流通和分配，以加快资金的周转。



返回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各行各业的干部和专家。1950年，有人带信儿给我，说周恩来总理希望我回国工作。当时，顾淑型正在进修音乐，国外条件要比国内好得多。因而，许多外国朋友劝我们夫妇继续留在美国。但我们说服朋友们，排除了一切阻力，绕道欧洲返回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我们的行李、书籍等是从纽约直接运往天津的，在台湾附近被蒋匪帮劫到基隆去了，致使我在国外的许多书籍、参考资料丧失殆尽，美航公司只赔2000块美金，就算了事。章汉夫闻讯连说：“可惜了，我们外交部需要这批资料！”

我是1951年1月31日到达北京的，乔冠华、龚澎等许多人去车站接我们。

周恩来总理设宴为我们夫妇洗尘，乔冠华、章汉夫、李克农、陆定一都参加了宴会。周总理说，他是兼任外交部部长，工作很忙，想请我帮他的忙，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我无意做领导工作，就对周总理说：“总理啊，您今天请客是用中餐还是西餐？吃中餐要用筷子，吃西餐要用刀叉，我是个筷子料，请不要把我当刀叉使。还是让我去做点研究工作吧。”中宣部长陆定一对我讲：“要么你到北大做副校长，帮马寅初的忙。”我也推掉了。后来去上海，我专门拜访了马寅初，说明我不是不愿意帮他的忙，因为我是一个不善于办事的人。

大约是3月底，宋庆龄让我和顾淑型到她方巾巷的住处吃饭。几年不见了，我们很想看看孙夫人，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没料到周总理也去了。原来，周总理曾对宋庆龄讲，要办个对外宣传的英文杂志，请她推荐个合适的人。孙夫人说：“陈友仁本



来要找陈翰笙办报的，就用他好了。”见面后，周总理对我说起办杂志的事，我说那要有一批人，让金仲华打头，我可以帮忙。于是，我去上海找金仲华，要他率头办报，做编委会主任，我做副主任，并在上海解决印刷问题。我们就筹办起《中国建设》来。

在上海，恰碰上饶漱石和他的夫人陆臻请客。饶漱石当时是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他请了宋庆龄和我们夫妇。我去赴宴，没进门就碰上潘汉年了，自从1936年在苏联见到他后，这十几年一直没见过他，不过我与他的哥哥潘梓年是比较熟悉的。潘汉年问我：“办杂志，你为什么不做主任，而让金仲华去做呢？”我说：“金仲华一直是办报的呀，办杂志比我强。”

我回国不久，去文联看曹禺，看到书柜上放着骨灰盒，曹禺告诉我，这是史沫特莱的。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后，史沫特莱决心再来中国。1950年春天，她抱病从纽约经伦敦来我国，不幸胃溃疡症发作，经医治无效，于5月4日病逝于伦敦牛津医院。她的骨灰盒于1951年2月13日运到北京，杨刚、范长江、龚澎等去迎接的。后来，我和曹禺等8人，将史沫特莱的骨灰葬入西郊革命公墓。



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缅访问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应印度、缅甸两国政府的邀请，派文化代表团赴印缅访问。我也是文化代表团的团员。对于缅甸、印度，我并不陌生。1939年10月，我到云南的西双版纳调查傣族的土地制度。一个月后返回时，我从腊戍转赴上缅甸，再乘车去仰光。在仰光盘桓数日，游览仰光名胜古迹，也见到过一些印度难民。我于1944年从国内避难到印度，留印两年之久，到过德里、加尔各答、孟买、浦那、马德拉斯、海得拉巴、别康纳、刺霍等许多地方。

赴印缅中国文化代表团于1951年9月20日从北京站出发。代表团共15人，团长丁西林，其余为李一氓、刘白羽、郑振铎、季羨林、冯友兰、钱伟长、叶丁易、张骏祥、狄超白、吴作人、常书鸿、周小燕、倪斐君。另有工作人员6人，顾淑型是作为工作人员随访的。

9月24日，代表团到广州，住进沙面胜利大厦。10月1日，全体团员赴越秀山体育馆参加国庆典礼，参加庆典的约有数万人，大会主席是叶剑英。晚上，省、市政府在迎宾馆设宴招待。我同叶剑英坐在一起，谈了许多。参加宴会的苏联海军、空军顾问、总领事等都讲了话。尽欢而散。

10月7日，我们上“胜高刺”（Sangola）船。这是艘英国船，8700吨，头、二等舱只有33个人。上午11时3刻开行，一路天气良好。10日可以遥望越南海岸和沿海各岛屿；11日下午即到新加坡港中停泊。在新加坡码头有很多人上船，男女老少，形形色色，有印度人、尼泊尔人、土生华侨；有穿裙子的缅甸人，有戴长帽的阿拉伯人；有做工的马来亚人，也有经商的锡兰（斯里



研究所、难民收容所等处。代表团所到之处，印度人民以鲜花铺路，并将一个个花环套在我们的脖子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友好。

11月4日，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在新德里开幕，后来又去孟买、加尔各答展出。展品有敦煌壁画（复制品）、新中国的摄影和木刻、近代中国艺术家绘画三个部分。开幕时，尼赫鲁总理致辞，潘尼迦携妻女参加。展览会在加尔各答展出时，参观的人数最多，第一天开幕就到8000人，第二天12000人，第三天竟达两万多人，人数之多，远超过德里和孟买。

印度地广人稠、历史悠久，中国文化代表团要参观的地方很多，于是就分为文物和科技两组分头参观。我随文物组参观、游览。我在1944年至1946年在印度期间去过印度的许多地方，这次随代表团参观，不过是旧地重游吧。

到印度的第二天，我们就去谒拜甘地陵，献上鲜花。甘地是印度人民尊敬的领袖、著名的民族主义者，被尊称为“国父”。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许多大城市塑有甘地像，供人们瞻仰。红堡在旧德里，是莫卧儿帝国的王宫。我们看到王宫城堡和内部的亭台楼阁都是用红沙石砌成的，呈红色。我们参观了拉合尔门、奏乐阁、觐见宫、娱乐宫、枢密宫、国王的寝宫、祈祷室等，这些建筑物也甚坚固、雄伟，但其气势较我国的故宫就逊色多了。

印度是个宗教盛行、寺庙林立的国度，我们也参观了许多寺庙。在旧德里，我们参观了一座印度最大的清真寺，据介绍，这是莫卧儿帝国第五代帝王沙杰罕动用5000名工人，花了6年的时间建成的。300多年来，大清真寺是印度历史的见证人。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时，英国殖民者下令封闭大清真寺，并说要炸毁它，德里人民集资20万卢比，才从殖民者手中赎回了它。

我们到海得拉巴邦海得拉巴市参观时，那里举行了海得拉巴印中友好联盟成立大会，由奥斯曼尼亚大学副校长那瓦勃·荣担任主席。奥斯曼尼亚大学还授予丁西林团长名誉法学博士。我们



又去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县埃洛拉村附近的石窟中去参观石刻，这里有34个山洞，都开凿于2世纪至8世纪，只有最后5个耆那教山洞是8世纪至10世纪的建筑物。据说，34洞所挖出的石头达300万英尺，足见工程之伟大。这34洞中，印度教占17个，佛教占12个，耆那教5个。洞洞有不同之图样及设计，可谓世界独一无二的古代石刻大陈列。据说唐玄奘到印度取经曾来过这里。

在印度最负有盛名的是阿旃陀石窟，它位于海得拉巴省的温德亚山中，大约开凿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分布于一个新月形的悬崖上，共29个。这是印度古代佛教的一个圣地，保存了大量的以佛教为题材的精细的雕刻和优美的绘画。我们看了5个山洞，其中第16山洞为玄奘乘小船登岸的地方。唐玄奘在他的游记中对阿旃陀做了简要的描述。

我们还参观了印度佛教圣地萨尔纳兹，古名鹿野苑，看到阿育王的石柱。石柱由整块岩石雕刻成，高30多英尺，柱头雕刻着虎狮及象马等像，极其生动精致。鹿野苑建于公元前2世纪，5世纪改建，11世纪曾修缮过。我国的名僧法显和唐僧都到过这里并记述了它。这附近有7世纪时掘的井，其水仍可饮用。井的附近有博物馆，收藏古代雕刻之石块甚多，这对研究古代印度史非常可贵。萨尔纳兹有两座佛庙，内均住有和尚。这两个庙，一为戴季陶1940年所筑的中国庙宇，一为日本人用缅甸所捐之钱而建成的佛寺。

在莫卧儿王朝的故都亚格拉有并列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泰姬陵。这是沙杰罕为他的亡后玛哈尔建筑的陵园。这个工程用工两万人、经过20年，耗资4000万卢比才建成。泰姬陵完全用白色大理石建造，不仅外观雄伟壮丽，而且寝宫内的墙壁上都用翡翠、水晶、玛瑙、珊瑚和红绿宝石镶嵌着色彩艳丽的藤蔓花朵。面对如此奢华的后妃陵，我很有感触，遂赋五律一首：沙后穹窿墓，萧萧枫树风。红砂张翼殿，白塔卫幽宫。池水滔滔逝，岚云



霭霭笼。斯陵工费巨，咏叹古今同。

在回程中，我们又访问了加尔各答，有幸会见了印度古代史权威、加尔各答大学古代历史文化系主任赫曲特利教授，他著有《印度古代政治史》。我去拜访了印度中古史研究的泰斗萨卡教授，他已是82岁的老人，但身体健康、神采奕奕，而且视听灵敏，胃口也很好。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莫卧儿王朝行政制度》、《奥朗则布的历史》、《暮年的莫卧儿》和《莫卧儿帝国的没落》等。

在印度期间，我会见了许多人，有一些人是我过去在印度时认识的老朋友。我遇到德里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达司古帕塔。他一见到我，就提起我1944年在图书馆读书的事。他说，那时图书馆藏书4万本，现在已经添置到62000本了。在海得拉巴邦参观时，一天忽然有一位印度朋友来看我，他叫瑟詹·莱尔，是我1945年认识的一位史学界朋友。他还在奥斯曼尼亚大学任教，讲授印度中古史。他将一本刚发行不久的、自己编写的《德干史研究》赠送给我，书中有12篇史学文章。另外，在亚洲问题会及印度世界问题研究会合组的欢迎大会上，我还遇到旧友阿柏多拉，几天后，他请我和淑型吃晚饭。

从接触中，我感到有许多印度人渴望了解中国，我同狄超白、李一氓去德里大学德里经济研究所，与印度的研究人员开座谈会时，到会20多名研究生和8名研究员，他们提出八九个问题，都是关于新中国的工农业和银行方面的事。在外出参观途中，曾遇到一位年老的锡克教徒问我：“印度何时可以象新中国一样呢？”我说：“现在印度独立了，也是新印度了。”但他却回答说：“我们却还是象在蒋介石时代一样呢！”由于有印度外交部的人在身边，我没有再说什么。在孟买省的一次宴会上，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年妇女主动与我攀谈。她讲自己办了一个双月刊，自己做编辑，提倡成人教育。此双月刊已出版12年了，她提出愿意与新中国搞文化交流。11月27日，我们在马德拉斯州参观。



时，在州长的茶话会上，我遇到的三个人都对新中国感兴趣。一位是印度中央政府劳工部的，一位是本地的律师。还有一位是个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她曾在北京大学留学二年，能讲些中国话，她的中文名字叫“欧辩才”。她爱好并学习过中国美术，能画山水。她与吴作人谈了很久，多讲中国有代表性的画家。另外，由于唐玄奘到印度取过经，印度人对他更有兴趣，我就碰到一个人问我要英文版的玄奘游记；另一位大学历史教授则问我玄奘是否有亲笔遗迹留存于中国。

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中国代表团是友好的，他设宴招待我们，亲自去展览会剪彩、讲话；我们在印度期间，恰逢他62岁寿辰（11月14日），代表团致电新德里表示祝贺。但有一件事，也可能引起尼赫鲁的不愉快。11月26日中午，我们正在特里凡得琅参观，尼赫鲁从柯钦来到这里的国宾馆，与我们共进午餐，谈了大约45分钟。他是出来做竞选演说的，下午要出发去科摩林角。他的随行人员纳都要我们同他们一道去科摩林角参加群众大会，听尼赫鲁演讲。我们拒绝了这种要求，说我们不能去参加会，以免人家说我们有参预内政之嫌疑。纳都不大高兴。下午两点半钟尼赫鲁出发时，纳都又来要求我们到门口送行，我们也没有去，因为事先没有说明或通知，而且也无此礼节。

经过40天的访问、参观，代表团于12月9日满载印度人民的深情厚意离开加尔各答，前往缅甸做正式访问，前番只是路过。

到仰光机场迎接我文化代表团的缅甸官方人士不多，只有外交部常务秘书宇吞盛及司礼官等，主要是华侨，人数达7000多，他们高奏中国国歌，大唱中国歌曲，情绪十分高昂。我们先赴总统府登记，然后赴海滨旅馆住下，我与淑型住楼上203号。晚上，缅甸外交部长苏昆雀在其住宅举行招待会欢迎我文化代表团。在招待会上遇到三位华侨新闻记者：《中国日报》编辑陈兰生，在仰光已呆20余年；现任《新仰光日报》总编辑吴章彬，他于1946年曾在加尔各答做编辑；《人民日报》记者何炳森。



2月11日，我们去缅甸总统府，拜访总统萧恢塔。他是掸邦土司出身，幼年曾到过我国云南、广西、广东，会讲云南话。其老家在打洛附近，即缅甸与佛海交界处，自称现有亲戚在国境两边。他穿一身灰色秋季西装，戴淡红色领带，上衣口袋中露出一块深红色手帕，手上戴金戒指，再加上一副黑边眼镜，其举动言语宛如费孝通。萧恢塔很健谈，如果丁团长不起身告辞，还会继续谈下去。我们告辞后即去参观总统府，见到从瓦城运来的缅王金色宝座及一条银丝织成的地毯。据说，这条地毯是1948年英国人归还给缅甸政府，当年它曾是缅王缅后使用的。

“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在缅甸大金塔路“银禧纪念堂”开幕，缅甸宣传部长字吞帕主持并演讲。展览厅楼下展出新中国图片370幅，楼上有手工艺品、敦煌壁画摹本数百幅。开幕当天有5000多人到场参观。后来，展览会又移到曼德勒举行。

在缅甸，我们也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对缅甸的社会、经济、文化有了不少了解。

缅甸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家，佛教徒占80%以上，佛教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大，信教的男子都要出家当一次和尚，哪怕只当几天也行，因而在缅甸随处可见和尚。佛教徒都相信造塔功德最大，所以无论穷乡僻壤，还是城中闹市，到处可见寺庙和佛塔，因而缅甸有“塔国”之称。

我们首先去参观了仰光大金塔，亦称瑞光大金塔。大金塔座落在丁固达拉山冈上，遥对伊洛瓦底江。它建于公元前580年，由于乌迦罗婆的两个兄弟向佛陀求得四根佛发，故筑龛建塔收藏之。塔原高仅27英尺，经历代得楞族酋长和缅王的修筑，现已达326英尺高。塔顶钻石宝伞是1871年缅王曼同献的。这宝伞在当时已值600万罗比。塔内的历史纪念物有1778年缅王贻角牙（申居）所献的巨钟，重16吨；1841年缅王孟坑（沙洛瓦地）献的巨钟，重40吨。

大金塔东门有一个寺院，内供着三尊佛，为大金塔内最古的



塔基。北门有一棵菩提树，是1948年缅甸独立节印度赠送的，由缅总统苏瑞泰栽植。南门有一幢中国式庙宇，是华侨献建的。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太后献送的大藏经，现尚保存于东门外中国佛学院藏经楼。1939年12月，蒋介石政府献了一个银质舍利宝塔，派太虚法师送往仰光。华侨见其刻工粗劣，恐为缅人轻视，遂雇工连夜改制，后亦供奉在大光塔上。1824年5月12日仰光被英军占领时，缅甸曾据塔抵抗。1930年3月，此塔才重新开放，西门外一带亭院是那年失火烧的，今已重建，我亲眼见到以钢筋水泥重建此塔的情形，重建的部分带有欧化色彩。

我们从大金塔出来，瞻仰了附近的烈士墓，向1947年7月19日遇难的缅甸救国英雄昂山和同时遇难的部长们献上鲜花。之后，我又在宇巴雀墓前鞠躬致意，他是当年的宣传部长。我在1940年5月与宇巴雀相识，那时他是《里笃日报》的总编辑，我曾在编辑部楼上见到过他的老母、夫人及两个女儿。后来，我们代表团在大使馆举行告别宴会时我曾见到昂山的兄弟宇翁丹。他在头天的议会中提议，要缅甸政府和解放区武装力量讲和，但以寡不敌众而未被通过。他问我官僚资本及民族资本有什么不同，又问我中国何时能够进入社会主义。

文化代表团参观了仰光大学。仰光大学的一部分校舍已被日军焚毁，日军、英军先后都在校内住过，校内设施被毁坏、抢掠一空。经过4年的时间，毁坏的校舍已重建、恢复了十之七八。校内现有学生800余人，教员18人。历史系只有三门功课：日本近代史、缅甸近代史和缅甸专题。史学系主任是吴巴奈吞，担任世界通史；羌太博士担任缅甸史，他曾在伦敦大学留学。另外，还有都海塞思，这是1945年我在新德里的同事。

在缅甸期间，我们还去曼德勒参观，它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华侨称它为瓦城，由缅甸古都阿瓦而称之，原为Ratanahon，意即“万宝之城”。后因附近有曼德勒山，又称为曼德勒。此地是全国中心点，水陆交通便利，可以北控掸邦，南俯下缅甸，附山



带水，形势险要。瓦城1857年5月13日奠基，据说是中国人给缅甸王设计的，13座城楼都做塔阁式。城内建成王宫，1885年被英军占领而做为军用，禁城和木栅栏被英军拆毁，只留下王宫大殿、望塔等建筑。1940年我游仰光及曼德勒时，曾来此参观过。如今连王宫也看不见了，原来，1945年英军反击日军时，将王宫全部炸毁。现在禁城为缅军驻扎，不能进去游览了。

我们从机场到瓦城市内，先参观菩耶祇大佛塔，又称为摩诃牟尼寺塔，塔内有大佛一尊，满身金饰。1884年大火，寺被焚而佛像幸免于难。1941年5月3日，日本飞机轰炸瓦城，塔旁的一部分寺院被焚，塔身亦被熏黑。由于瓦城久做帝都，因此成为缅甸文化的中心。缅人常说：“毛淡棉打敏，曼德勒沙卡”，意思是毛淡棉的妇女衣着整齐而风度可人；曼德勒妇女说话都很文雅。曼德勒人士的生活和文化修养确实优于其他缅甸。曼德勒山在城之西北，中国人称为小眉山，相传明代征缅大军曾驻兵山下。山高954英尺，在山顶可望全城，遥观伊洛瓦底江的帆船及远山的塔光，令人神驰。

从山上下来，我们又去参观了山下的三个佛塔。一座是古托都（鸠娑陶）塔，塔内藏有729块石碑，刻有全部的上座部佛教《三藏》，此为巴利文（巴利语为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最大的佛经，研究佛学者皆视为珍宝。另一座为觉都苓塔，入塔时需经过一条长廊，长廊是1859年的建筑物，在此曾举行过巴利文佛学考试。塔是缅甸王曼同于1853~1878年间完成的。寺院正中、佛塔之下有一尊大佛，是由一整块大理石雕成的，周围陈列的80尊罗汉也是由大理石雕成的。1865年大佛小佛全部雕成后，曾举行盛会庆祝，缅甸王曼同亲自到场。现在此寺内每年月圆之日举行一次香会，来者众多，十分热闹。第三座塔是蒲甘王阿隆悉都的儿子弥辛修建筑的，寺内木刻甚多，有一处表现王宫内大家听说佛法的情形，均为木雕，使我大有“石刻印度、木刻缅甸”之慨。

我们还参观了曼德勒大学，与师生开了座谈会；出席了缅甸



作家举行的招待会。12月19日，我们泛游伊洛瓦底江，轮船向下游行驶10英里后，过实皆抵大桥。实皆附近风景良佳，山上一望尽是宝塔，多为白色；山坡亦多山洞，洞中所藏石碑甚可宝贵。据说，从曼德勒到八莫一段江中，抗战时期及1948年革命中共沉轮船不下400艘；而仰光港内亦沉了40余艘。在江面上常常会见到露出水面的轮船顶端。

缅甸也是华侨很多的国家之一，至今仍有几十万华侨。12月13日，仰光华商商会、全缅兴商总会和仰光门市公会等三个侨民团体在“香港酒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宴会上，我遇到一位缅甸大理院的推事吴太孟。据他说，仰光1940年时有40万人口，现已增至70万人，其中1/3为印度人，华侨大约7万人。在仰光有三种华人报纸，《中华商报》销5000份，《中国日报》销2000份，《人民报》销1200份。仰光有三所中学，均系华侨所办，另外还有南洋师范、中华公学等。华侨中学教务主任陈白澄系1927年北京大学毕业生，现任仰光民盟支部主席。此外，素有南掸花园之称的掸邦首府东枝有人口16000人，华侨多达1400人，其中福建人700，广东人400，云南人300。我们到达该地时，在汽车站迎接我们的不下千人。该地有华侨工商协进会，会长为徐振邦。华侨陈协彭开设电影院一所，可容800人；华侨体育会会长陈荣捷，是陈协彭之子。陈协彭曾组织400人的欢迎会接待我代表团。我们在东枝电影院连放三场电影《中华民族大团结》，仍满足不了要求，只好在草地广场加放一场，四场观众达7000多人。许多缅甸人说，英美只有军事代表团来，而新中国则派文化代表团来，毕竟有很大不同。

在友好访问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使我们对缅甸的社会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由于美资援缅，就涌来不少美国的技师和顾问，造成了缅甸的房荒。曾任驻北京大使的字敏登在返回仰光后就找不到住房，只好先住在兄弟家中。后来费尽周折，才找到一所空房，搬进细软，还未来得及购置家具，家中就失盗，这一



则证明仰光小偷不少，二则是由于民间传说宇敏登在北京发了笔小财。

上缅甸有一著名人士宇腊，40岁左右，无党无派。他早年留学英国，现主编缅文《人民日报》，任上缅甸文联主席。他宣传要求世界和平，对新中国非常赞同。听说他不久前来仰光，送给缅甸总理德钦努一幅和平鸽画。宇腊还给德钦努讲了个故事，具有讽刺意思：宇腊说，我做了一个梦，甚合缅甸传说故事：一个缅甸农民在地下挖到一块宝石，卖给商人，得价500盾而大悦；商人又卖予一外国人，其价一千盾；嗣后外国人在国外再售此宝而得五万盾。农人闻之，非常懊丧。其意在讥笑缅总理廉价出卖民族利益也。

我们在仰光“舞台银幕联合会”看了一部缅甸片《他的爱》，描写一位不道德的医生，行医时专门调戏妇女。村上有一个贫家女和一个富家女，爱上同一个农民。农民爱富家女而不爱贫家女。天时不好，五谷不收，农民不得不外出谋生。富翁将其女嫁给医生。婚后，医生弃妻而与相好的私奔仰光。富家女亦离村，路遇农民病倒在一茅舍中，二人话旧，十分感慨。但此时贫家女赶来，农民与贫家女结婚。此片组织极坏，思想非常混乱。亦可见缅甸文化程度之一斑！

在缅甸，我也有幸遇到一些老朋友。12月12日，我大使馆为我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举行招待会，来宾达1200多人，会后放映《中华民族大团结》。看电影时，我和淑型与萨诺瓦兹、多米塞、赛恩佩依坐在一起，我们5人均于1944年~1945年时在新德里英国远东情报局同事。今日能在一起看电影，亦属难得之机缘。12月16日，我们访问高老时，由朋友吴巴沃帮助接通了东枝的电话，得以与索赛孟夫人谈了5分钟话。她也是1944年我在新德里时的同事。得知她近几年写了两本英文书，一本讲缅甸的风俗，一本讲上缅甸的史地。

12月22日，印度外交部打电报到我驻缅大使馆，邀请我去参



加本年度印度政治学会年会。由于开会日期为12月27日，而我团访问缅甸的行程尚未结束，故复电印度外交部婉辞。

我们访问至12月28日结束，乘“新地亚”号轮船离仰光，12月31日达槟榔屿。去年元旦，在由莫斯科经西伯利亚返国途中，与淑型在火车上同饮香槟酒，今晚则在印度洋的海上，与淑型吃西瓜，南北相去甚远也！1952年1月13日，我文化代表团回到广州，听说国内正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1月15日，我与淑型去爱群饭店访问简竹坚。1月20日简竹坚乘胜利大厦来看我们，并还照相机一架，这是我们1941年离香港时存放在她的寓所中的。

这次出访，历时几至4个月，行程共计2500英里，所见印缅两国人民不下五万，其感想、收获也很多。

访问回来后，我写了一篇《50年来印度的史学界》，向国内朋友介绍印度史学上存在的问题和印度史的研究概况。我认为应当重视印度史的研究，因为研究印度史可以完成双重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联合印度保障世界和平；一是科学的使命——更精细地了解社会发展的过程。这篇文章登载在《新建设》月刊3月号上。还写了一篇《中国和印度紧密联系起来》，登在上海出版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上。2月27日，我去上海与金仲华等人协商《中国建设》双月刊事，同时与特利萨·戈拉克商议推销此双月刊事。3月7日晨返回北京，10日写了一篇文章《土地改革根除了封建制度》，登在《中国建设》双月刊第3期上。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1952年4月份，莫斯科举行国际经济会议，3月15日中国代表团组成。团长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秘书长冀朝鼎，团员有卢绪章、孟用潜、刘子文、章乃器、荣毅仁、狄超白等25人。我是中国经济学会副主任委员，故为代表团成员。另有工作人员23人。

当日午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政务院西花厅召集代表团团员们谈话。他谈了以下几点：①国际局势紧张是美帝故意造成的，我方应针锋相对冲破紧张局面，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即此策略的一部分；②美英帝国主义封锁我贸易，要凭借大家的努力，造成国际自由贸易，以打击这个封锁政策；③我方应将联合战线扩大到国际，联络各国民族资本家、工商业者以推进正常的贸易；④我方要和人家做生意；⑤会议后可以采取下列方式与人家联络：双方直接订定一批贸易、用转口办法做些生意、订立长期贸易协议、互派代表团调查商情、请人家来我国参观等等。

18日，中国代表团离京，郭沫若、陈叔通、黄炎培、陶孟和等来车站送行。20日到达满洲里。苏联派5个人来边境的奥特勒格迎接我们，并将陪我们去莫斯科。据说，我代表团40人自满洲里到莫斯科7日间，苏联方面共拨出8万卢布为招待费。其中5万卢布为车票费，5000卢布为运行李费，而那25000卢布都花在伙食上了。27日，车到雅罗斯拉夫尔，张闻天大使、沙千里、戈宝权及国际经济会议筹备会的人前来迎接。到莫斯科后，我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大旅馆。而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均住在高尔基大街的苏维埃大旅馆。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英法荷等国人也住在此处。



大会召开之前，代表团集会，由雷任民、卢绪章报告最近世界市场状况。他们说，目前大豆、小麦等农产品价格有下跌的趋势，原因是美国出口大批抛出油脂和大豆。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或是由于囤积过多，不得不抛出，或是故意抛出，在国际经济会议期间打击中国的出口。此外，我们还讨论了中国代表团组织工作事宜。大会拟分三组进行讨论，我们也要将人马分为三批，以便同时出席各讨论会。三组讨论的内容分别为：第一组讨论贸易问题，第二组讨论社会经济，第三组讨论未充分发展地区的经济。我参加了第三组。

3月30日，代表团全体团员去红场瞻仰列宁遗容，并献了花圈。见列宁面色如生，右手握着，左手摊开，脸上的胡子好象刚刚刮过。记得1927年我到这里来参观时，情形同今天一样。我们又看了红墙下的各墓碑，有片山潜的，克拉拉·蔡特金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等等。另一排则为革命烈士公墓。

大会原定4月1日开幕，后推迟到4月3日。那几天我们一方面讨论、准备大会的发言稿，一面注意商情报告。张闻天大使说，在第三组发言时，最好避免用“经济独立，贸易自立”，而代之以“铲除人为阻挠，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我同卢绪章负责翻译关于世界油脂市场的德文商情报告。我代表团还在苏维埃旅馆举办中国特产展览，计有茶、药、畜产、羽、皮、丝、地毯、刺绣、牙雕、景泰蓝、雕漆等600件商品。

4月3日下午，国际经济会议开幕。会议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由国际经济筹委会秘书长、法国人香贝朗主持，苏维埃主席雅斯诺夫致欢迎辞。到会的有42个国家的350多名代表，列席者亦近300人。

4月4日，开始大会发言。法国、波兰、美国、中国、奥地利和捷克的代表先后发言。美国发言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纺织机械工业家维克利。他说，今天42国人坐在一起要谈事实，不讲理论，两个经济系统是可以并存的。今日军备扩张实已十分危险，我们



要在精神上及物质上设法复兴，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战争，才可以恢复和平空气。他又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给自足，苏联和美国得天独厚，应当与世界各国共同享受才对。我代表团团长南汉宸讲话，谴责了美国破坏和平的罪行，也谈到了中国的和平建设。

4月5日，大会继续进行，英、东德、芬兰、苏等国代表发言。意大利代表指出，国际贸易应该分工合作。今天各国贫富的悬殊，亟须有国际贸易来使它平均一下。不要一面有豪奢的国家，一面有极穷的国家。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赛扬代表世界工联8000万会员发言，提出取消政治歧视措施，削减军费，将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等四项建议。

4月7日，分三个小组开会，我与南汉宸、王寅生等参加第三组，即经济发展迟缓国家问题小组。我在会上发言，主要强调中国愿意和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我们认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际贸易，对于改善发展迟缓国家的经济情势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着极大的作用。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大家共同努力，以解除国际贸易与人民生活必需品在交换上的障碍，让各国的输出品能够卖给出合理价格的主顾，而不是被迫以低价出售；同时让各国输入合理价格的并为本国所需要的货物，而不是被迫输入垄断价格的以至不需要的货物……”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代表发言，谴责美国操纵垄断他们国家的贸易。

大会4月12日结束，会议通过了一个组织国际贸易促进会的议案。并立即组成由各国商会会长、工业家、银行家、公司经理等36个人参加的国际贸促会，我代表团电告北京，决定由南汉宸、冀朝鼎参加该组织。

会议期间，我们广交朋友，与许多国家的代表谈话，协商生意。据一位东德商人讲，他的公司在瑞典、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地均有分店，愿意恢复远东方面的贸易。他还说，西德也有许



多商人及工厂主愿意与中国做生意，但他们怕美国压他们，只好想出各种办法做转口生意。4月3日上午，英国和法国代表来找我们谈大豆、桐油的出口问题。另外英国人表示愿意卖给我们火车头，但须三年才能交货，法国人表示对我国的茶业感兴趣。下午意大利商人又来谈输入中国手工艺品。仅4月6日一天，我代表团就有12个大小约会，我参加了四个。还有一些人也提到了愿与中国贸易，如印尼的一位汽车公司经理，要与中国做大米生意；孟买的纸商，要进口中国纸张；英国人提出要将它的纺织品运到中国来换取煤炭，对于大豆、猪鬃，他们也甚需要。7日，中国与英国达成贸易协议，双方同意当年进行每方一千万英镑的贸易。

我们在会议间歇时，举行多次茶话会，分别邀请印度、缅甸、中南美洲和英国等代表参加，茶话会气氛极为融洽，南汉宸团长指着印度团长的胡子说：“你有胡子，我们没有，但这不会阻碍我们的友谊么！”

苏联方面为与会代表安排了一些参观活动。4月8日下午，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看了两座15世纪建筑的教堂、沙皇的住所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厅、大舞厅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舞厅中的六个大吊灯，据说每个吊灯1380公斤，真是富丽堂皇、气象万千。11日，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工厂，这个厂很大，有5万多工人，女工占6/10~7/10，此厂每5分钟就能装配一辆汽车。后来，我们又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学校有12000多学生，其中史学系有1300人，史学系学制5年。第一年学习苏联古代到18世纪的历史、东方古代奴隶社会史，古代希腊、罗马史，考古学，人类学等；第二年学习苏联近代史、古代东方史，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第三年学习苏联现代史、东方近代史和斯拉夫人民史等；第四年学习国别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史等，最后一年为专题研究、理论学习，撰写论文、答辩、参加结业考试等。据介绍，苏联的史学仍以三国以前为中国的奴隶社会。

4月18日，应莫斯科广播电台邀请，我到电台第四播音室讲



了7分钟话，题目是“为什么开了国际经济会议”。孟用潜、狄超白二人亦做了广播讲话，前者以中国合作社为题，后者谈了参观莫斯科农耕机器展览会的感想。在莫斯科等飞机的几天里，我起草了关于这次国际经济会议的报告。

22日（星期二）代表团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国，24日下午2时到北京，5时已坐在兴盛胡同9号重工业部招待所里与印、缅、法国客人共品香茶，顺手写一小诗以记之：“星二晨曦别红场，飞腾乌拉天仙似，俯视蒙原疑云海，茶话星四兴盛时。”



和平使者

由于我无意做官，领导上安排我做外交部顾问和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因此，迎送往来，出国访问等外事活动比较多。

《中国建设》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已于1952年初创刊。我请新华社天津分社的记者李伯悌（我们是在美国相识的）调到北京，帮助我办这个对外宣传的杂志。一开始，我们连个办事的地方都没有，创刊号是我与宋庆龄、李伯悌在北京一个公园的长凳上草拟的。《中国建设》英文双月刊开始出版时，只有6名工作人员，李伯悌是记者，爱泼斯坦为执行编辑，邱茉莉管印刷，顾淑型是美术设计。第一届编委会成员有金仲华、钱端升、李德全、刘鸿生、吴贻芳、吴耀宗和我。编辑部人少，办事可不少，要负责组稿、撰稿、翻译、通讯联络、图片、设计和校对等等。杂志在北京编译，而出版发行则在上海，因而还要有两个人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以保证每期杂志准时出版。那时，杂志草创，要保证质量，因此几乎每篇稿子我都看。爱泼斯坦也看稿、写稿。我们两个人常常因不同看法争论不休，我说他是记者风格，他说我是学者风格。

1952年7月1日，第三次世界和平理事会要在柏林开会。中国出席会议代表团由理事10名，特邀代表6名和工作人员20名组成。理事有郭沫若、马寅初、蔡廷锴、章伯钧、梅汝璈、李一氓、萧三、刘宁一、吴耀宗和我。特邀代表有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工商界代表，如邓文钊、荣毅仁等。

6月25日，我们乘苏联民航三架飞机动身，同行的日本、马来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锡兰代表各一人。飞机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乌兰胡特，到伊尔库次克歇一夜。第二天从伊尔库次



克，经新西伯利亚飞到昂姆斯克，宿机场招待所。27日才到莫斯科，苏联文化界人士、我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到机场欢迎。

我们下榻于莫斯科大旅馆。代表团准备了几篇发言稿，我与吴耀宗负责改英译稿，共改了五篇：①关于朝鲜停战问题；②关于细菌战问题；③日本重新武装问题；④德国重新武装问题；⑤国际贸易问题。其中以《世界知识》的编辑张明养起草的天于反对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之原稿最为流利动听。28日晚，苏联和平促进委员会宴请我代表团，爱伦堡、法捷耶夫等人都来了。爱伦堡又高又瘦，头发斑白。他非常爱讲话，几乎不停地讲，声音也很清楚，且流利畅达，真是出口成章。他抽小号雪茄烟，能饮酒。法捷耶夫的政治地位高于爱伦堡，他常率苏联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法捷耶夫长得比爱伦堡高些，面色红润。他不太会饮酒，饮后面红耳赤。

29日代表团乘飞机离莫斯科，经波兰首都华沙抵柏林。前来迎接的有柏林和平大会委员会的人及刘宁一、李一氓等。当天下午即去柏林大学附近散步，这是28年前我读书的地方，那时的柏林大学附属东欧历史文化研究所，已改为德国妇女协会办事处了。过两天，我又去柏林大学附近，在大学图书馆门前遇到看门的老人。他见到我，十分肯定地说，在30年前他经常看到我来图书馆的，可我却记不得了，只好含糊应着。

世界第三次和平理事会大会于7月1日正式开幕，会址在保险大厦，门前悬挂苏、美、中、英、法五国国旗，两旁为德国国旗及德国制作的和平大会旗帜。大会上，世界和平理事常务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做报告，然后由秘书宣布大会程序，大会拟就以下三个专题分组讨论：①关于德日问题之和平解决；②立即停止朝鲜战争问题；③裁军办法和和平公约。

7月3日，郭沫若团长在大会上讲了朝鲜问题，朝鲜首席代表韩雪野、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都发了言，波兰细菌学教授希尔斯兹费尔德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中苏进行细菌战。晚上，在朝



鲜问题小组会上，大家讨论郭沫若的讲话，一致要求做到下面五点：①停止细菌战；②停止屠杀战俘；③达成停战协定；④完成谈判，遣返全部战俘；⑤停战后用公平合理的办法解决朝鲜的政治问题。会后我代表团在德国政府招待所设宴，招待各国代表。苏、印、朝、英、美、法等国100多人到会，著名和平人士爱伦堡、法捷耶夫、聂鲁达、法奇、金斯伯利、万徒勒里均到会。郭沫若在会上呼吁：“我们要保卫科学、保卫人类、保卫和平！”

7月6日上午，柏林市民举行欢迎和大理事特别会议的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约5000人。大会主席台上坐了30多人，有印度的，印尼的，中国有郭沫若、章伯钧和翻译一人，但竟忘记了请朝鲜的韩雪野上主席台。后来法捷耶夫发现了这一点，要德国人去请他，他似乎生气了，不肯上去。于是，法捷耶夫让德国“和大”主席公开道歉，再请韩上台。大家站起来鼓掌，欢迎韩上台，韩还是不想上去。我在他身边，竭力劝他，他终于上去了。

这天晚上，大会开闭幕会，通过了几项议法案，其中主要有三种：①关于德日问题；②关于朝鲜停战；③决定11月召开世界和平大会。

大会闭幕后，我与马寅初、李一氓组成文化代表团，离开德国去访问捷克和保加利亚。一到捷克的边境城市迪钦，我们看到旅馆门前有一个大广告，上写“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和平”。在布拉格，我们见到了谭希林大使、张世杰秘书及吴文焘同志。我曾与张秘书同游布拉格最高的公园，园中有瞭望台，是用铁架子筑成。登梯上去，走299个台阶才到顶端。远望全城，风景优美，俯视图尔塔瓦河迂回贯穿全城，河上有八座桥。城市房屋林立、街道整齐、树木茂盛，花卉鲜明，可谓是欧洲最好的城市之一。在捷克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和马寅初去我驻捷大使馆。使馆中有38个人聚在一起，大使、武官、秘书均在座。马寅初向大家介绍了国内的一些情况，我则讲了国际形势。

7月12日，我们离开捷克，前往保加利亚访问。保加利亚对



我们招待很热情，我自己住一大套房子，桌上摆了许多水果汁，一大盆水蜜桃和樱桃，几盆鲜花，还有卷烟，许多俄、保、英文报纸刊物。据介绍，保加利亚有5000个农村，建有各种合作社，但农业合作社只有2400个，有些农业社还是法西斯时代建立的，他们一直坚强地维持下来了，从闲谈中得知，保加利亚人表示“要”或“是”的时候摇摇头，而表示“不要”或“不是”时，则点点头，这与我们的风俗截然相反，真是有趣。

文化代表团拜谒了原保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季米特洛夫的墓地，献了鲜花。王明有一个女儿，在30年代时给季米特洛夫做了女儿。1949年季米特洛夫逝世后，他的夫人曾带着这个女儿回过保加利亚，后来又回莫斯科居住了。这次在索菲亚见到了她的照片。

我们在保加利亚参观访问，离首都索菲亚不太远的一所农村有一所收养朝鲜战争孤儿的孤儿院。这里有200个孩子，从七八岁至十一二岁的儿童居多。他们排队唱歌，向我们表示欢迎。唱过歌就分散开来和我们握手。有几个小孩以为我是朝鲜人，拉着我走了一段路。依依不舍，可惜我不会朝鲜语，无法与他们对话。我们还参观了孤儿院的图书馆、寝室和食堂。听说波兰、捷克、匈牙利也各自收容了200名朝鲜儿童，而罗马尼亚则收容了1000名。

7月15日，我们到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普拉夫迪夫访问，市长及党部秘书长率许多手持鲜花的女子来欢迎。在市博物馆里，我们看到公元前400年的九件金器，这是在保加利亚南部挖掘出来的。金器上刻有许多黑人的头像，相传那时以黑人为吉利，认为黑人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从普拉夫迪夫返回时，经过一个农业合作社，我们下来参观。合作社的领导人致了欢迎词后，马寅初要我致答词。我说，保加利亚在合作事业上是先进的国家，以后，中保两国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发展合作社事业，方可达到社会主义的世界。



在保加利亚中部偏北有座城市叫加布罗沃，这里的人以吝啬闻名，传说这里人将手表和闹钟夜间停了，只白天使用，以延长使用寿命；他们到首都索菲亚去，乘电车时每站买票，怕买长距离的票后，或车坏不能到达，或意外的死亡而造成浪费；这个城市的医生死后，人们就用他活着时挂的行医的牌子作为他的墓碑。这些传说成为人们茶余酒后的笑料。

我们在保加利亚参观、游览了一个星期，到过保加利亚皇帝的行宫、教堂、保加利亚科学院、索菲亚大学，农业合作社和果园、工厂等。7月14日，我们与保方签订了中保文化合作协定。

7月18日，我们去拜访了保加利亚总理契尔文科夫，他的夫人在大门口迎接。这位夫人是季米特洛夫的妹妹，相貌亦甚象。5分钟后，苏联总顾问也来了。苏顾问和总理夫人都很健谈，总理则不大讲话。在交谈中，马寅初好信口开河，我认为有两点不妥：

①他说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十有八九饮酒很凶，但不象美国顾问那么胡闹，这样相提并论实在不恰当；②他说保总理的衣服也中国化了，其实那时中保两国的服装都是列宁式的。此外，马寅初还要说苏联有3000人过百岁的，被我挡住了，因而翻译也没翻出来。此事听苏联人讲过，但我们不能再当成新闻去告诉苏联顾问。

我同马寅初于7月21日绕道莫斯科回国，途中遇到何其芳和贺晓初二人。何其芳本是去意大利参加纪念达·芬奇大会的，由于拿不到入境签证而改赴东德参加文艺大会。贺晓初是中国人民银行职员，4月间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留在大使馆工作一段的。24日下午到达北京，在机场见到几十位男女军人，是来迎接捷克军队文工团的。



新德里聚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一些国家挣脱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使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全世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为此，1955年4月间，亚非国家准备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由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的、讨论同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亚洲国家要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亚洲国家会议。

出席亚洲国家会议的代表团由郭沫若率领，有丁西林、孟用潜、唐明照、廖承志、巴金、刘宁一、谢冰心和我等30余人，工作人员15名。1955年3月25日，我团坐专车从北京出发去广州。同行的有越南代表14人、朝鲜代表12人、蒙古代表5人。4月1日乘飞机经仰光、加尔各答抵新德里，已是次日凌晨5时了。

我们住在旧德里的一所十分美丽的旅馆里，院中开满了紫色、黄色、红色的鲜花。旅馆侍者穿的衣服有近代军装式的，戴有肩章；也有中古侍卫式的，形形色色，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在这样讲究的旅馆中吃饭，我们代表团的一些女职员却不懂一般外国人吃饭的礼貌，如，她们早饭时取了香蕉，又取木瓜；吃菜时，吃了牛肉又要羊肉，喝起汤来发出很大声音等等。

第二天，我驻印大使向我们介绍了印度近来的政局情况。据悉尼赫鲁对中立政策原先不十分肯定，到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来印度访问后，他就比较肯定这个扩大和平区域的中立政策了。而11月尼赫鲁访华后，就更进一步在内政上实行了实质上的中立政策，即提出要把印度发展成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原因是尼赫



鲁这些年内政无大成绩，国内贫穷和失业的状况正在扩大，因而深感技术、设备和资本的重要。他很清楚，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取技术、资本等，必须要在政治上大大屈从于资本主义。1954年11月他到中国东北参观时，知道苏联在各方面帮助中国，他就动了心，要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如何走法，一般印度人是不清楚的。听说，为了接受苏联来办钢铁厂，竟迫使亲美的工商部长辞了职。在内政上，尼赫鲁也采用“中立”观点，一面扩大国家资本，一面鼓励私营资本，甚至给垄断资本家津贴。

在外交方面，尼赫鲁也走中立之路。为适应民众的要求，他讲和平与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但却不肯过分地骂美国帝国主义，尤其与英国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想决裂。这次亚洲国家会议，印度筹委会方面分三派，即以基切留和森德拉尔为首的积极公正派、以拉米希瓦里·尼赫鲁为首的协调派和亲美派。其中亲美派将竭力阻止大会提出美国的侵略行为。他们要将“中国解放”改为“中国斗争而协商”，将“美国在台湾的阴谋”改为“蒋介石在台湾的阴谋”。

4月3日上午，我与刘宁一、唐明照、丁西林、谢冰心等到印度亚洲国家会议筹委会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的家中去拜访。她在门前的走廊中会见我们。尼赫鲁夫人年约70岁左右，一向从事社会福利工作，曾跟随甘地多年，从1947年起就专做救济难民的工作。她熟悉波斯文学，谈话中常常引用波斯的诗句，但对我国的玄奘和尚却一无所知。她说中印文化，乃至亚洲文化都是同样气味的。又说，我们东方人都通达人情世故，不象西方人那样生硬、机械地处事。她希望这次新德里会议顺利和成功。

4月4日，我与刘宁一、吴耀宗、唐明照同去访问了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森德拉尔，他已69岁。森德拉尔大谈对于宗教的信仰。说：他相信将来世上只会存在一个宗教，现在及过去的一切宗教都在适应和淘汰中。又说宗教的本质并非经典而是人类进步的行动，因而列宁和斯大林也是大宗教家。他著有《耶稣传》



及《穆罕默德传》。

4月6日亚洲国家会议正式开幕。开幕典礼在新德里宪法俱乐部举行。4月8日上午，我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国际贸易的发言。我叙述了美国战争势力对亚洲国家之间贸易的损害，例如这种损害对日本的影响就是明显的，日本被禁止同中国贸易。我相信，如果没有美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是能够更快发展的。这篇发言反应较好，我刚下台，苏联《真理报》的记者就索要讲稿，立即发电往莫斯科了。

4月9日下午，尼赫鲁总理接见一些参加亚洲国家会议的代表，苏联、越南、尼泊尔、日本均有代表去，我代表团受到接见的有郭沫若、廖承志、丁西林、赛福鼎和我。尼赫鲁先同苏代表团长吉洪诺夫谈话，再与郭沫若及日本的松本治一郎寒暄。我在旁提醒拉米希瓦里·尼赫鲁，才未曾错过锡兰（斯里兰卡）和越南代表团团长。尼赫鲁与我已多次见面，这次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冷酷的外界条件决定一切，我相信人类能够使自已完美。”我回答说：“是的，您正是内在的自我完美。”

4月11日晚，我国代表团在大使馆宴请兄弟国家的代表，苏联、越南、蒙古、朝鲜等国代表均来了，共坐16桌。郭沫若讲话，他大声说：“此时此地已把新德里变成莫斯科了！”译员愕然，不肯翻译。他说：“你尽管先翻译，我自有解释在后头。”他接着说：“一则新德里原先很热，今晚却变得很舒适；二则兄弟国家的人在这里大集一堂了！”吉洪诺夫的呼声也很大，为各国共产党、年轻而永不老的党高呼万万岁。郭沫若又加一句：“为在座的永不年老的妇女代表们祝福。”宴会气氛十分热烈，各国代表极为活跃。胡志明出示了他即席做的打油诗，郭沫若拿过来为他朗诵：“和平拥护首苏中，战线盟军朝越蒙；德里首都今夕好，兄弟义气酒倍浓。”

宴会散后，不幸的消息传来，我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4月11日从香港起飞，在飞越



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时起火爆炸，坠入海中。

有一天，一位印度朋友请我去吃饭，席间，他告诉我，印度人对我国台湾问题有三种看法。第一种，同意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或战或和，中国有权自行处理。持此观点的是印共和 P.S.P 党人。第二种，同意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但对台湾的收复可从缓，以免引起世界大战，而金门、马祖则应立即归还中国大陆管辖。这实际是尼赫鲁的看法，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也赞成此说。另一种说法是台湾、澎湖不属于新中国，而属于第二个中国，至于金门、马祖也不能交给大陆管理，这是反动派的说法，以《思潮》周刊为代表。

在印度期间，我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做了一次关于印度经济的报告，说明印度现时殖民地性质的经济及其政治纠纷的联系。

4 月 21 日，印中友好协会第二届年会在加尔各答开幕，我带领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我驻印大使袁仲贤和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邵雨峰也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致词，强调有必要促进中印两国间更密切的关系。

从创办英文双月刊《中国建设》后，我每次外出开会都要顺便调查该刊发行情况、影响等。在德国、捷克、保加利亚，我都遇到了一些希望读《中国建设》的人，答应为他们寄书刊。这次在印度，我发现该刊到达的时间很迟，4 月份的杂志，到 4 月底尚未到达，远不及《人民中国》来得快。看来有必要在香港设立一个有力的发行所，以解决快速传递问题。

回国后在昆明小憩，我们去游西山的筇竹寺，此乃唐贞观年间建筑，宋明代一再重修。寺中有五百罗汉塑像，张瑞芳她们硬说有一个罗汉的相貌很象我，拉着我去看，我一看，确有几分相似，不禁哈哈大笑。

时近“五一”，我决定到上海探望一下父母亲。我回国后，工作很忙，经常出国开会、访问，很少有机会与父母亲团聚。妹妹素雅在上海公用事业管理局工作，家住绍兴路 92 号，母亲一直



与妹妹同住。而父亲则与徐氏住在茂茗北路升平街。我分别去看望了母亲和父亲，并约素雅外出吃饭。克敏此时退職在家，亦一同聚会。

母亲于1957年去世时，我正在国外开会，但入葬时我赶回来了。母亲去世后，在老家惠山买了墓地，依父亲的意思，要在墓地开三穴，将来父亲去世后葬中穴，两旁为一妻一妾。我和妹妹想到父亲一生大多数时间与徐氏厮守在一起，而将母亲冷落一边，死后还要居侧，实在冤枉，可是又不好与父亲明说。我想了个办法，就对父亲说，风水先生讲了，如果父亲居中，两边是女人夹着，阴气太重，所以应该让母亲居中安葬。这样，无论父亲死后葬在哪边，都是挨着母亲，而与徐氏隔开了。父亲1958年去世后，也葬在此处，而徐氏则不肯来，死后葬在上海公墓了。

5月中旬回到北京后，即参加了中缅友好协会举行的成立三周年庆祝会；过几天，主持了中印友好协会成立三周年庆祝会，接待了一些印度朋友。

6月初，中国科学院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部，我被选为学部委员，同时被选为学部委员的还有周鲠生、冯友兰、钱俊瑞、吴贻芳等多人。



世界和平盛会

6月8日，印度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我与章汉夫、夏衍去迎接。晚上9时，我即乘火车启程，去芬兰参加赫尔辛基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了。

这次中国代表团共45人，茅盾是团长，陈叔通、廖承志是副团长。在旅途中，除学习文件，开一次小组学习会之外，没什么事，大家就闲聊。于是大家组成“废话协会”，并推举王芸生为“废协”会长。“废协”之举，几乎每次出国途中都有，两个月前赴印度参加亚洲国家会议途中，也成立“废协”，谢冰心说我们“不安于室”，唐明照则说“废协”所言，都在“真理方面”。兰州市长吴鸿宾由于说飞机里没有风扇，而风扇在飞机外面，被大家推举为“废协”会员。10日晚上，“废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能文而不得志，郁郁夭折，阎王问何以年轻而夭折，让侍者查生死簿，知其阳寿确是很短。阎王说：“如能文，可再返阳世。”恰阎王放屁，此人立即做诗颂之：“伏维大王，宏宣宝屁，仿佛丝竹之音，依稀兰麝之气。”阎王遂赏10年阳寿。文人返人世后，做了小官，甚为得意，人也发福了。待再到阴间时，阎王不认识他了，问侍者，答：“此即10年前做放屁诗的那个家伙。”

次日，车过满洲里，闲来无事，“废协”会长王芸生又讲了个笑话，叫“未必见得”。说的是一个七旬老翁请他的两个女婿来庆他高寿。席中说话，大女婿说什么，小女婿一定要说相反的。如桃子有红青二色，大女婿说是由于光照和背阴的关系，小的却说西瓜外青内红，难道也是光照和背阴的关系。大女婿说鹅叫得响，是因为脖子长，小的说未必，青蛙叫得更响，却没有脖子。



大女婿说，磨刀石两头高中间低是由于中间多用力的缘故，小女婿却说，我们的脚中间不用力，反而是凹的。大女婿恭维老岳父，说他须眉愈长，则年愈高寿愈长，小的却说“未必见得”，大龟寿长五千年，谁见过它有须眉了？！

吴贻芳亦讲了一个故事，甚有情趣。她说，有个学生不喜欢数学，有一次考几何，他交了白卷，但在白卷上写了四句诗，耐人寻味：“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不学几何几何好！学了几何好几何！”

这届世界和平大会22日下午在赫尔辛基麦斯哈里厅开幕，大会推选150人组成主席团，又推举35人为执行主席，我代表团的郭沫若、茅盾亦被选为执行主席。大会仍分小组讨论，我同胡子婴参加社会经济小组讨论会，又分三个小小组讨论①殖民地经济；②国际贸易；③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胡子婴在小组会上发言，介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6月27日是我国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声明一周年，我与丁西林致电印中友协负责人表示庆贺。28日，我们在赫尔辛基的饭店中宴请印度代表，由陈叔通主持，我与包尔汉共为主人，庆祝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周年。大家载歌载舞，尽欢而散。

会议期间，我同邵力子到莫斯科电台设的录音站去讲了一次话。与芬兰、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代表接触不少，他们有几位对中国很有兴趣，我答应给他们寄《中国建设》英文双月刊。

这次和平大会成绩显著，我代表团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参加大会代表的广泛性比以前几次会更大，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派及社会民主党都参加了，如法国就有15个政党的人来参加大会了。另外，日本、印度、巴西、墨西哥、加拿大以及中东各国的代表团都公开地、顺利地来参加会议，这也是以前办不到的。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到会的1400多名代表都投了票，这是由于亚非会议成功的影响，当然苏南会谈和对奥和约也有些影



响。第二，会议表现了较大的积极性，而不象以前那样只限于指摘和批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证明：①对德问题，大家提出了三点积极的意见：a. 限制西德的更新武装，b. 沟通东西德的各种设施，c. 召开全欧安全大会。³②对日问题，日本代表一致表示要恢复对苏中的邦交及与各国进行正常往来，只是孤立了吉田一派。③把反对殖民主义与和平运动结合起来了。这个问题在1952年的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时未能解决，有些代表强调了民族主义而使之狭义化。这次将和平运动与反帝运动联合起来，创出了各国团结的新道路，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与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能互相了解和团结一致。第三，会中争论激烈，且富有代表性，不象以往那样争论者只限于左派中间或限于针对一两个人的言论。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争论；英、葡、印度对于果阿的争论；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争；投票表决台湾问题时意见分歧等等。第四，会议成功的要点在于求同存异，发挥了亚非会议的精神。如对以色列问题，‘我们说要尊重亚非会议精神’；对果阿问题，要求果阿与印度双方协商；对台湾问题，则要求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保证海上自由等。第五，这次会上，我们巩固了亚非会议的成果。我们参加了15个会议小组中的13个组，发了言并参加起草工作。另外，我们进行了较广泛的联欢工作，宴请了日本、印度、法国、北欧等七个代表团和英、美的一些和平人士，有140多个代表表示愿意到中国参观，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的团结。

我们回国不久，参加和平大会的加拿大、阿根廷、苏丹、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等国的代表都来我国参观、访问。7月16日，郭沫若、包尔汉设宴招待各国和平代表，我也出席作陪。

每次出国回来，我总要写点文章，介绍国外的情况，如《50年来的印度史学界》、《走向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从亚洲国家会议看亚洲经济》、《从赫尔辛基归来》等，并写了一本书《美国垄断资本》，由世界知识社1955年出版。我在书中介绍



了美国垄断资本的来源，它发展的四个阶段，以翔实、确凿的资料揭露了美国垄断资本所榨取的暴利和美帝国主义的贪婪凶恶。最后，我指出：“美国的历史，自从联邦政府替代了邦联政府，自从资产阶级专政压倒了民主政体以来，一直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历史。垄断资本即是帝国主义的根源。”

此外，为了使外国了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充分利用《中国建设》这份英文双月刊，每个编委都写文章，我也写了一些，大约每年三四篇，比如：《着手开始工业化》、《为了农业集体化》、《中国的经济道路》、《关于云南的傣族》等。



随宋副委员长出访印、巴、缅

5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很好，互访活动极多。1955年12月，宋庆龄副委员长应印度政府邀请，出访印度，我和淑型随行。8日，我们与廖承志、刘冀平、赫若渝坐飞机到昆明，与宋副委员长会齐，等候印度飞机来接。

有一天，我同廖承志谈起筹建亚洲研究所之事，他建议研究日本问题可聘请几个人：①政治可请谢南光担任；②经济可请正在留日的刘明雷担任，刘是台湾人；③宪法可请刘思敬担任；④宗教可再物色一人。另外，日本文教，特别是科学的进步，如冶炼及物理方面，要另请人。我根据他的意见，给潘梓年和刘大年同志写信，请他们加以考虑。

12月15日，印度派来的飞机“空中霸王”号VT—DAW从新德里抵达昆明。前来昆明迎接宋副委员长的是印度共和国外交部副秘书长哈班斯·拉尔。第二天凌晨我们一行10人出发去印度，中午在西孟加拉加尔各答机场稍事休息、进午餐。新闻记者赶到餐桌旁，问了宋副委员长几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是问中国人对苏联的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印度访问有何感想。宋副委员长立即回答说：“我们和印度人民一样欢迎此举，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友好和团结，才能进行和平建设。”

尼赫鲁亲往新德里机场迎接宋副委员长，宋庆龄发表讲话后，即同车回总理官邸，我与淑型随同去总理官邸。宋副委员长住在楼下两间一套的房中，我和淑型住在楼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住在外边的招待所中。尼赫鲁非常尊敬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家中壁炉上供着孙中山的相片。他对孙夫人也十分敬重，每天早餐、晚餐都与孙夫人和我们夫妇一道吃，他的女儿甘地夫人作



陪。尼赫鲁对自己两条良种狗很是喜爱，每天要牵着它们散步。我住在官邸时，也天天随尼赫鲁散步，边走边谈，关系很融洽。他邀请我到德里大学做教授，我说国内工作很忙，离不开，谢绝了他的好意。后来，他送给我一台印度造的打字机。有一次，他告诉我，苏联朋友来时，在加尔各答机场，拥上前去要求握手的人太多，加上汽车出事，只好乘警察的囚车离开机场。又说，最近沙特阿拉伯国王来德里，竟带了200人的卫队和54个小孩。

我们先进行了一些礼节性的拜访。拜访了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和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副总统说了一番反美的话，还说苏联国家领导人到加尔各答时，受到该地300万人的欢迎，而圣雄甘地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对于宋副委员长来访，印度各界，尤其是妇女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月19日，乌玛、尼赫鲁夫人在海得拉巴大厦举行欢迎大会。第二天各界妇女500多人又在红堡举行欢迎大会，组织者为全印妇女大会、印度妇女全国委员会、印度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印度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团体。会上，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致欢迎辞，并向宋副委员长赠送纪念品。

然后，宋副委员长应邀前往亚格拉参观泰吉·玛哈尔陵、波保尔市、孟买的桑吉佛塔和加尔各答等处，均受到热烈欢迎。27日，在西孟加拉省27个妇女团体的欢迎会上，宋副委员长说：“通过对新德里、亚格拉、波保尔、孟买和加尔各答的访问，使我对印度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6年1月1日，我陪宋副委员长去电台录音，准备当晚7时发表她的广播稿。

1月2日，我们告别印度，前往缅甸访问，临别时，印度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跟我说，想要一张宋副委员长亲笔签名的照片，我上飞机后即与宋副委员长谈起，她立即答应了，说回国后即照办寄去。

我们到缅甸后，下榻在总统府。晚上，缅甸总统巴字设宴欢



迎，参加欢迎宴会的有缅甸总理吴努、最高法院院长吴登貌、法官吴敏登、缅甸联邦国会民族院院长肖恢塔。国会代表院议长波木昂以及已故昂山将军的夫人都庆枝等等。

1月4日是缅甸独立日，我们有幸应邀参加了国庆盛典。据悉，缅甸政府中分为三派，一是吴努派，有财政部长吴陈、外交部长苏昆雀、贸易部长吴拉实；二是亲英工党派，以国防部长吴巴瑞为首；三是亲美派，以工业部长吴觉迎为首。

6日，宋副委员长参加仰光市民举行的欢迎大会，发表了题为“为和平而奋斗的中国和缅甸”演说，追述了中缅两国友好源远流长，指出今后更要友好睦邻。讲话录了音，中、英、缅三种文字稿均发给了新闻机关。散会后去中国大使馆，姚仲明大使同我谈起中缅边境问题。第一，在高黎贡山一带有大山，山的后面是缅甸。此处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但我们从中国方面进去却有地势上的种种困难；第二，卡瓦山区在云南山通、岩城一带，其西北部的小公鸡山地区出金矿，这些宝藏矿产，为帝国主义所垂涎。我方打算在高黎贡山方面做出让步，而在小公鸡山地区争取将来合作开采金矿。最近边境偶有冲突，然未出大事。就边境的历史、地理资料看，缅方掌握得似乎多一些。此外，姚大使还对我讲，缅甸进口货甚多，中国的纱占缅甸进口的9/10以上，纱与布共占缅甸进口的1/3左右。他认为，三年之内，苏联、新西兰各国进口货可占到缅甸全年输入的60%。

11日，宋副委员长离开仰光，到曼德勒和东枝掸邦参观访问。曼德勒市政府为欢迎宋副委员长搭出临时的竹幕帐亭，内务部长波庆格礼、合作社部长德钦达庆、市长吴迎、吴努夫人都妙意等都参加了群众欢迎大会，与会的千余人均席地而坐，倒也别具一格。在掸邦，宋副委员长参观了农业研究实验站，游览了茵莱湖。茵莱是由居住于水上的少数民族茵达族而得名。湖边原有4个村庄，今已增至30多村了。泛舟湖上，风景十分优美，真可谓绵延两山夹青天，湖光如丝船似箭。还访问了掸邦的风景区、海拔



4000英尺的葛鲁。在东枝，我曾作诗一首：“前明桂王飘泊地，寄篱何以得全生？而今胞波笑相迎，仁邻提携肺腑倾。”

这次出访印緬巴，我顺便调查《中国建设》英文版的发行情况。从所接触的人中，得知许多人想读《中国建设》，以了解新中国，我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准备回国后给他们寄杂志。我从中国驻腊戍总领事王泽处的译员唐理庭那里了解到，《中国建设》英文版每次有100本由仰光使馆分配到腊戍，而实际上只有50本左右分送出去了，且每期都迟到两个多月，就是《人民日报》也要两个星期后才能见到。

24日，宋副委员长经加尔各答飞往巴基斯坦的首都卡拉奇。到机场欢迎的有巴国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外交部长哈米杜尔·胡克·乔德里、外交部秘书伊格等，我驻巴大使韩念龙亦到机场欢迎。赴政府招待所途中，所见商店尽是英文招牌，竟无一字是印地文，一派殖民地景象，足见英美商业努力在此处颇为强大。到旅馆中，所见的所用的毛巾、肥皂均为美国货。

据介绍，巴国对中苏不甚友好，有一次，为向巴国人介绍新来的商务参赞，苏联大使馆发了200多张帖子请客，结果只到了8位客人。中国大使馆有一次请人来看电影，但所请数十人却一个也没到，原来请帖全被邮局没收了。苏使馆人外出或到市内均须事先报告，在中国使馆门口经常有特务抄汽车号码。巴总理常常宴请英美人物，但从不清中苏大使。苏联驻巴代办沃伊柯夫对巴基斯坦人也很粗暴无礼，比如，他用英文对我们说：“你们来得很好，因为巴国太反动了。”他说这话时，许多在旁边的人都听到了。又如，巴基斯坦人问他：“沃伊柯夫，你好吗？”他说：“托福，我还十分顽强。”巴基斯坦人立即应道：“但我还是活着。”

这位沃伊柯夫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甚为严重，时有表露。我们到巴基斯坦后，日本驻巴使馆的一秘深井对沃伊柯夫说廖承志的日语比自己说得还好，沃伊柯夫马上说：“这证明你的日语十分



坏，我从未遇见有人说俄语比我还好的。”深井听了掉头就走。又一次，印尼驻巴代办见到沃伊柯夫，对他说俄语，刚讲了几个字，沃伊柯夫就打断他说：“为何你在莫斯科住了两年所学到的俄文只有这几个字呢？！”结果两人不欢而散。

巴基斯坦人对宋副委员长访巴，还是比较热情的，我驻巴使馆举行招待会时，有200多人到场，有一些是从来没到我使馆来过的部长及官员。第二天，巴国外长又亲自到我使馆送礼，每人一份，我得到一盒银器，包括咖啡壶、牛奶壶、糖缸三样；淑型得到一条纱丽。

在巴基斯坦，我们访问了西巴的拉合尔和东巴的达卡，均受到比较热情的接待。东巴达卡大学授予宋副委员长法学博士学位，仪式由大学副校长詹金斯博士和名誉校长艾哈迈德主持。我们还拜访了被尊为“国父”的真纳的妹妹法蒂玛·真纳。在东巴，我遇到一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巴基斯坦人，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穿的是黑色的制服，第二次我换了一身西装，于是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倒是一个很好的资产阶级者！”我立即问他：“你的资产阶级成分较多还是较少呢？”二人都笑了起来。

2月2日，我们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取道缅甸回国。2月5日，恰值我59岁生日。一早送宋副委员长登飞机返京后，我与淑型即去安宁温泉。上午洗浴赏花，昆明的早春，已是百花盛开，兰花、红梅、白梅、绿梅、玉兰、迎春，更有各种茶花，简直是生活在花丛中。中午在温泉宾馆进餐，破例饮了青岛造的樱桃白兰地酒。这天，浴温泉、赏梅花、看茶花、饮白兰地，过了一个十分快活的生日。

2月6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成立，这是根据头年4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的决议建立的，主席是郭沫若，我做副秘书长。



瑞 典 之 行

为讨论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世界和平理事会拟于4月5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我国出席会议代表团由理事10人，特邀代表5人组成，陈叔通任团长。3月29日，我们乘飞机经蒙古、苏联赴瑞典。3月31日在莫斯科停留，这是我第七次来莫斯科了。最早一次是1927年，第二次是1935年。建国以后外事活动多了，仅6年，我就来5次了。

4月5日上午，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冬宫”舞场开幕。东德、西德、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匈牙利、希腊、冰岛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著名人士出席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亚洲各国代表比较活跃，6日，由印度代表发起，日本、越南、朝鲜、蒙古、苏联、埃及、巴基斯坦等国20多人自动集会，商议今年是否要开一个亚洲会议，在什么时间、地点合适，要不要请非洲人参加等等。大家都表示了意见，比较一致地同意在本年秋天开会。地点么，黎巴嫩代表说，如果夏天开可以在他们的首都举行；埃及代表说，如果明年举行，可以在开罗；日本代表说，由于日本的外交关系尚未恢复正常，东京很难召开此类大会。大家都主张邀请非洲国家的代表出席大会。

从4月7日起，和平理事会分政治委员会，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委员会，原子能问题委员会和组织问题委员会几个小组开会讨论。9日，“世和”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告世界舆论书》，各委员会小组也都通过了文件。这次大会所实施的策略是：①孤立美国，对其他各国则通融；②发扬民主，不限制大家发言，使每个代表团回去后都可以对政府或民间团体交帐；③充分进行会



外活动，召开亚非国家代表座谈会两次，到会60余人。这样大家满意，大会又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此外，这次大会的座位没有按国家次序安排，也没有特别著名的人物参加，这可算做这次会议的特点吧。

在会下，我代表团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建立了很友善的关系。一位阿尔及利亚律师说，只有靠中国的支持，才能保障他的国家的独立；苏丹共和国的一个商人说，每个中国人多用一寸布，那么苏丹的棉花就不愁出口了。以色列的一位代表说，尽管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有冲突，但人民还是愿意和平相处的。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交界的地方有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每当果子成熟时，两边的农民就坐下来，一边吃果子，一边友好交谈。

回国途中经莫斯科，我与钱端升、朱子奇访问了《火星报》编辑部，出来接待的有副总编辑、国际部主任等5人。据介绍，《火星报》共有工作人员96人，即总编辑1人，副总编辑1人，有10余个部，每部有主任1人，有6人在外做通讯员。这96人中，能动笔写稿的仅47人，火星报的篇幅一半是文字，一半是图片，故社内设7位照相专员。报的销路为100万份，其中20万销往国外。最近五年计划中要求报刊扩版，且增加印数到200万份。国际部主任说，他经常读我们的《中国建设》，将译载一篇我们介绍台湾归来的飞机师的文章。美术部主任说，他们将转载我们一篇关于木刻的文章。他们要求我们给周报写文章，最好是介绍中国人心理的生动文章。今年“五一”节，周报曾派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画家三人到北京访问。他们还说，周刊本身一半是外来的稿子，一半是编辑部自己写的，关于长篇小说和诗的稿子大都是外来的。



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苏、捷、罗、保、南和阿尔巴尼亚诸国，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国访问了。

这次代表团阵容庞大，彭真为团长，李济深、程潜、章伯钧、胡子昂为副团长，另有团员23人，工作人员20人。11月15日乘飞机出发，到伊尔库次克停一下，受到热烈欢迎。彭真团长致答词甚得体，他说：“我们的鼻子虽有高低，肤色虽有黄白，但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我们此来是为了加强团结和友谊。”

到莫斯科后，我们下榻于苏维埃旅馆。16日，全团去克里姆林宫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洛巴诺夫及民族院主席拉齐。两位主席陪同我们参观克里姆林宫。宫中宛如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有介绍14世纪俄罗斯为独立自由而战的油画；有15世纪造的可容500人的宫殿，墙的一面有许多小窗，据说是供皇室的妇女们观看宴会的。拉齐开玩笑地说：“那些女人一定好好观察她们丈夫的行为，以便回去收拾他们！”我们听了都笑起来。16世纪初建筑的大教堂里，安放彼得一世以前46位皇帝和皇后的铜棺。而彼得大帝的皇宫更有特殊之处，皇帝办公室的后窗外有一条绳，直垂地下，系着一个木箱，是装意见书的。当时人民确实有许多意见书送来，但他既不看，也不解决问题，于是人们将此称为“不解决问题的木箱”。拉齐主席笑着说：“这也可称为官僚主义的木箱。”而19世纪建筑的宫室，则以6个大吊灯闻名，每个吊灯重达1300公斤。凡国宴及招待外国使臣都在这里举行。列宁的办公室及住房在一座大厦内，他1918~1923年在此工



作，其妻、妹均在此居住。他只占住房4间，藏书达两万余册。克鲁普斯卡娅的卧室也就是她的办公室，她当时兼教育部副部长。她的桌上有针线包、眼镜、电话、文具、书籍等。克里姆林宫非常之大，还有许多教堂、大厦我们都没有进去参观。

作为人大代表团，我们首先访问苏俄议会——苏俄最高苏维埃。据介绍，第四届苏俄议会有769名代表，其中许多人都与选民有书信往来。代表们都用个人名义直接答复选民，而议会开会时，也可以听取选民或群众的意见。代表们对房屋等困难问题应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向人们解释困难的情况，二是尽可能地去解决问题。苏俄议会主席团有27人，每次通过的法案必须经下次会议批准。主席团即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主席团下有部长会议，部长会议为管理和执行机关，等等。彭真团长说，“我们代表团中有各党各派的人，并有信仰社会主义的工商界代表，或叫资本家，但他们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中国方面现在完全赞同苏联及匈牙利人民的立场。我们既是站在一起，就可以无所不谈。我们之间谈话可以象在北京开会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两点：一是莫斯科北京间相差5小时，二是你们苏俄有39岁，而我们只有7岁半。”

我们访问参观的下一站是列宁格勒，这是一座工业中心城市，有重工业制造业、冶金业、造船工业、仪器制造业、化学工业、造纸工业、制鞋业和纺织工业等。这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市内著名建筑有教堂、修道院、艺术科学院、基洛夫运动场、歌舞剧院、博物馆、冬宫等。在这里从事过文艺创作的著名作家有18世纪诗人捷尔沙文、19世纪的诗人茹可夫斯基、普希金，作家果戈里、莱蒙托夫和高尔基。

在联盟院主席洛巴诺夫的陪同下，我们登上了“阿芙乐尔”巡洋舰。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它首先起义，炮轰冬宫，立下了丰功伟绩。过几天，我们又去参观了冬宫。冬宫分冬宫、小宫、旧宫、新宫四个部分，房间不下1500间。其中50间存放法国



的油画，30间放意大利绘画，中国的东西占了18间。斯莫尔尼宫是1917年列宁领导武装起义的地方，宫中大厅是军事委员会的大本营，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就在此厅举行。大厅中挂一幅油画，是列宁站在伏尔加水电站上，象征着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即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

离开斯莫尔尼宫后，我们直赴拉兹立夫湖边列宁纪念茅舍。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资产阶级政府要逮捕列宁，于是他避难到此，住在一个草棚中。8月21日，根据党中央委员会指示，列宁装成一个铁道工人避难到芬兰。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就是在茅舍中完成的。

11月23日，我与吴克坚、高崇民、赵鹏飞等6人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参加座谈会。从谈话中，我们了解到市苏维埃代表有813人，这些代表是由各区选出来的，他们每年要向自己的选民报告一次，事先通知，一般在俱乐部做报告。报告内容两个方面，一为市府本身的工作，二是自己的工作。按规定，每个代表每月都要接见一两次选民，一般是晚上业余时间。代表没有津贴，只有免费的车票，可以在市内通用，另外市苏维埃公报每月二份，是免费分发给代表的。市苏维埃有由1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每天执委会派一人接见市民，市民可以随时提出问题，要求为之解决。人民来信很多，均由苏维埃主席和副主席拆阅，然后分发各机关去函复。早在1931年就有法律规定，人民来信一定要在20天内答复，而军属来信则必须在7天内答复。我认为这些做法甚好，可以少些官僚主义。

11月24日，我代表团要去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访问，我却因脚部肿疼而住进了医院。苏联医院照顾得很好，苏民族院主席洛巴诺夫、联盟院主席拉齐斯派人送来两把菊花，我当即请人转谢了。

12月2日，我人大代表团离开苏联去捷克，我病未痊愈，他们只好将我的护照留下，让我病好后再赴捷。12月5日，我独自



乘飞机赶到了布拉格。

在布拉格，我与程潜、武新宇等5人参加国民会议举行的座谈会。捷克的国民会议设立七个委员会，主要的有财经、预算、法律；辅助的有文化、卫生、农业、外交。委员会之上有主席团的执行委员会。据介绍，捷克农业方面的情况如下：1922年进行过有利于大地主的土改，那时2000户大地主分到250万公顷土地，而60万户小农仅得60万公顷，结果捷南部得到5000公顷以上土地者甚多，甚至有多达5万公顷者。1945年苏军来后又公布一个土改法；1948年2月革命后，颁布法令，限制土地最多为50公顷，如果18年内不耕种就将被没收。1949年颁布了成立统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法令。现在合作社有四种形式：①互助组，②保留私有农具和耕畜的合作社，③依照土地多少、好坏而分红的合作社，④1951年以来发展的高级合作社，一律平均分红。

我们在捷克继续参观访问。在重工业中心俄斯特拉发汽车工厂参观时，我了解了一下捷克的工资情况，并将捷克和苏联进行了比较，感到有两方面差别：第一，苏联的工资悬殊大，是300：30000卢布，即100倍；而捷克是600：4000克朗，不到7倍。捷克的部长、院士、列宁厂厂长都是每月4000克朗，而矿工收入高的也可达3000到4000克朗。第二，克朗的购买力大于卢布，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每月可拿500卢布，但300卢布要用于吃饭；在捷克的中国留学生每月可拿600~700克朗，而吃饭却用不了300克朗。

12月13日，我们到卡罗维发利参观，这个城名的意思是“查理温泉”，传说14世纪捷克国王查理第四曾到此地猎鹿。有一只鹿受了伤却仍在飞跑，查理骑马紧追不舍，到一个山头上，鹿已无路可走，纵身跃入山下一泉中。待鹿出水后，受伤的腿已不跛，查理甚为惊奇。遂细查，发现泉水温热，方知可疗伤，命名为查理温泉，而卡罗维发利市的市徽上就画着一只鹿。这里旅游者甚多，1956年春天朱德副主席访捷时，也在此住过一个星期。

我们在捷期间，受到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布拉格市长斯沃



波达，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库巴奇、行政委员会主席斯特雷哈伊的热情接待，参观了工厂、研究所、古罗马遗迹，拜谒了无名烈士墓和哥特瓦尔德陵墓。12月17日，我们去国民议会告别，费林格希望我们多留几天，可以列席捷克的议会，我们说已接受罗马尼亚邀请，故不能多留，彭真致答辞。而后75岁的程潜朗诵了他的四句诗，有“专政”等字眼，译者又译得不得要领，因而无人能明白其意思。费林格站起来说，中国人都会做诗，可见文化程度之高，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也会做诗。程潜说，诗有讽刺与赞美两种，似应加上第三种，即批评诗。费林格又就“专政”二字发挥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说捷克正要在民族阵线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与中国所实行的基本上相同。

捷方对我们十分友好，参观“光明”鞋厂后，厂方要送给我们每位代表一双鞋，可以自己选式样、尺寸，价格在170~450克朗。捷民族议会和行政委员会还送给我代表团电影摄影机一架，有色卷片50英尺和一大本图片。

我们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受到罗国民议会副主席萨多维亚努、罗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阿波斯托尔、罗部长会议副主席康斯坦丁尼斯库的欢迎。

我认为我们这次代表团的人数太多了，除人大代表团外，还有北京市人民代表团，再加上工作人员和留学生，而后者又远远超过了代表人数。逢到宴会、便餐、送礼，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就与代表无什么差别了，因而每到一处吃饭，就象一群蝗虫。在捷克送皮鞋时，我们代表都选择170~290克朗的中低档产品，而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则都选400克朗以上的高档品，实在有失体统。

在罗马尼亚，我们首先去访问了国民议会，它是罗国唯一的立法机关，每年举行两次例会，由主席团召集。主席团有主席1人，副主席2人，秘书1人和委员15人。执行委员会分设农业、财政、商业、教育、卫生、文化等科。议会主席格罗查原是一个大资本家、银行家，又是牧师的儿子，无党人士，但与工人党一



直有联系。他出来迎接我们，说他曾到过中国，还写了一本关于在中国游历的书——《在六亿人口的国家》。主席团秘书布纳丘拿出书来送给大家。副主席萨多维亚努说，罗马尼亚人民既承袭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又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彭真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共同传统，这个传统还不到40年，大家还要共同努力，去创造新记录。

12月23日，我们到布加勒斯特近郊去参观“毛泽东工厂”。这厂原名“火山工厂”，建于1905年，原以造锅炉为主业，现在则兼造公共汽车和滑车式起重机。1953年12月毛泽东主席60寿辰时，改为“毛泽东工厂”。我国在此厂订造发电厂所用的锅炉。该厂所造公共汽车被命名为“毛泽东号公共汽车”。

在罗马尼亚，我与《今日罗马尼亚》月刊法文版的编辑谈了关于文化交流和国际贸易的事，并去参观了火花大厦，罗共工人党日报《火花报》就在此出版。这个大厦1950年落成，1951年5月开始印刷，四小时之内可以印出50吨报纸，约200万份，这个大厦是东南欧最大的印刷厂，约有2500职工，大多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

据驻华的罗马尼亚文化参赞孟图努告诉我，他已于两个月前从北京回来，现在罗外交部做事。他说，现已时至年底，而今年的《中国建设》却只到了第7期。晚到的原因是由于用普通火车运来，所以要用两个月；如果用快车运，可以早到些，但运费要贵10倍之多。这件事很重要，应该向国际书店查清楚，并设法补救，否则将成为杂志推销的一大障碍。

我驻罗大使馆参赞张国英，是河南许昌人，他与我谈了很多，据他介绍，罗马尼亚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石油多，②沼气多，③森林多，占全国面积的1/4，④化学工业发达，⑤蔬菜水果多，⑥建筑物式样多，⑦好客成风气，⑧科学中以医学及数学最著名，⑨大多数人喜欢吃酸的东西，⑩受土、法、俄的影响较多。



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渡过1957年元旦后，即启程往保加利亚。在我们到达索非亚的前一天，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全文刊载我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据说，莫斯科《真理报》也于日前转载了。看来，此文引起社会主义各国的注意和赞同，将对反帝事业大有影响。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设主席团、执行局，下有外交、资格审查、立法、预算四个常设委员会。在保加利亚拥有众多拥护者的是农民联盟和祖国阵线。农民联盟成立于1899年，1920年曾参加组阁，通过了有利于农民的法案。1923年法西斯政变，将其领袖斯坦包罗斯基害死。1942年，该盟参加了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拥护保共的主张。50年代有盟员12万人。祖国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立，到1956年底有会员284万。它无自己独自的行动纲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保苏友协及人民读书室协会并入祖国阵线。人民读书室制度成立于百年前的1856年，1911年成立了一个协会。到1955年人民读书室已有4400多个，而属于读书室的业余艺术团体则达6670多个，参加此种活动的人在13万以上。农民联盟的书记是特赖依科夫，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为伏·契尔文科夫。

阿尔巴尼亚被称为山鹰之国，据说古罗马时代有一位希腊将军统治了马其顿地区，在意大利打了一胜仗。这位将军实际是阿尔巴尼亚人，他对他的兵士讲话时，士兵说他是一只大鹰，他回答说，如我是鹰，那么兵士们就是我的翅膀。从此，有了希基浦尼亚之称，即鹰的意思。1470至1912年土耳其统治着阿尔巴尼亚，1912年伊斯玛依尔·捷马利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反抗土耳其统治。他要进行土地改革，没有成功，革命失败了。他说：“我要土改，故失去了资产阶级的国情，而现在革命失败了，人民对我亦不同情。”

帝国主义列强对阿尔巴尼亚都怀有野心，1911年，它们召集



了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把阿尔巴尼亚的境界划分得很窄，因而1912年阿尔巴尼亚独立时疆土甚小。1924年我在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留学时，曾就这个问题写了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阿尔巴尼亚最著名的民族英雄是斯坎德培。他的父亲是克鲁亚地区的封王，他从小就与兄弟三人一同被土耳其人押去做人质。后来，他的三个弟兄都被杀害了，而他以多才能战而得幸免。有一次随土军司令官与匈牙利人作战，他强迫司令官写下手谕让他去克鲁亚接防，随后杀死司令官，带100人去占领了克鲁亚，号召当地人起来进行反抗土耳其的斗争。他病死后10年，土耳其军才占领了全阿尔巴尼亚。

南斯拉夫是我们这次出访的最后一站，这里欢迎外宾的作风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既没开群众大会，又无标语，到机场欢迎我们的仅30余人。我驻南大使伍修权也来迎接。晚上，我们到歌剧院看芭蕾舞时，剧院没有公开说明，也无人注意我们的来临。

南斯拉夫的《战斗报》为我们的到来发表社论^④，题为《来自北京的客人》。社论说：“中国所累积起来的经验，在极大程度上能使我们感到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同样相信，来自友好中国的客人可以从我们这儿了解一些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的作法，这些做法必然会使他们感到兴趣。”又说，“尽管对当前某些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问题有一定的分歧，但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时，中国和南斯拉夫的观点是一致的。”“实践已经证明，议会代表团是两国间顺利地了解和加深合作的最成功的方式之一。”《政治报》也发表了社论。

1946年南斯拉夫宪法规定，联邦人民议会为两院制，即联邦院和共和国院，另设联邦人民议会主席团和部长会议。1953年联邦人民议会通过新宪法，规定联邦人民议会由联邦院和生产者院组成，必要时还可以组织民族院。废除联邦主席团，代之以共和国总统；另以联邦执行委员会取代部长会议。



南斯拉夫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我谈话，说起过去有一个印度人来南游历，总结说这是一个“一二三四五六”的国家，即一个国家，两种文化（东、西），三种语言（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语），四个宗教（东正、天主、耶稣、伊斯兰），五个民族（塞尔维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门的内哥罗族），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黑山）。总结得很是恰当。他还对我说，党的决定如果民众喜欢，就由民众自己去行动，不要加以干涉。在他的经济研究所中，对党员与非党员是一视同仁的，很少问人家是否党员，一切都依照工作成绩看待，南斯拉夫正在做制度上的改革试验，是否能成功，要5年后才能做出鉴定。

我们在南斯拉夫参观游览，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波斯托伊纳石灰溶洞。此洞在南斯拉夫西北部，是1213年发现的，刚入洞，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景象，很神秘，往里走，变幻无穷，有时象花园，有树有花有动物；有时象到了公园，有高达30多米的音乐厅、奏乐台，有喝咖啡的地方；还有一座铁栏杆桥，叫俄罗斯桥，据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国军队命令俄国战俘建造的，从桥上俯视，可见满地花草。意大利文豪但丁所描写的九层地狱，似乎是从这里得到启发的。我做诗一首以记之：“溶洞神奇我幸临，蜿蜒百里信幽深。……”

有一次，我们到卢布尔雅那共和国议员俱乐部参观，与一哲学教授谈话，他说共和国有党校，在训练班中的学生共4000多人。另有积极分子5万人，1000多个文化工作团，文化政策是自由发展，不去干涉，并给予物质方面的保障。但不许任何人在文艺的名义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有一位中央委员因在外国刊物上发表了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言论，即被开除出党。南斯拉夫人说，他们看了陆定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觉得两国颇有相同之点。

在南斯拉夫，我们拜访了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接



见我们后，谈了以下几点：联邦执行委员会有委员31人，这是由全国人民议会选出的，任期4年；委员会下设9个委员会，内有一个协调委员会；常设委员会不下命令，全靠下面的执行机构执行议决案，一切按议决案办事；如此中央机构减少，而地方机构增加，上下取得密切联系；至于执行法律或议决案是否正确，则由最高法院来决定或裁判。总之，总的方针是减少独裁而培养民主。

1957年的除夕，我们是在莫斯科渡过的。接到国内指示，要彭真团长与赫鲁晓夫谈一次，以促成周恩来总理与铁托的会谈。到此，这次为期两个半月的出访活动结束了。



在“大跃进”中所见所闻

我们出访苏联等国回来不久，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就开始了。我熟悉的一些人都成了右派，比如罗隆基，我认识他，个子高高的，开会喜欢讲话，有点好出风头，但说他有阴谋，我觉得不对。吴克坚本来做人大副秘书长，反右时也倒了霉，弄到江西去做教育厅长了。还有一个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也被打成了右派。对这些事，我不解、不平，就在讨论会上发言说：“打右派，为什么不打左派？有右就有左，为什么右派不好，左派就好呢？”这一下子可惹祸了，要把我也打成右派。因为当时我的党员身份并未公开，又长期在国外生活，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右派又是什么呢！《中国建设》的李伯悌得知情况后，马上去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又找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下达指示：不能将陈翰笙打成右派！我才幸免于难。可是我在《中国建设》的处境就不大好了，为了避免矛盾，章汉夫派唐明照来帮我的忙，管《中国建设》，以后我就不大管了，只是挂着名字而已。

1958年，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让我去做副所长。不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又成立世界史研究组，我出任主任。从此又开始了我的研究生活。

我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报纸上整天宣传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一天等于20年。于是，人大常委会又组织我们这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外省去参观。

8月中旬，我与顾一帆、顾以侔、陈应、肖武等9人赴天津参观。我们先看了“天津工业技术革命展览馆”，据说这里的许多产品已经超过了英国、西德、瑞士、日本和美国。



第三天，便去霸县胜芳镇人民公社参观。据镇长介绍，他们搞30亩试验田，发动农民、干部、学生共3000人去耕作，水稻高1.1—1.2米，叫“葡萄黄”，可以随着水涨落，亩产可达4000~6000斤。这种稻田中还种藕养鱼，提出的口号是亩产6000斤藕、10000斤鱼。我们去看了试验田，只见试验田上有棚架，架子是用竹子搭的，可能要用几万根竹子，说这样可以防风和冰雹。稻田里有船，船上有吹风机，按地垅吹风，以降低温度。田间有电话亭，直通镇市，随时报告情况。有专门用鸟枪打雀的，晚上有汽油大灯照着……真可谓为创“卫星田”，不惜一切工本！

我们参观塘沽新港时，见到许多外国船只和各国专家及各方面来的参观团。据说外国海员对新港是两满意——货物便宜，治安好；两不满意——无舞会，无妓女。

在参观中，我们发现有些吹得神乎其神，令人难以置信，如说天津一个区办一个刊物，40所党校、有400名理论指导，7万人学习哲学，一年出7万篇文章、50本书等等。

8月31日刚返京，9月13日我又随全国政协参观团去了安徽。同行的有赵朴初、梁漱溟、翁文灏、冯定、申伯纯等。

我们坐火车经天津、德州、徐州，过符离镇到达合肥，一路所见表示“雄心壮志”的大标语真不少，什么“十年计划四年完，四年计划一季完”，什么“用尽脑力，掘尽智力，把低产变高产，把淮北变江南，把江南变岭南”等等。

据介绍，安徽省大跃进甚为惊人，全省每天有1140万人出工，占全省劳力的79%！春节时仍有400万人在水利工地上。全省有大小土洋高炉25717个，小的仅0.5立方米，大的610立方米。到本年底可达3万个高炉，炼铁400万吨！

接连数日参观，高炉、高产稻田、棉田、热火朝天的动人场面，将我们这些人的热情也鼓了起来。赵朴初大发感慨，说1951年他过合肥时，全市只有两层楼一幢，那年发大水，全国掀起送寒衣救灾运动，而现在的安徽则变成了“千斤”省。在参观巢县



复兴乡以后，他做诗一首：“远看棉田象高粱，到处挂起青纱帐，近看几乎不相识，那么高大那么壮。……棉桃大得象苹果，一棵多到二百个！吐出棉花白雪般，亩产万斤算什么？……世界最长哪条河？人道密西西比河。河水不及棉田里，流出棉花那么多！世界最高哪座山？珠穆朗玛峰占先。先生先生你错了，今天要算棉花山。”

我在当时的一则日记上也写道：“今天在外一天，走了巢县和肥东两县地方，印象最深的是生产与文化相结合的情况。标语之多几乎到处发现：墙壁上、屋顶上、田岗上、河塘边、堆肥上、山坡上，如‘一马当先，快马加鞭’、‘美军滚出台湾’、‘以钢为纲，万众一心’、‘棉花白如霜，人人喜洋洋’。”

我们在安徽走了蚌埠、淮南、合肥、巢湖、安庆、金寨等地，参观了钢铁厂、水闸、煤田、棉田等，处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转过年的春三月，全国政协又组织我们去黔中参观学习。贵州省，在先秦被称做贵方、牂牁国、且兰国，秦时称为黔中郡，汉时称做夜郎国，直到元代才有贵州之称，明代始设贵州省。此地矿产丰富，已发现的有铀、铝、汞、铅、锌、煤等50余种。少数民族杂居，有苗、布依、侗、彝、水、回、僮、瑶等族，占全省人口的26%。

为了解贵州的历史情况，参观之余，我常常翻阅旧的黔报，一天，读到1909年3月28日黔报，上载“贵州风俗改良论”，言过去贵州蓄婢之风甚盛：“贵州五年以前十龄若十余龄之女子，其为值不过银十两。近稍稍昂矣，然尚不及二十两。微叹悲哉，人命之代价也！夫其得之也愈贱，故其蓄之也愈多。蓄之也愈多，故待之也益虐。平均计之，旬日之间，警署常获逃婢二三辈。验其身则皆有伤，伤之重者极于炮烙。若仅施以竹木之刑，其仁爱乃为备至。至于饥厄其食，寒削其衣，摧挫于无形，以夭其天年者，乃不可胜数也！”这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旧社会贵州劳动人



民的悲惨遭遇。后来参观贵州民族学院时，我们又进一步了解到汉族地主对少数民族的压榨，从陈列的文物中看，苗民用秧草编的被子整整盖过18年，一件布衣穿了20年，已破烂不堪，不知其原先的颜色。地主还经常设法迫害苗民，他们烧一锅油或煮一锅稀饭，放一把铁斧在内，要苗人挨个取斧，如手上无泡则无罪，否则就证明其偷盗或放蛊，以罗织罪名。

解放后这几年，贵州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至1951年，先发生三变：脸色变，吃到盐，吃得饱了；服装变，贫富拉平，都有衣穿了；生活习惯变，没有乞丐了，街道面貌大变。1951年至1956年，生产力大大提高，农村的缺粮户也少了。1956年至1959年，全面大跃进，大兴水利，林、牧、交通大发展，并且建起了重工业。

我们去遵义地区参观时，亦了解到解放前人民生活的痛苦：如正安县的地主买农民的孩子去殉葬，大多10岁左右，男女均有，每名仅用数十元；毕节的土司享有“初夜权”；有的地主的狗死了，诬其佃户所杀，于是罚佃户为狗戴孝；动辄对农民实行酷刑，或抽脚筋，或挖眼珠；农民有被子的很少，一般是堆一堆玉米皮，每天钻进爬出；桐梓县黄连乡一姓彭的农民留下一件穿了53年的衣服。等等。而现在毕节农民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已有9/10的人有被盖，7/10的人有棉袄了。

在遵义，我们去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会议是在楼上举行的。楼上有房4间，一间是毛主席的休息室，两间住卫队，一间为会议室。卫队士兵在房中写有标语“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白军兄弟不要打、不发饷不打仗”，这是解放后墙上白粉掉了才发现的。据介绍，会议参加者18人如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陈云、刘少奇、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秦邦宪、邓发、凯丰、杨尚昆、刘伯承、董振堂、李卓然。开会时有三种座位：①茶几式凳子，②有靠背的椅子，③有靠背又有扶手的椅子。毛主席坐在第一种座位上，门



口为王稼祥同志，因当时受伤无法坐起来。

黔中参观回程时，我们经柳州、桂林、衡阳、萍乡、宜春、鹰潭、杭州，抵上海。我到上海公用事业管理局去找胞妹素雅。再约好二弟克敏，一道回无锡家乡。父母此时均已去世，我兄妹三人上山去祭扫父母亲的墓。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这在3月初我们赴甘肃参观的途中就体会到了。火车中过去是一日三餐制，现在却无早餐，改为两餐制了。车中零售的食品也断绝了，只是不断地从广播中播送音乐，大有饱尝音乐的意思。车到定西，站上有卖饼的，人们蜂拥下车，排成长队买饼，有一人买8个饼的，但大多数因未能买到饼而大失所望。

我们在兰州拜访了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副省长马青年。参观了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学院、兰州大学、兰州炼油厂等。省府还安排我们到天祝藏族自治县参观。我们坐汽车经过2500米的乌鞘岭，越过酒泉那段长城，就见到大片的草原、牧场。县长及一副县长是藏族人。副县长马才恩仁增招待我们一道吃糌粑，他的饭量好大啊，我只能吃他的1/10而已。

县里安排我们参观永丰大队的红疙瘩小队，我看到小队办公室里挂着许多奖状，其中有周恩来总理授予的奖状，上写“给予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时间是1958年12月。牧民对新旧生活进行了对比，以往无房无帐篷，无布穿羊皮，无被子，羊皮日穿夜盖，用木碗，吃青稞……没有学校、商店，更无防疫站。1952年开始才建起土房，牲口有了圈，开始穿布衣，有了各种鞋子，有被盖。1953年建起防疫站，1954年成立学校，1956年建起了商店。

我们在兰州住在宁卧庄招待所，过去这里是苏联专家住的。据张仲良书记说，过去来住过的苏联和外国专家前后仅百余人，今年将达到400人。又与农业厅厅长谈了甘肃的粮食问题，与省第二书记高健君谈了甘肃地理的沿革。甘肃调查到此结束，10天内的所得可说是有些了解，不虚此行。



三年困难和“四清”

1959年我老伴淑型退休了，她不甘寂寞，仍继续做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并主动兼任摄影学会服务部主任，《中国建设》杂志图片顾问。她还将自己几十年来收藏的珍贵摄影资料，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摄影学会。包括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抢拍下来的4张珍贵照片；40年代在美国拍摄的反映美国下层人民生活的照片等等。1960年“三八妇女节”，她被全国妇女联合会选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我特做一诗以贺之：“寿逾花甲敢任事，家庭社会一身治。敏捷犹似冠笄年，好意急公立远志。写生妙笔挥兰竹，摄影导入衍教育。博得三八红旗手，展览名作幅有九。男有显爵勋光禄，君非丈夫亦能为民造福。”

回国这十几年，她拍摄了许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壮丽山河的好作品，其中《波兰舞蹈家拉波波特》、《玩具》被选入全国摄影展览；《女测量队员》、《多宝塔》、《长廊》参加了全国女摄影工作者影展。

1962年，我与淑型同游富春江，见江边风景异常美丽，时值深秋，落叶纷纷而下，不禁想到我俩均已年过花甲，因而在回程赴桐庐途中，互相嘱托去世后将骨灰撒于此处。

这几年没有外出，平日事情亦不多，所以倒写了不少诗篇。而淑型则常常演奏古筝，优美动听，可谓“绕梁三日不绝”。怡然自乐时，写诗一首，以记其景其情：“老伴临窗奏七弦，笑予兀坐对诗笺。仙娥隐士芬芳满，二月春花好自妍。”

又有一诗，曰《自幸》，记叙自己的过去、展望未来，也颇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亦习亦传度此生，此生向未喜逢迎。明知天际夕阳晚，律细犹能动我情。”



1962、1963年，挚友李克农、冀朝鼎相继去世，甚为伤感。当年一同出生入死的朋友，一个个离我而去，如史沫特莱、佐尔格、王寅生、高仁山等，一一作诗以记之。所喜之事是与日本友人中岛节子断绝25年联系后，又接到其来信，知其已与中岛样成婚。我复信，并赠七绝一首：“品居打字置机台，廿五年前此徘徊。蓬岛故人今缱绻，佳音越海远飞来。”

天灾人祸，造成人民日常生活极为艰难，一食一衣，来之甚难，可喜的是国际关系研究所夏仲成等7同志组织起英文补习班，在半饥馑中坚持苦学外文，令人感动，故作诗勉之，记得有几句是这样的：“七贤自组英文课，邀我参加共舌耕。”“句斟字酌勉勤奋，学问之功宜晚成。”

1962年刚过新年，又组织我们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浙江去参观，同行的有荣毅仁、于学忠、千家驹、宋云彬等。顾淑型随我们一道前往。过上海时，去见了素雅一家。

在浙江，我们受到浙江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霍士廉的热情接待，向我们报告了浙江近年来经济工作的情况。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我们见到了一幅1961年仅用22天时间设计的一幅（黑白）中缅边境条约签字仪式的织锦图，图中有110个人物。此时正在设计一个中尼条约签订仪式织锦图。

省府又安排我们去参观处于建德境内的新安江发电站及水库。这个水电站是我国自行勘测、设计、施工并用我国自制设备建设起来的第一座巨型水电站，通过电站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积累了建设经验，对我国发展水电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大办水电，在浙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浙江煤产不够，以水电代之，称之白煤。据介绍，建设水电站，就等于办一个学校，从1958年以来，已培养了5000余名技工和600多名干部。现蓄电站共有职工110人，平均年龄仅21岁。

在绍兴，我们除了参观鲁迅纪念馆、鲁迅旧居、三味书屋和秋瑾纪念馆、秋瑾碑、秋瑾殉难处外，还参观了鉴湖边的云集酿



酒厂和绍兴制扇厂。云集酿酒厂生产的酒行销南洋各地和日本、加拿大、西德等国，主要出口香雪酒、加饭酒和善酿酒三个品种。而绍兴的制扇业，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我们还有幸去宁波参观明代嘉靖年间进士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了。康熙年间，此处藏书最多时达7万卷，现存13000卷，均为宋版、明版，据说有90%以上为海内孤本，最为名贵的是有270多种明代地方志。我又与宋云彬一起访问了宁波著名的藏书家朱赞卿（朱鼎煦）。此人学识渊博，对答如流，据介绍，他正在编《藏书家名称印鉴综录》，已用了49年功夫，参考了160多种书。在朱处见到三种书，为海内孤本，一为马欢的《三保征夷集》钞本，计45页，明永乐十四年所抄，即郑和出洋归来不久。马欢到过20多个国家，书中讲了所到国家的情况。一为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三卷，2本40余页，内容涉及36国。一为罗懋登的《太监西洋记》10本，小说体，100回，为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出，乃近百年前印本。

省委还安排我们参观了普陀山和雁荡山。据说，1961年来雁荡山参观的人数达30万。引起我们游兴的是瓯江的江心寺，它在江心一孤岛上，建于1500年前。宋代王梅溪在寺前题有联句：“云朝朝 朝朝朝 朝朝 朝散；潮长长 长长长 长长 长消”。

南朝·宋诗人谢灵运第一次记载了江心寺。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这里住过，并赋诗，有这样四句：“池塘芳草年年绿，谢公胜事遗江楼。孤臣涕泗如此水，恨不从帝崆峒游。”

经过20天参观游览后，于元月27日回到上海。见到孙晓村、汪熙、吴大琨等同志。

到1963年，经过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情况大为好转，靠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一心，我们战胜了三年困难。

从这年冬天开始，在全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



“四清”，机关干部纷纷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搞到1966年，接上了那场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

外交部派出的工作队在晋西地区搞“四清”，去过几批人，到1966年初，让我们这些老同志也下去看看。2月16日，从北京出发，刘思慕、丁谷等来车站送行。第二天抵大寨，由陈永贵陪着参观。据介绍大寨“人们建立了集体生产的坚定思想，1964年取消了自留地，也没有定额包工制了”。当晚住在阳泉，听山西的同志说，1964年春节，太原附近的天主教徒聚集4000多人闹事。他们在山洞里用闪电让人迷信，说圣母要求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四清”，派了一万多民兵才镇压下去。又说，1950年牟平的群众曾结伙去五台山捣毁寺院，恰毛主席路过，下达指示，才保住了五台山的许多重要寺院。

省委安排我们沿途参观太原市容，太谷师范学院和晋祠。太谷师院是孔祥熙的故宅，1936年宋美龄、蒋介石曾来山西动员阎锡山出兵打延安，住在这里，同年底发生了“西安事变”。在汾阳参观汾酒厂时，我第一次碰到了巴金，我们两人很是投缘，遂成为好朋友。巴金为酒厂题词：“人好、酒好、工作好，参观一回忘不了！”

“四清”工作团部设在汾阳峪道河公社南崖底村，在这里，我见到了刘新权、耿飆、张彤等。此时，四清正处于复议阶级成分阶段，我们去听了几次斗争会和复议会，团里的一些同志来谈情况，都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大，而且已经潜进农民心里。我觉得他们不能以“一分为二”观点看问题，片面性很大。

我常同耿飆一起出去参加各种会议，他背支猎枪，有一次，在前方大约80米处有一乌鸦，他一枪就将乌鸦打下来了。又一次，我同他谈起农村演电影的事，说电影不如幻灯，可以结合形势绘制幻灯片，耿飆很以为然，说等他回缅甸后，要向峪道河公社捐助一部幻灯放映机。他召集从北京来的社教工作队开会，提出如下意见：优点，三同做得好，领导学《毛选》较好，抗旱干



劲十足；每天晚上工作到12点以后，发动贫下中农，使他们敢讲话了。缺点是对公社联系不够，不通过大队就决定问题，有包办现象；学习《毛选》只强调放卫星，而不求普通的效力；诉苦会还开得不够，等等。“四清”中，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很积极，也颇有些先进典型，如一个老农不识字，让女儿教他认字，一家四口学《毛选》；一个叫魏改莲的女青年剪辫子卖了5角钱，买一本《毛选》乙种本；70多岁的老贫农张振宝在衣服上缝了一个大口袋，装本《毛选》，走到哪里，随时拿出来请人读上一段。等等。

在山西，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地方天主教徒不少，仅汾阳一县当时就有教徒960人，其中16岁以下的有280人。据说，山西新绛人韩霖在北京做官时，认识徐光启，受洗入教，起教名多默。他回乡时，引意大利人艾儒略到山西传教，时值1620年，由此天主教由南向北在山西传开了。1635年比利时人金弥格来山西做神甫。1902~1939年，晋北的教堂从200个增加到646个，教徒从13000人增加到83431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由法国传教士控制的天主教区，被美国人控制起来。1948~1950年，美籍神甫翟光华、裴有文、葛怀人，法籍耶稣会长格寿华仍在中国潜伏、活动。“圣母军”是国际性特务组织，太原的“圣母军”是1950年春天成立的，与阎军有勾结。1965年3月，太原天主教举行反革命骚动，骂四清工作队是魔鬼。7月1日，有一千多天主教徒包围工作队宿舍，打伤“四清”干部。7月11日，郊区5000多人扛着十字架游行。后来，政府派出万余名民兵才将其镇压下去。

我们从山西回来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文革”时期

1966年12月底一天晚上，忽然有一辆汽车停在我东华门的住宅门口，来人声称外交部有事，要我去。我上车后，车上已有两三个人，汽车将我们拉到东交民巷外交部招待所。到那儿，我见到了刘思慕和李纯青，但我们不住在一起，都被隔离起来。第二天，有人来问我同外国人有什么来往，通信没有，他们来了接待了没有等等。三天后，我被放回了家，真是莫名其妙！到家后才知道，我被带走后，顾淑型很着急，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说明了情况，宋庆龄又打电话给周总理，是周总理指示将我释放的。

又过了几天，有一些“红卫兵”，大概是中学生到我家门口大喊：“阳翰笙出来！阳翰笙出来！”他们一个劲儿地叫，我只好到门口，说：“我不是阳翰笙，我叫陈翰笙。”说明白后，这帮人走了。谁知没过多久，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又来了，乱翻我的书。这些人走后，我感到要出事情了。于是，将我在外国得的文凭、奖章等，都翻出来，晚上将证章都丢到日坛公园的湖里，文凭则撕碎埋在树下。顾淑型很聪明，她说：“可能还会来抄家，我们要有所准备。第一，将毛主席、周总理的联名请帖找出来，放在抽屉里最上层，第二，将宋庆龄来的信全部烧掉。果然，有一天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又来了，他们翻箱倒柜，拿走了一些书。后来，一个红卫兵开抽屉发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请柬，大叫：“你们快来看，有这个东西！”许多人围上去看了，他们真有些害怕了，连说：“快走！快走！”一窝蜂地跑了。后来他们再没有来过。

“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也逐渐开展起来，所长孟用潜因与刘少奇一道在沈阳坐过牢，被认为是“刘邓黑线”上的



人物，关押审查。我是副所长，一开始还没什么事，到1968年春上，说我有问题，要进行审查，不准离开研究所了。我住在楼上，一起被限制离开研究所的还有李纯青，我们各住一个房间，每天都见得到。

为什么关我，我不清楚。有三四次，是将我带到另一个地方，由军人审问，要我交代问题。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他们说我不老实，要我跪下，我不肯；他们就扯着衣服死劲按我，我索性倒在地下。审我的人没有办法，就说：“算了吧，算了吧！”我就两腿一伸，坐起来，他们拿我毫无办法。有几次，将我拉到外交部去批斗、游街，挂个黑牌子，戴个纸篓子，一般我都是陪斗。

我被关在所内，即现在巴基斯坦大使馆那个地方，不许我回家。顾淑型可以来送东西给我吃，可以将我的衣物拿回去洗，洗好送来，但不许和我见面，吃的，用的都只能放在传达室。每次传达室将东西转给我，我就知道顾淑型来了，于是赶紧打开楼窗户，从这里能够看到顾淑型回去时从围墙边走过。

我被隔离，淑型一人在家，已到古稀之年的她真是度日如年，不久疾病缠身。1968年11月初，淑型病危，我由两个搞专案的人押着回家，见淑型病卧在床，她见到我，说：“我腰部生了癌，已经无法救治了，你今晚不要回去了吧？”我说：“那得要问问他们。”那两个同来的人却说：“不行！”在那个时候，我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只好忍痛离去。过了两天，淑型去世了。又由两个人押我回家料理丧事。我到家一看，淑型的遗体已被搬到院中一块板子上。正当我痛不欲生，伏在淑型尸体上哭泣时，那两个押我回来的人却忙开了，一个人跑进房间去，拿走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印度人送给我的地图集；另一个人姓马，是个司机，还是个党员，竟当着我的面，从淑型手上摘去戒指，我说：“应该留给我做个纪念！”他不理，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了。

我仍被关在研究所里，有一天，那两个军人又来了，这次比



较客气，他们拿出一个委任状给我看，问是不是真的？我一看，是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所长蔡元培先生委任钱俊瑞为研究助理的。我说，那时，蔡先生兼社科所所长，我是副所长，蔡先生在青岛时，我曾写过一封信给他，推荐钱俊瑞到所里工作。

过几天，我就被放回家了。后来，我才弄清楚，原来专案组怀疑我是国民党CC派特务。“造反派”审查钱俊瑞时，在他解放前的日记中发现一段话，记载30年代我到南京CC总部去讲演、陈立夫怎么招待我等等。这件事我在前面已详细讲过，当时只是应付而已。这时却怀疑我是CC分子了。第二件事是，何思源与CC的上层人物比较接近，我同他比较熟悉，顾淑型为十九路军募捐时，特意到山东找过何的外籍夫人。“文革”中，有人向何思源调查，问陈翰笙是不是CC，何思源说：“他不是，他是新中学协会会员，我们是在新中学会认识的，与CC无关。”我因为这两件事牵连，被关押审查了9个月。

1969年，我被发配到外交部在湖南茶陵的“五七”干校劳动，每天在菜园中劳作。这时，我患青光眼，视力急剧下降，由于看不清，劳动时经常踩坏小苗。他们只好将我调出菜园，让我清扫厕所，送信送报等。整整两年的时间，我几乎成了瞎子，却不能去医治。此时，心情也是十分忧郁的，国难家破，亲人远离，1970年中秋夜曾写一诗，可看出当时的心情：“我似浮云滞茶陵，愁心一片有谁矜？今宵明月照京沪，好把心潮寄友朋。”

在艰难的日子里，有好心的朋友劝我去找周总理，周总理了解我，也一定会帮助我摆脱困境，但我从报上看到他那日益消瘦的面庞，真不忍心再去打扰他。也有人劝我去找康生，是他在莫斯科将我从共产国际转入中国共产党的，应该说他了解我的情况，但他那一副小人得志、飞扬跋扈的样子，真令人作呕，就是这些人祸国殃民，我岂能卑躬屈膝去求他？！

1971年，我被“照顾”回京。途经上海时，素雅请了著名的眼科专家为我检查眼睛。医生看后，十分惊讶地说：“这么严重



的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也萎缩了，怎么不早点来看呢？”1976年，我再去看眼病，医生一再嘱咐我：“千万不能看东西了，要保留一点视力以做到生活能自理。”但我总不能闲着什么都不干哪，于是照样写文章、教英文。1983年，我又去看眼睛时，检查结果，右眼几乎失明，左眼仅剩0.02的视力，素雅伤心地哭了，我解嘲地说：“嗨嗨，青光眼加白内障，现在我是一青二白了！”

淑型去世后，我形影相吊，孤苦无依，经常是“挑尽孤灯待晓天”。集离愁思绪，写成《悼淑型》20首，回顾了我俩风雨同舟，为革命国内外奔波的50年。从干校回来后，我可以实践诺言，将淑型的骨灰撒掉了。1972年1月下旬，我由素雅、炳宏陪同，来到桐庐的窄溪（富春江的一段）将淑型的骨灰撒入江中，特题诗一首以志哀悼：“浩荡窄溪送骨灰，凄凄水上我徘徊。何时物化应作伴，携手夜台笑语陪。”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6月，中国摄影学会才为顾淑型举行追悼大会，宋庆龄、宋任穷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英语学习班

从茶陵干校返回北京后，作为一个“待分配的干部”闲居在家，心情十分苦闷：“尔今幽居东华门，岂可长期成闲散。”这时，我看到一些年轻人也都无事可做，每天东逛西游，这样下去岂不毁了年轻的一代。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决定引导一些年轻人学一两门外语，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日后为祖国建设服务。于是，我就在自己的住所——东华门38号办起了英文学习班，辅导上门求教的青年学习英语和德语。在那样动乱的年代中，有人劝我少惹些事，我说：“我本来是个教授，教书是我的本份！”

英文班开设后，许多人登门求教，我是“有教无类”，来者不拒。后来刘少奇同志的孩子，王炳南、万里同志的孩子也都来了。这可急坏了我的一些亲友，在那动辄得咎的年代，居然收一些“走资派”、甚至是“头号走资派”的子女学习，真是自找麻烦。我不怕，我想，我陈翰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免费收学生，总不犯法。刘少奇就是有问题，他的子女是无罪的，他们可以上工厂当工人，为什么不能到我这儿学习呢？我们是共产党国家，难道还搞封建株连、罪及妻孥那一套？！我先后收下十多个“黑帮”子弟。不久，我们单位一个负责人找上门来，说：“听说有许多人在你这里学习，你开个单子，将他们的姓名、父母的姓名及所在单位都写清楚。”我马上开了个单子送上去，仍然教我的学生。

教学生的教材，是我自己选编的，都是从国际消息原文稿和外文书籍中摘编的，内容包括五大洲的政治、历史、教育、社会风俗各个方面，这样学生不但学习了外文，也认识了解了外部世



界。后来，这些教材编成《英美短篇时文选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教学中，我给学生8个字——多读多背多写多改，强调说、读、听、写并重，反对死抠语法。在检查学生的作业时，我让他们每个人读自己的作文。一边听一边随时指出他们作文中的中、英文语病，学生如有不同意见，也可提出大家讨论。对不同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要求，如对资华筠，就针对她要出国进修、交流等情况，给她出一些作文题，如“我的简历和日常活动”、“中国舞蹈浅谈”、“给友人的一封信”等。

十多年来，在我这里学习过外语的有300多人，我的学生有各种人，有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也有过了“不惑之年”的大学讲师、副教授，还有工人、厂长，甚至著名的演员。记得1979年10月，一位姓郝的年轻工人给我写信，并寄来他自己编写的《社会学原理》四章。这个年轻人钻研学问的精神可嘉，但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确实不高，我约他来谈，并将他吸收到英文班学习。一个姓王的厂长，虽然英文水平不高，却敢于在课堂上大胆提问，争取实践的机会，学业进步很快。我就喜欢这样积极进取的年轻人。资华筠在我这里学习几年，现在出国访问、演出可以用英语直接对话、交流，工作起来十分便利。还有一个学生叫牟瀛，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教师，她现在到美国进修，经常有信来。我教过的学生，有100多人在美国留学和工作，还有不少人到了日本和欧洲，他们都常常给我写信，报告在国外生活、工作情况。

除了教年轻人学习英文外，我还自己找了一件事来做，就是编辑华工出国史料。30年代我在广东搞农村调查时，那里大多是侨乡。由于帝国主义的渗透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使广东农村相当一部分男性农民不得不流落他乡或海外，生产中女劳力多，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退化，广大侨眷只好靠侨汇度日。一旦由于种种原因，汇款来不了，侨眷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卖儿卖女以求生存。1932年冬天，我在广东美国领事馆曾阅读



到西方殖民者掠夺我国人口的真实记录，了解到广大华工的深重灾难。当时我想，今后如有机会，我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后来，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我几次出国工作；解放后又忙于外事和一些行政工作，一直没有时间研究华工问题。“十年动乱”中，广大归侨因“海外关系”惨遭迫害，我党一贯坚持的统一战线政策遭到破坏。这种情况，更坚定了我研究华工史的决心。1972年从干校回京后，我决定做这项工作。我请卢文迪、彭家礼、陈泽宪同志帮忙，一道进行编辑工作。

我国沿海劳动人民成群结伙随商船去南洋做工，大约从16世纪就开始了。但是，作为贩运牟利的对象，被诱骗出国的契约华工，是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从19世纪开始，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加，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历时200年出国的华工约达1000万人次，其踪迹遍及世界各地。研究历史不能就事论事，研究华工出国问题也是如此，要将华工出国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看。华工出国这200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侵略扩张，野蛮掠夺海外殖民地，残酷奴役落后国家人民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缓慢解体到濒于崩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成千累万的华工被掠骗到国外当奴隶，正是在这两种制度一消一长的过程中出现和发展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分10辑，计300多万字。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主要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从《钦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等资料中辑录出来的有关华工出国问题的官方文献，这是研究华工史最有权威性的史料；第二辑为《英国议会文件选译》，第三辑为《美国议会文件选译》，是从英美官方文件“蓝皮书”和“白皮书”中辑录出来的。这三辑互相印证，为我们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外反动势力贩卖我国人口的罪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第四辑《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私人综合性著作和资料》，辑录了一些中外人士日记等中有关华工、华侨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华工的苦难以及他们对侨居地的贡献。第五辑至第十辑则分别辑录了东南亚、拉



丁美洲、美国和加拿大、大洋洲、非洲和欧洲的华工史料。现在，这套资料汇编已由中华书局出齐。

在“四害”横行的岁月里，我感到十分苦闷和痛心，老一辈革命者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的事业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我经常在家中骂江青他们，并在外语教学中用造句的方法怒斥他们，如“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人类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即使某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出现逆流也是暂时的”、“漫天的乌云挡不住太阳”等。1976年4月，爆发“四·五”运动之前，听说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请我的学生扶着我去天安门广场，听人们朗诵声讨“四人帮”的诗歌、檄文，心中感到无比痛快！

1976年10月获悉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也作诗一首以表庆祝：“国本宁容祸水摇，睿谋英断扫群妖。‘四人帮’已成垃圾，薄海欢腾意气豪。城狐社鼠为朋党，一鼓擒之净庙堂。十载阴谋终一梦，臭名世界远传扬。”



心 愿

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从根本上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我从心里感到畅快，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1979年，我已82岁，却跟人开玩笑说：“谁说我82岁，我还只有28岁，年轻着呢！”于是有人戏称我为“28岁不老翁”。

从1978年以来，各种学术活动多起来，我也忙了起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聘请我为兼职教授，中亚文化研究会选举我为常务理事。我还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问以及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社会科学情报、南亚和世界历史四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此外，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编委会主任、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等职。除参加众多的学术会议、交流活动外，还要接待各种来访者，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解决各式各样的公私问题。我每周都有工作日程表，一般每日三段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节假日也不例外。

如今，我已是90岁的人了，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想集中精力抓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二是要恢复工业合作运动。

党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我们能面向世界，开阔眼界，但是我们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首先了解世界，不仅要了解世界的今天，而且要了解世界的昨天和前天。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这里有一个向历史借鉴，特别是向外国



历史借鉴的问题。我们应该去了解、探讨世界历史的一些重大课题，如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各国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是怎么兴起的，美苏为什么实行扩张政策，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因后果，等等。了解、探讨这些问题，对我们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有借鉴作用。据我所知，资产阶级是很懂得研究别国的历史的。目前，美国许多大学都开设中国历史课，欧美的历史杂志中也有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可是，自“十年动乱”以来，我们却长期忽视对历史、特别是外国历史的学习，据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1982年调查，河北省历史教师14483人，其中学过历史专业的仅653人，占4.5%。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上述情况，我出任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要用自己的知识，为普及外国历史服务。“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是以吴晗同志为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的一员，我还自己写过一本《印度莫卧儿王朝》呢！1979年，外国历史小丛书恢复出版，我认为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接受邀请出任编委会主任。尽管我的工作比较多，但还是每星期抽出半天时间指导小丛书的编辑工作。我一贯主张写与当前事物有关的，而前人又很少写过的选题，对于那些反复出过的，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古代埃及等倒不一定求全。1983年编辑部的一些同志为小丛书发行数量逐渐减少而犯愁，我得知后即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呼吁解决出版发行也“一切向钱看”的不正之风。现在外国历史小丛书已出版250多种，今后将继续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合订本，以期使之成为大学、中学图书馆的必备书，起到外国历史小百科的作用。

另外，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和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的兼职教授，并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做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的编辑主任，也都是为了将自己平生所学得的知识通过多渠道、更多地传授给年轻人。



恢复工业合作运动，是路易·艾黎、卢广绵和我这些老“工合”的愿望。随着经济搞活，尤其是要发展多种经济，我们感到恢复“工合”运动已势在必行，因而从1983年已着手恢复。1984年中央文件规定，土地承包15年不变，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有了保障，农村的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因为农副产品丰富了，需要贮藏加工，需要制造工具，铁、木、竹、泥、瓦五匠有了事情做。但是，这些手工业专业户害怕原料断绝和没有销路，不敢放手大胆去干，而且也缺乏技术指导，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合作社。在广大乡镇开展“工合”运动，对用户和消费者有帮助，对农民离土不离乡有帮助，对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有帮助，对活跃城乡经济有帮助。总之，在广大乡镇开展“工合”运动，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恢复发展“工合”，前三四年成立了工业合作协会，挂在轻工业部，下面有一些手工合作社。但有的人却打着这个名义到处活动，拉公司、谋私利，歪曲了“工合”的宗旨，因而，我与艾黎、陈必娣、卢广绵等另外组织起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有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也从国外寄来一些捐款，建立了一所培黎大学，要训练人，使人了解合作社的历史、作用、什么样的组织才是工业合作社以及合作社在现阶段的意义等，要请中外专家上课，目的就是要办起真正的“工合”、名副其实的“工合”，在新阶段将“工合”运动推向前进。



陈翰笙活动大事记

1897年

2月5日 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东门城头弄。取名枢，小名翰生。

1903年

进东林小学读书。

1909年

考入长沙明德中学。

1911年

6—9月 到北京报考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生，落选。

1912年

进长沙雅礼学校读高中。

1913年

与徐正祥之女徐冰文定亲。

1914年

春 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听美国化学教授罗伯特讲“金山橙”，萌生去美国留学的念头。

1915年

秋 乘“中国号”轮船，赴美留学。考入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

1916年

考入波莫纳大学，选学植物学。

1917年

因视力不好，改学地质学。

1918年



遇后来成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卫斯特加德，改学历史专业。

1919年

到校办《学生周刊》做编辑。

结识李景汉、焦墨筠、何廉等人。

1920年

夏 波莫纳大学毕业，被接纳为菲尔培塔凯巴协会会员，获协会颁发的金钥匙。

参加“中国留美同学会”，任秘书，负责编辑《中国留学生季刊》。

1921年

参加新中学会，结识高仁山、查良钊等。

完成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硕士学位。

冬 在美国西雅图与顾淑型结婚，改名翰笙。

1921年冬至1922年2月

参加“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去华盛顿劝阻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团在《九国公约》上签字。

1922年

初 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

春 游览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

进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

1924年

完成论文《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使节会议》，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4月 应蔡元培先生邀请回国，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下半年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讲美国宪法史，不久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兼课。

1925年



经李大钊、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6年

经李大钊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介绍加入第三国际。开始为《国际通讯》供稿。

3月18日 参加“三·一八”反帝反军阀政府游行，事后写《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发表于《现代评论》上。

1927年

1月 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之邀，与王世杰、周鲠生一道赴外交部工作。

2月底 谎称“母病”返京，奉李大钊命暂停活动。

4月4日 去东交民巷中东铁路办事处看望李大钊。

4月6日 在李大钊被张作霖部逮捕后，立即经天津去日本，转赴苏联莫斯科，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

与马季亚尔发生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争论，萌生对中国进行广泛社会调查的思想。

结识邓演达，由他介绍拜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1928年

5月 绕道日本回国。

夏 经蔡元培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工作。

1929年

春 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

陆续聘用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一批有志青年。

对上海日资纱厂进行包身工制的调查。

夏 到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调查流亡国内的东北难民问题。

7—9月 对无锡农村进行调查。

结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秋 带领史沫特莱进行无锡地区的农村调查。



结识里哈尔德·佐尔格。

1930年

5—8月 进行保定农村调查。

1931年

8月 将蔡元培先生的信设法送给陈诚，以营救被捕的邓演达。

1932年

2月 与佐尔格结伴去西安执行任务。

1933年

4、5月 经常为宋庆龄与律师之间传递信件，以营救牛兰夫妇。

6月18日杨杏佛被刺杀后不久，辞去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应聘去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

8月 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发表英文论著《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

与吴觉农、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会主席；不久，创办《中国农村》月刊。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

进行广东农村调查和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的调查。著《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

1934年

冬 以中山文教馆和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身分赴日本东洋文库工作。著《中国地主与农民》。

结识郭沫若，共度1935年元旦。

1935年

4月 回国。由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外国朋友掩护出逃苏联。

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



年底 根据工作需要，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经手转入中国共产党。

为苏联校对俄文版中国地图。

1936年

4月底5月初 根据苏联太平洋学会分会安排，到美国纽约协助欧文·拉铁摩尔办《太平洋事务》季刊。

1936年至1939年

在纽约办《太平洋事务》季刊，并协助饶漱石办《华侨日报》。

1938年

初 到加拿大十几座大城市演讲，介绍“西安事变”真相。

1939年

5月 按党的指示，赴香港协助宋庆龄搞“工合”运动，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并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

创办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

1940年

10月 绕道缅甸到云南西双版纳进行傣族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调查，一道工作的有刘述舟、陈洪进。

年底 回香港时转道重庆探望父母。

1941年

通过《远东通讯》第一个向国外报道了“皖南事变”真相。

1942年

2月 香港沦陷后，化装逃出；经澳门、四会、梧州，到广西桂林。

1942年至1944年

任广西桂林师范学院西文系主任。

1944年

3月 由于李济深、陈此生透露重庆政府将缉捕的消息，在英国朋友帮助下，经昆明逃往印度。



在印度德里大学做评卷员兼英国远东情报局译员。

冬 到乌岱普列席印度史学会年会。

1945年

二战结束后，离开远东情报局，到印度史学会工作。

对印度进行经济区域划分的考察，足迹北到阿富汗边境的信德，南到印度洋海岸，东到加尔各答，西至孟买。后来完成了专著《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

1946年

4月 应邀赴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聘教授。

到波莫纳大学、华盛顿州的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演讲，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10月 发表《中国官僚资本与内战》。

1945年至1950年

在约翰·哈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

其间亦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亚洲研究所工作过。

1950年

冬 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绕道欧洲回国。行李、书籍在托运途中，过台湾海峡时被劫往基隆。

1951年

1月31日 回到北京。

2月 辞谢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

3月底 接受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委托，筹办英文版《中国建设》，任编委会副主任。

与曹禺等人将史沫特莱骨灰葬入西郊革命公墓。

9月20日至12月28日 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缅甸访问。

1952年

4月 赴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



英文版《中国建设》创刊，为编委会副主任。

7月 到德国柏林参加第三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之后，与马寅初、李一氓组成文化代表团访问捷克与保加利亚。

1953年

当选为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出任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

1955年

4月 出席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

6月初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6月8日 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

1955年12月至1956年2月初

随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缅甸。

1956年

2月 出任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

4月 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

随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六国。

1958年

出任刚成立的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创办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8月 参加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参观团到天津、塘沽参观，同行的有顾一凡、顾以岱、陈应等。

9月 随全国政协参观团到安徽参观，同行的有赴朴初、梁漱溟、翁文灏、申伯纯等。

1959年

3月 随全国政协参观团赴黔中参观学习。

1960年

3月 赴甘肃参观。



1962年

初 随人大、政协参观团赴浙江参观，同行的有荣毅仁、于学忠、千家驹、宋云彬等。

1966年

春 到晋西参观“四清”运动。

1966年12月至1968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多次被抄家、隔离审查。

1968年

11月5日 夫人顾淑型被迫害致死。

1969年至1971年

“下放”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

从干校回上海看病，双眼已几近失明。

1972年

1月 到浙江桐庐窄溪（富春江的一段）撒放夫人顾淑型的骨灰。

在家中免费教授英文、德文，并开始着手编辑《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1973年至1978年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1973年至1980年

为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

1978年

被聘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

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社会科学情报、南亚和世界历史四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

1979年

被聘为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

被选为中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1981年

3月至4月 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被聘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顾问。

1985年

被选为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庆祝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大会。



陈翰笙著作、文章目录

著作：

- | | |
|---|----------------|
| 人类的历史 | 上海1921年版 |
| 人类的故事 | 北京1925年版 |
| 国际新局面 | 北京1925年版 |
| 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与王寅生合著) | 上海1929年版 |
| 难民的东北流亡 (与张辅良等人合著) | 北京1930年版 |
|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 | 北京1930年版 |
| 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 | 上海1930年版 |
| 亩的差异 (与王寅生等人合著) | 上海1930年版 |
| 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 上海1934年版 |
| 华南农村经济问题 | 上海1936年日文版 |
| <i>Agrarian Problem in Southernmost</i> | 纽约1936年英文版 |
| 中国的地主和农民 | 纽约1936年英文版 |
| 工业资本和中国农民 | 纽约1946年英文版、日文版 |
| 中国农民 | 孟买1946年英文版 |
| 中国工业合作社史话 | 纽约1947年英文版 |
| 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 | 纽约1949年英文版 |
| 美国垄断资本 | 北京1955年版 |
| 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 | 北京1959年版 |
| 印度莫卧儿王朝 | 北京1964年版 |
|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10辑) | 北京中华书局 |



文章:

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	
(英文, 芝加哥大学硕士论文)	1921年
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使节会议	
(德文 柏林大学博士论文)	1924年
1925~1927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53篇	
临时抱佛脚	第53期
英帝国主义的前途	第55期
一笔亏本帐	第55期
英国能独吞莫奈尔的煤油吗?	第56期
苏联共产党大会	第56期
十一国钳制中国的协约	第57期
国际间资本的大团结	第58期
裁兵声中的美国预算案	第58期
苏土盟约	第59期
劳资调节的失败	第60期
军阀违法杀人	第61期
回民的联合	第62期
梯罗尔南部的问题	第63期
俄法会议的前途	第65期
急转直下的法国政局	第66期
德国与国际联盟	第67期
国际裁兵会议的前途	第68期
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	第68期
美国资本家的势力	第70期
美国与塔克那阿利卡问题	第71期
美国航空军备的扩充	第72期
俄德协约	第73期
波兰的革命	第76期



属地政策的新发展	第77期
葡萄牙的革命	第78期
西班牙的专政	第79期
美国资本的权威	第82期
匈牙利的亲英政策	第83期
美国政府与农民	第84期
回民联合的大进步	第86期
英国总罢工的失败	第87期
哀哉法兰西	第89期
菲列浜独立的问题	第91期
何以德国能进国际联盟	第92期
法西斯政治的危险	第93期
布尔希维克党内的风潮	第94期
叙利亚革命的挫折	第95期
美国和巴西的关系	第96期
德国的旧经济政策	第97期
伦敦的帝国会议	第98期
布尔希维克的会议	第99期
基督教徒的醒悟	第100期
苏俄的九周年	第100期
英国煤矿罢工成败的关头	第101期
吉海铁路问题	第103期
欧美银行家的宣言	第104期
美国的贫富问题	第105期
汉冶萍借款的抗议	第106期
地中海的战云弥漫	第108期
阿尔彭尼亚问题	第109期
尼加拉瓜的战云	第111期
白沙拉比亚的问题	第112期



印度反对遣兵来华

第113期

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

《北大社会科学季刊》

1926年2月

东北抗日最近情形

《救国日报》 1926年7月

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

《东方杂志》 1928年10月

中国田地问题

《农业周报》 1930年10月

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 《女青年月刊》

1931年4月

中国的农村研究

《劳动季刊》 1931年9月

崩溃中的关中小农经济

《申报月刊》 1932年12月

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英文） 《中国经济》 1933年

破产中的关中贫农

《东方杂志》 1933年1月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 中华平民促进会

1933年版

梦想的中国

《东方杂志》 1933年1月

广东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

《中山文教馆季刊》

1934年

山西阎锡山“土地村公有”真相（英文）

美国《太平洋事务》季刊 1936年9月

论南京政府的内蒙政策（英文）

美国《太平洋事务》季刊 1936年12月

论日本侵略战争的内在原因（英文）

美国《太平洋事务》季刊 1937年6月

评（苏）卡扎明：《中国经济地理概要》（英文）

美国《太平洋事务》季刊 1937年6月

评甘尼斯：《当中国团结一致的时候：中国革命史说明》

美国《太平洋事务》季刊 1937年12月

侵略政策和人口问题

《中国农村》第7期

1937年7月



评贝特伦：《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

美国《太平洋事务》季刊 1938年3月
合作运动与农村机构 《工合通讯》第6期

1940年11月

30年来的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第3期

1941年1月

抗战建国与劳工问题 《中国农村》第5期

1941年4月

目前的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第6期

1941年5月

利贷资本与手工业 《中国工业》第6期

1942年6月

工合和建设 《中国工业》第9期 1942年

美国制钢业的进步 《中国工业》第18期 1943年

目前工合的困难问题 《中国工业》第21期

1943年11月

广西工业的前途 《中国工业》第22期

1943年12月

如何走上工业化的正轨 《中国工业》第23期

1944年1月

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 《中国工业》第28期

1945年7月

中国五大独占集团 《文萃》第11期 1946年11月

中国官僚资本与内战 《远东概览》 1946年10月

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 《远东概览》 1948年2月

中国的土地改革 《世界与中国》再生版第1期

1948年6月

美国的垄断资本 《人民日报》 1951年2月

美国财阀与英国侵略政策 《世界知识》1951年第15期



- 美国经济何以必然动摇 《学习》1951年第4期
- 从经济看美国政治 《人民日报》1951年第5期
- 新兴的工业 《中国建设》第1卷第1期
1952年1—2月
- 土地改革根除了封建主义 《中国建设》第1卷第3期
1952年5—6月
- 继土改之后，实行互助组 《中国建设》第1卷第5期
1952年9—10月
- 工业化开始 《中国建设》第2卷第1期
1953年1—2月
- 新疆 《中国建设》第2卷第3期 1953年5—6月
- 云南傣族 《中国建设》第2卷第5期
1953年9—10月
- 中国经济的道路 《中国建设》第3卷第1期
1954年1—2月
- 走向农业集体化 《中国建设》第3卷第3期
1954年5—6月
- 西康：农奴翻身 《中国建设》第3卷第5期
1954年9—10月
- 人民治理国家 《中国建设》第3卷第6期
1954年11—12月
- 中国最大的海岛，台湾 《中国建设》第4卷第1期
1955年1月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含义 《中国建设》第4卷第10期
1955年10月
- 新成立的100万个农业合作社 《中国建设》
第5卷第2期 1956年2月
- 渔业合作社 《中国建设》第5卷第9期 1956年9月
- 近郊新气象 《中国建设》第6卷第1期 1957年1月



- 变化中的福建省 《中国建设》第6卷第8期
1957年8月
- 中国的理财法 《中国建设》第6卷第10期 1957年10月
- 天安门的故事 《中国建设》第7卷第5期
1958年5月
- 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评夏庇若《变化的中国》
《中国建设》第7卷第5期 1958年5月
- 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中国建设》第7卷第12期
1958年12月
- 河网化 《中国建设》第8卷第2期 1959年2月
- 一个省的新面貌 《中国建设》第8卷第10期
1959年10月
- 加快发展的人民公社 《中国建设》第9卷第6期
1960年6月
- 缺粮变余粮 《中国建设》第9卷第7期 1960年7月
- 两公社访问记 《中国建设》第13卷第3期 1963年3月
- 陶瓷在现代化 《中国建设》第13卷第8期 1963年8月
- 50年来印度史学界 《新建设》 1952年3月号
- 走向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 《世界知识》
1952年第35期
- 帝国主义的备战经济与当前的国际贸易 《新建设》
1952年6月号
- 中印友好关系的开展 《世界知识》1952年第19期
- 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与农业危机
《新华月报》1953年第4期
- 黄绍湘著《美国简明史》《光明日报》1954年1月30日
- 印度总理的访问 《人民中国》 1954年第22期
- 从亚洲国家会议看亚洲经济



- 《世界知识》 1955年第9期
从赫尔辛基归来 《世界知识》 1955年第14期
为了了解美国 《读书月报》 1955年10月号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读书月报》 1956年9月号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 《人民日报》
1956年10月18日
巴基斯坦——“纯洁人的地方” 《光明日报》
1956年10月18日
支持鲍惠尔，支持正义 《人民日报》
1956年11月30日
在高度工业化的捷克斯洛伐克 《光明日报》
1957年3月9日
富强的捷克斯洛伐克 《文汇报》1957年3月10日
美国的内政和外交——读尼尔林夫妇合著《今日美国》
《读书月报》1957年第5期
关于美国宪法 《中国青年》 1957年7月号
从印度展览会谈中印贸易 《人民日报》
1957年9月19日
1857年印度大起义时期英国人的态度
《历史教学》1957年第12期
经济建设中的福建 《印华经济》第5卷第15期
1957年
美国农业及其危害 《经济研究》 1958年第8期
印度国大党的土地政策 《国际问题研究》
1959年第2期
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公元第5至17世纪
《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
印度农村阶级 《经济研究》 1961年第11期
印度的土地改革 《新建设》 1962年7月号



法国1789年革命前夕城市各阶级

《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印度粮荒为何如此严重

《世界知识》1966年第4期

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

《世界历史》

1978年第1期

关于编写世界历史的问题

《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5期

“猪仔”出洋——700万华工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

《百科知识》1979年第5期

追念蔡子民先生

《人民日报》1980年3月4日

谈谈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

《社联通讯》

1980年第7期

研究世界经济的几点建议

《世界经济导报》1980年7月15日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回忆李大钊》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斯诺二三事

《光明日报》1982年2月15日

谈谈孙夫人的高尚品格

《宋庆龄纪念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社会调查研究八题

《社会——社会学丛刊》

1981年第1期

我与商务是同龄

香港《文汇报》1982年2月14日

我学与用外文的回忆和体会

《英语世界》1982年第4期

不要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日报》1982年1月1日增刊

要学习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丛刊》第3辑（1983年3月）

青少年们的好消息

《光明日报》1983年8月17日



《美国札记》再版序言

杨刚《美国札记》湖南1983年版
介绍一部重要的近代经济史资料丛书（与千家驹合写）

《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追忆吾友杨杏佛 《文汇报》1983年9月10日
论世界经济中的矛盾

《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12月26日
发展工业合作社要面向广大乡镇

《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5月28日
忆淑型 《无锡日报》1984年11月2日

职业教育是当务之急 《群言》1986年第3期
从道尔顿制教学法所想起的 《群言》1986年第6期
缅怀我的慈母和良师的教导 《群言》1986年第9期
怀念李任潮先生 《李济深纪念文集》

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炮弹碎壳落在我家大门口 《群言》1987年第7期



附 录

护送陈翰笙上船*

路易·艾黎

我记得，有一天，艾格妮丝把一位眼睛近视的中国教授陈翰笙和他的夫人带到我家。到他们走的那天，她让我领他们上一艘即将启航的轮船，护送他们进船舱，再在开船前鸣笛混乱的几分钟里走下舷梯回来。他们要带上两束红色的唐昌蒲，好象是为别人送行。为了使他们更好地伪装，她让他穿上白衣裳和短裤、长袜、棕榈滩流行的上衣，还戴了顶软木遮阳帽。他尤其不能戴眼镜，因为通报他的特征时肯定会提到这点。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教授戴着不习惯的头盔却装得若无其事，眯起一双近视眼，透过红花向前瞅着，心里巴望他不要摔倒，可真有意思。我们从站在舷梯下的一组包探身边走过，但他们对显然象上海典型的阔佬的陈教授不介意地仅仅只看上一眼。我回来告诉艾格妮丝他们已经安全出发，她欣喜若狂，立即提议聚会庆祝一番。

* 摘自《艾黎自述》，题目为编者所加。



一位老干部的生活剪影

章 德 良

一个春雨滂沱的深夜，一辆满载着旅客的列车缓缓驶进了上海站。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下车来。岁月的风霜在他的额角上印下了深深的痕迹。他，就是86岁高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陈翰笙同志。

这是一位有着传奇般经历的革命前辈。早在1925年，他就曾经协助李大钊同志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从20年代到40年代，他受组织派遣长期在国外开展革命活动和进行学术研究，足迹遍布于美国、苏联、德国、日本、印度等国。新中国诞生后，陈翰笙奉党中央之命回到祖国。周总理在中南海宴请他时，提出请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他自谦地对总理说：“吃西餐用刀叉，吃中餐用筷子。我是筷子料，还是让我搞点研究工作吧。”周总理因而聘请他为外交部顾问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如今，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干部，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返京途中来到上海作短期停留。

一 张 双 人 床

陈翰笙同志抵达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位报社的记者要想前往采访，给有关接待部门打电话查问：“您知道陈翰笙同志被安排住在哪一家宾馆吗？”谁知对方无可奈何地回答他：“啊哟，真对不起！我们这里查无此人。”奇怪？一位中央的部长级干部到了上海，怎么会找不到他的踪影呢？



几经周折，人们才好不容易在绍兴路上的一幢青灰色楼房里找到了他。原来这里是他的胞妹陈素雅同志的家。在三层楼的一间陈设朴素的房子里，摆着两个床铺。靠近门口的那张双人床，就成了远道而来的长者同一位念中学的外孙临时下榻的地方。我曾不胜诧异地问起过：“他这般高龄，为何不去住条件好一点的招待所呢？”素雅同志笑着说：“你哪里晓得！我阿哥的脾气历来就是这样。睡在这张双人床上，已是他多年来的老规矩了！”

前年春天，陈翰笙同志在杭州西子湖畔出席了一次国际性会议以后途经上海，被有关部门接到了宾馆住宿。他对柔软的钢丝床、舒适的空调设备、豪华的沙发、地毯都不感兴趣，依然带着行装，回到胞妹家中的那张双人床上。他的俭朴作风，是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磨练而成的。

解放后，陈翰笙同志虽然身居外事领导岗位，却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一所古老而破旧的四合院里，度过了20几个春秋。

一本《半月谈》

陈翰笙同志在沪期间，为了撰写材料，曾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熟人去买一本《半月谈》杂志。当杂志送来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角五分钱。这位同志再三推辞道：“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您就别挂在心上了！”陈翰笙同志依然不肯，还是把钱交给了这位同志。

这位可敬的老干部在生活上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即便是对于那些被人看成是“无关宏旨”的事，他也从不马虎。我在他的临时住所看到，他将一只只旧信封翻个身加以利用，平时写信用的双线报告纸，都是自己花钱从文具店里买来的。他特别反对有些同志利用单位的信笺、信封给他写信。有一次，他当场批评一位青年说：“私人之间的通信为什么老是要去花费公家的纸张呢？”相反，这位可敬的长者，用起自己的



钱来却毫不吝惜。他常常买了书籍赠送给别人，还生怕外地的同志收不到，特意用挂号的方式邮寄。

一次皖东行

陈翰笙同志暂时告别了上海，开始了为期六天的旅行生活。经过十几小时的长途颠簸，他终于到达了历史上以逃荒闻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城。刚到招待所放下行装，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到县委去汇报自己来此进行农村调查的打算。县里接待人员望着这位目光温和的老人，内心感到一阵迷茫：“奇怪！哪有中央的大干部首先来向基层同志报到的？”

第二天，这位老同志不顾旅途的劳累，就四出参观、召开座谈会。那次，他冒雨访问的是一个远离县城的生产队。汽车开到村口，因道路泥泞，无法继续通行。别人劝他改去其他地方参观，可是翰老再三坚持要下车步行。他沿着曲折的羊肠小道艰难行进，双腿溅满了泥浆，连续走访了好几户社员家庭。

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为何跑到偏僻乡村里来“自找苦吃”呢？原来他此番皖东之行，是为了收集资料，准备用英文写一个调查报告，把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形势的巨变向国外进行报道。

一封亲笔信

淡淡的阳光照射在绍兴路的那幢青灰色楼房上，陈翰笙同志坐在窗前的写字台边奋笔疾书。忽然，房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他开门一看，一位陌生的青年手里拿着一封信，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你就是丁利刚同学吗？快请进来坐。”沏上一杯清茶后，两人就开始了促膝长谈。

这位小丁的年龄同陈翰笙同志相差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他是



上海一所大学分校的历史系学生。不久前，他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曾托人转送给陈翰笙同志审阅。陈翰笙同志逐字逐句地阅读了这篇文章，把稿子当中欠妥之处逐一勾出，并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对论文的标题、内容、引用的史料提出了12条意见。同时，在信中还盛情邀请小丁来住处当面交谈。初次相会，陈翰笙同志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有关史料作了详尽介绍，讲述了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修改的意见。临别时，他亲切地鼓励小丁，要把改好的论文交他带回北京，推荐给一家理论刊物发表。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已是屡见不鲜了。哺育青年，扶掖后进，这是他长期奉行的生活准则。即使是在寒凝大地的苦难岁月里，他刚从“牛棚”里放出不久，就在家办起了义务补习班，帮助包括刘少奇同志的两个女儿在内的几十个所谓“黑帮”的子女学习英文、德文。这在当时是需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啊！

一套小丛书

在绿树掩映的上海文艺会堂里，正在举行商务印书馆成立85周年的纪念会。陈翰笙同志赶到会场，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满怀深情地追忆了自己在60多年前，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情景。如今，他仍然负责该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主编工作。这次，他来上海还向复旦、师大等高等院校约过稿子呢！

这位学识精湛的老干部，曾获得过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和德国柏林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又在国内外出版过几十部学术著作，然而他为什么还要对编辑出版那套通俗的小册子如此重视呢？在会场休息厅里，我向他提起过这个问题。他听了不禁爽朗地笑道：“那是为了我们的年轻一代呀！十年内乱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青年们的文化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就很难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不了解资



本主义的本质，就不会爱惜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帮助商务印书馆编好这套小丛书。”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寄托了革命前辈对青年的殷切期望。我从这位老干部的身上，感受到一种蓬勃奋进的朝气。他的旅沪生活剪影，多么值得人们怀念啊！

《文汇报》1983年1月6日



在陈翰笙教授那里学习

资 华 筠

1984年秋，父亲收到了一本十分精致的《欧美同学簿》。其中，在介绍陈翰老的专页上，有一张照片——“陈翰笙在教授研究生班”。父亲意外地发现其中坐在翰老对面的学生竟然是我，惊异地问道：

“你怎么能够进到这个班里去学习？”

“哈哈！碰运气，‘混’了进去……其实，在这句玩笑话的后面，却珍藏着多少难忘的时日和深情的记忆呢！”

“命运之神”好象经常在帮助我，1981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陈忠经同志——1960年他曾率领我们中国艺术团（由中国京剧院和中央歌舞团组成）访问拉丁美洲和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进步。当我向他谈及，组织上可能派我赴美交流、考察一年，没有翻译同行，所以正捡起英语进行自学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到陈翰笙同志那里去，请他帮助你。”

“陈翰老？”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来，陈翰笙三个字在我心目中，似乎只是大百科辞典里的一位名人。他是共产主义的老战士，远在我出生前，早已献身革命，活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线上；他又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专家，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等领域里，取得的学术成就具有国际影响。我感到他是那样崇高，却离我很远很远，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居然有一天，我——一个舞蹈演员——有幸成为他门下的一名学生。

但是，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当我接到了陈忠经同志的电话，



说是已把我推荐给了陈翰老了，我立即骑车飞快地赶到了东华门38号。

这是一个独门独户而又相当简陋的四合院。进得门来，无需仔细环顾，一切尽收眼底。使我立即想到：《人民日报》刊登的那篇《陋室中的情操》。这篇20世纪80年代的“陋室铭”由于其主人公的真实存在和高风亮节而比刘禹锡的传世之作更令人感动呢！

听见院门响，翰老立即从他的书房迎了出来：“你就是资华筠同志吧！”他亲切地和我握手。我注视着眼前的这位老人——整齐的发式，简朴的衣着，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睛笑咪咪地，在眼角处聚起了许多鱼尾纹……进得门来的那种忐忑之感稍稍释然。

他拉开门，把我让进屋，又帮我移动出桌前的座位，待我刚刚坐定，立即递过来一把扇子……这一系列紧凑的动作，真使我感到应接不暇，以至连寒暄都没顾得上。

接着，翰老从桌上随手拿起一本外文杂志未加解释地说：“你先读一下！”我结结巴巴地刚读了一段，他就打断说：“可以了，你发音很不错，和外国人对起话来，让人家听懂是不成问题的……”然后又问了我一连串问题，诸如：什么时候学过英文？学过几年？老师是谁？丢了多少年？现在怎样自学？有什么困难？大约何时出国等等。这一切又是那样紧凑，依然使我感到应接不暇，于是，我原想表达的感激之情和努力学习的决心，也只能存在心里了。

“这样吧！今天我们就以访问美国为题，我临时给你编几个简单的句子，你当场译出，我帮你修改，怎么样？”真没想到，上课就这样开始了——没有课本，却恰好适合我的英文程度。

直到修改作业时，我才发现翰老的视力几近丧失！

“翰老，您的眼睛……”

“你难道还不了解？我现在最‘清白’了——青光眼加白内障……”



“不能治了吗？”

“十年动乱，被隔离审查时耽误了，现在视神经早已萎缩……”

“唉！”我为此深感痛惜。但是，回想刚才他帮我开门、让座、递扇子等一系列利索的动作，却从中感受到一种不凡的精神力量。这不仅反映出一个80多岁老人精神之矍铄、乐观，更显示出他为人的平易和热诚。

口述修改作业，是从未经历过的。我调动起每一根神经，深恐出现丝毫的钝滞和疏漏。当我终于看懂、理顺，准备誊写时，翰老突然问道：“你再仔细读一读，如果哪个地方不满意可以提出不同的译法，我们来讨论。”和我讨论译法？我真有些愕然了。直到后来，上过许多课以后，我才逐渐理解翰老征求学生对批改作业的意见，绝不是一种礼貌性的程式，而是他一贯倡导的民主作风的自然流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学生对修改的作业提出疑问，他总是仔细推敲，但凡有一点可取之处，都会受到鼓励。

为了加速进度，翰老安排我一周上两次课。他拿出了用废纸订成的日程本，让我填上自己上课的时间。

啊！一日三班，已经排得满满的：有每周固定的研究生课程；有专人为他读中外书籍、报刊的规定时间；他自己在著书立论，还要帮助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编书、咨询……我真不忍心在那密密麻麻的日程表上再填上一笔，增加一位80多岁老人的负荷。翰老却在一旁催促说：“填好了吗？你要抓紧，尽快取得进步啊！”

一天，我按时赶去上课，翰老破例没有迎出门来，进了书房，依然空无一人。正在纳闷，忽然从套间里面传出翰老的声音：“资华筠同志，很对不起，我在打针，请等一等……”原来，翰老正在发烧38度多！我进屋去看望他，准备立即告辞。他却用那滚烫的手一把拉住我说：“今天就坐在床旁边上课，好吗？”我请求他休息，他竟然坐了起来：“那就到书房去上课！”



我只好答应留下，他躺下后，仍在关心我坐得舒服吗？笔记本垫好了吗？写起字来方便吗？我感到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心急速地跳动……

这一堂课，由于老师兴致高，反而不知不觉地延长了时间。我的心中充满矛盾，一方面恨不得顺水推舟多学一点，但是又生怕老师累坏了。我觉得除了努力领会老师的教诲，力争提高学习效率外，实在无以报答老师的一片好心，但是每一点反馈都使他十分兴奋，好象完全沉浸在教学的热忱中，忘记了病痛和时间。

这时，一位女青年来访，翰老叫她别作声，坐下旁听。在回家的路上，那位女青年和我同行。她劈头盖脑地问我：“你上课时好象一点也不怕，陈伯伯没有‘克’过你吗？”“哦！还没有碰到过……你很怕他？”她笑了：“唉！我们那时太不懂事，没有想得那么远……陈伯伯教我们这些‘黑帮子弟’比我们自己急切得多。谁学得不好，他就批评，严厉得很，班里常有人哭鼻子……”

噢！她原来是翰老在非常时期建立起那个英语班的学生，我们还是前后同学呢！那是1971年，翰老刚从湖南茶陵干校回来。他的视力越来越坏，已经无法看书了，呆在家里十分寂寞。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位学习外文的男女青年——多半是没人敢接触的“黑帮”子弟，请求他帮助补习外语，他高兴地答应了。十几年来，已经有160多人在他那里学习过。其中不少人后来考上了大学或出国进修去了。我想，无论当初哭过鼻子与否，也无论目前的境遇有了怎样的变化，对于这样一位无私无畏、诲人不倦的老师，每一个学生都应在自己的心中为他树起一座丰碑。现在，这丰碑已在我心中牢牢地树立，并且闪耀着光芒，它将照耀着我生命的旅程……

夏去冬来，半年的时间，我的英文确有进步，于是翰老开始给我出题作短文。他出的题目大都与我的实际生活紧密相关。



如：“我的简历和日常活动”，“中国舞蹈浅谈”，“北海公园一游”，“给友人的一封信”……虽然我的辞汇量很有限，也缺乏系统的文法知识，可是作起文章来，学过的字、辞、句型会自然而然地“蹦”出来，比自己预想的要顺利一些。这时，我才体会到翰老平时对背诵要求十分严格的好处。我把这个体会告诉了翰老，他十分高兴，说我能够适应他的教学法。翰老反对死“抠”语法，而不注意语感和应用；提倡多练，强调说、读、听、写并重。回想这半年来，给我上课的过程，没有任何课本。教材由老师灵活制定，程度由老师自由推进。在这样的灵活、自由之中，老师要多费多少心血呢？

老师的热忱，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热忱。我起早贪黑地读英文，有时甚至骑着自行车赶路时，心里还在默诵。不知怎么，翰老好象猜透了我的心思。一次，在背诵之后，他问我：“你工作这样紧张，每次都背得很熟练，用什么时间来读呢？”我说：“早起、晚睡，见缝插针。”这时他忽然说：“会不会骑在车子上也在背英文？”我笑了，表示默认。他却板起面孔，十分严肃地说：“不可以这样，要出事的！”从此，每当下课后，他送我出大门，总要在身后高声嘱咐：“骑车时，不许背英文！”

在这样严师慈父般的教诲、关切之下，一周两次的英文课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第一需要，几天不见翰老就十分想念，刚刚上过课，又急切地盼着下次上课。偏巧这时（1982—1983年冬春之交），翰老接到了去广东从化温泉疗养的通知。当然，这将有益于他的身体健康，我很为他高兴。但是，即使对于这短暂的离别，也有些依依不舍。翰老呢，也当成一件大事似的，不仅给我留了作业，而且交待给另外一个学生，帮我联系好，每周可以去一位美国专家那里练习会话。临行前，他谆谆叮嘱着：“他们夫妇俩个都是我的朋友，很热心。你不要有顾虑，尽管大胆地和他们谈话。”

我严格地按照翰老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完成着每项作业——包



括硬着头皮去和美国朋友会话，但是心里仍感到空荡荡地。终有一天，我抑制不住地在练习簿上用英文写下几行思念翰老的话。我庆幸自己终于能拿起笔来用英文表达一点内心的感情了，但又恨自己程度太浅，憋在心里的满肚子话，不知怎样述说才好。

不久，忽然收到翰老的一封英文短信：“我已提前回京，几次打电话都未找到你，请立即来上课。”我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带着那篇自拟题的短文，大胆地读给翰老听。

其中有一个句子，他给我改动的几个字，使我至今难忘。

“……with the help of his excellent method, I improved my English a little.”（在他出色的教学法的指点下，我的英文取得了一点进步）翰老把“excellent”（出色的）去掉。把“a little”（一点）改成：“rather fast”（相当快）！

“把‘出色的’去掉，是您的谦虚；说自己进步‘相当快’又太不谦虚。”我已习惯于坦率地陈述不同意见了。

翰老反问道：“如果我的教学法真是很出色，你怎么才取得了一点点进步？如果你确实进步相当快，不是正好说明我的教学法不错吗？”他严肃地告诫我：“写文章——无论是用中文或英文，最要紧的是立意、用词要贴切、精炼。”又说：“我看你思想不解放，进步快就是快，实事求是嘛！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呢？”

自此以后，我的英文课中，常常加自拟题的作文。翰老照例对立意和表达方式要求很严格，否则即使英文本身过得去，也要受到批评。

记得赞科夫曾经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本钱。”在翰老的课堂上，学到的绝不仅仅是英语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思考能力。”

渐渐地，在上课之余，翰老也常和我谈天说地，讨论问题。

他年事已高，很少出门，却关心着社会变革中各个领域发生的事。不幸的是，他的视力“拖后腿”，全部材料要靠亲属和学



生读给他听。不过那“过耳不忘”的记忆力和敏锐的综合分析能力实在令人叹服。他的脑子真象是一部时事信息电脑——通晓古今中外的天下大事。我暗自思忖：这是不是和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致力于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有关系呢？由此也联想到听过的某些传闻，于是忍不住地提问：“听说建国初期，周总理推荐您出任外交部的领导职务，您没有同意？”翰老淡淡地一笑：“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个人不适合做政府官员。作一名教师，搞搞研究不是挺好？而且……解放后，这么多运动……”是啊！想到翰老的率真、耿直和溢于言表的鲜明爱憎，或许真应该为他当初的选择感到由衷的庆幸。不过，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认为他有点“愚”。可是在翰老的价值观念中，却从不以职务来分贵贱。

一次，在我上课中途，一位不速之客来访。从外表看上去，象是个颇有身份的人，我已作好了提前下课的准备。但是翰老却斩钉截铁地对那人说：“请你到里面屋子等一下，我正在上课。”然后他小声向我介绍说：“这是××部的领导同志，事先并没有约好呀！”我感到有点过意不去，小声建议说：“人家领导同志的时间很宝贵，又是主动登门来访，我们提前下课好了。”没想到翰老很不以为然，反倒提高了嗓门儿喊道：“你这是什么逻辑？你的时间就不宝贵？只有‘他们’才忙？教师应该保证学生的上课时间——这是学生起码的权利，不要多说，继续上课。”

翰老的这种“价值观念”在他处理日常的事情上也常有流露，有时甚至使人感到“不近人情”。也是一次上课中途，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只听见他对着话筒喊：“……完全无此必要！我对此不欣赏，和文章的主题无关嘛……”放下话筒，他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在向我说明：“真是岂有此理，××写了一篇知名国际友人的文章，非要塞进去有关我的一段文字，和文章的内容又不相干，真是败笔。”

“那您也不该这么不留情面，起码他是出于好意吧！”我脱口而出。



“哈哈！原来你也主张我学圆滑一点？”

“这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您是名人，写上几笔，或许增加文章的份量？”“噢！你认为文风问题不算原则问题？现在‘八股腔’和瞎吹乱捧的文章还嫌少吗？这种文章于个人、于群众、于后代有什么好处？什么名人不名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对社会对人民是否有用？是否尽责……”我不记得这场争论是怎样结束的，也不记得诸如此类的事遇到过多少，不过如果因此而以为翰老是个不通人情的“倔老头”，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其实是非常富于人情味儿的。譬如每每谈及中、小学教师的待遇问题，总是牵肠挂肚，忧心似焚，好象他在主管教育部似的；朋友和学生中，如果遇到什么不公平的待遇，以至家庭纠纷、选择对象之类的事，他会象对待自己家里人那样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提起以权谋私不正之风更是嫉恶如仇，拍着桌子说：可惜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如果只有18岁，我会再一次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那些糟蹋人民血汗、践踏人民权力的人进行斗争。这时你会觉得眼前的这位老人分明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啊！

但是，我却从未见到翰老为了个人的事情大动肝火。即使是他在东华门的那座旧居，风雨交加之中，险些倒塌，成了危险建筑。亲属和朋友都为此焦虑不安，催他自己出面奔走一下，求得早日解决，他却异常平静地说：“组织上已经知道了嘛！”至于有人为他不再连任六届政协委员而打抱不平，他却淡然处之，说什么：“不当为好！”

他从不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光荣历史。在我所认识的前辈、专家、学者中，不少人至今念念不忘怎样得到了翰老的指导和帮助——有时甚至对人生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但若向翰老问及这些事，他总是说：记不大了。直到不久前，我又问起他：“听外文局的专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告诉我，抗战期间，若没有您的援助，他们险些困在香港……”他仍然笑笑说：“我记不得了。”“唉！您总是记不得了，记不得了，这是不是故作



谦虚呢？”没想到对于这样一句玩笑话，他却十分认真地回答：

“真的记不得了。你知道，作对了的事情大不容易记住，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应该去作的。倒是作错的事情很难忘记……”

这些话，似乎算不上什么豪言壮语，却使我的心灵为之震动。如果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都把作好事当成自自然然的本分，而对作过的错事永志不忘，引以为训，我们的世道不是会变得更加美好吗？可惜我们往往沾沾自喜于作过的一点点好事，而对错误总结得太不及时了……

为了督促我进一步学好英文，在他搬到木樨地的新居之后，便把我编入了固定的英语班。同班的同学大都是大学毕业后，带着各自的任务在翰老这里进修的研究生，大学教师及中层干部。这其中就数我学历浅、年龄大，无形中对我增加了压力。更困难的是，教材有了很大变化——开始学译翰老编写的时文200篇，内容所及：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医学、宗教以至找保姆、夫妻离婚、优生学……几乎包罗万象，我感到相当吃力。但是看看同学们个个雄心勃勃，勇于进取，我也不甘退缩。

翰老充分利用集体上课的有利条件，在学生之间不时地进行比较和评议，促进大家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我真感谢翰老把我放进了这样一个英文班。除了“逼”我急起直追，赶上进度，更重要的是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从这些普遍人的高尚追求和不懈的奋斗中，看到了我们时代的缩影。每当我被世俗的矛盾，人为的不公，困扰得无精打采时，总能在这里重新获得勇气 and 希望——觉得一切丑陋的东西均不在话下。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为祖国的振兴而努力开掘自己的才智，翰老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导师。

十年来，在翰老这里先后学习过外语的学生一批又一批，至今还有三个班在继续着，这一切全部是义务教授，不收分文。世上有什么样的“计算机”能从中计算出它的真正价值呢？如果用



翰老自己的语言来注释：“我以帮助青年为乐，使60年前的朝气，不因年老而消失。”那么世上又有怎样的磅秤能够称出这朴素的语言所包含的份量呢？

《人物》1985年6月



陈翰笙的史学思想

陈 洪 进

今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家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的60周年。正当我国学术界热情祝贺这位老人学术贡献的时日，探索一下他的史学思想，应当是具有学术意义的。

陈翰笙是当代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他从20年代起就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誉。他不象别的历史家以断代史或国别史巨著成名。他是一位注重革命实践的实干家，倾注他毕生精力于社会形态转化的研究工作。他除了在讨论史学问题的场合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外，没有写过史学思想的专门著作。我从1926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听他讲课以来，几十年间虽然有过多次交往，也共同进行过研究工作，却很少谈论史学思想。

1983年，城乡建设研究所所长薛葆鼎给我看了陈翰笙于1948年在一次座谈会上关于我国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言记录，才使我惊奇地发现：这位经济史学家对我国解放后的生产方式、建设步骤、工业化的特点、建设资金的来源的预见，完全不同于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情况，却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基本一致。这使我喜出望外，好象勘探队遇到了露出矿苗的富矿。从此，我对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陈翰笙准确的历史预见是不是可以证明历史学的实用价值？他的史学思想在哪些方面对推进“四化”具有现实意义？他的史学思想能不能有助于了解世界上不发达社会的发展？为此，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分析他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检验他的观点，用他的观点与当代中国新思潮进行对照，探索他蕴藏着的在发展的思



想，追溯他的思想渊源。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虽然体会还很粗浅，但也得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分析他的著作，希望以他的著作、他的研究实践，来表达他的史学思想。粗略估计，他的全部著作不下200种。要搜集齐全，一时难以做到。现在，就现有的主要著作，编制了一份年表，附加了题解。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充实、深入、总结，进一步发展他的史学思想，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本文的基本设想。

一 四个系列著作

陈翰笙的研究实践是和革命形势紧密结合的。我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异常迅猛。要研究实践跟得上形势，就必须采取革命的快速节奏。旷日持久的慢动作是不行的。首先要认明的是他的研究工作是历史性的战斗。他的研究工作不断转移阵地，他的著作好象轻骑兵在急行军中取得高速度高质量的战果。所以，他的著作多半是三五万字甚至几千字政论形式的文章。我们不能说只有多卷本巨著才是历史著作，也不能认为政论文章没有学术价值。列宁在1905年曾经高度评价政论性文章的积极作用。他要求革命作家做政论家的事，写当代历史，立刻作出判断，让明天就能用上今天的判断，鼓舞在革命第一线上的战士，激发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创造出高效率的工作方法。

陈翰笙的著作可以分为四个系列，每个系列反映一段革命时期的革命需要。

第一系列 陈翰笙第一系列著作的发表年份是1926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军阀张作霖统治东北三省；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孙传芳统治苏、皖、浙、闽、赣五省，直系军阀吴佩孚统治湘、鄂两省。广东革命政府偏处两广。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1922.7）为时不久。革命政权正在进行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苏联在1926年刚刚结束了恢复时期，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的基本形势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还盘踞中国。革命力量才开始发展，期望国际援助，瞩目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时，陈翰笙的著作主要是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他除了向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经常供稿外，还在北京《现代评论》上发表了53篇文章，其中7篇是关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对外关系方面的。

第二系列 第二系列的主题是中国农村经济土地问题，时间是从1928年到1934年。这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了1930年，我国已经有14个革命根据地和—个游击区，武装力量已达10万多人，革命政权拥有300多个县。但是，应当采取什么土地政策还很不清楚。“左”倾路线曾经三次居于统治地位。陈翰笙认为“左”右倾的根源在于对我国当前的土地关系认识不清，应当立即对我国土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土地问题是他第二系列研究实践的主题。他注重实地调查，要求历史地认识现状，观察现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他在理论研究上以《封建社会农村生产关系》为起点，概括各个时代各国各种制度的要点。他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为起点，首先认识我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点。随后调查了江苏省无锡县的农村，作为江南地区的典型，写出了内部分析材料《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前途》。调查了河北省保定农村，作为华北地区的典型，作出了土地分配的统计资料。1933年，他写出了总结性的著作——《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这部著作在国际学术论坛上—鸣惊人。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陈翰笙的这部著作是对国民党进行的反革命战争的一次反击。他为了填补华南农村调查的空白，1933年进行广东省的农村调查，写成了《广东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同年，开始进行烟草种植区的烟农调查，六年后写成了具体描绘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缩影的杰出著作——《中国烟农生活研究》。



这六年马不停蹄的调查研究使他洞察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权性质，使他在内战时期能够有理有据地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历史性的批判。

第三系列 主题是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性。时间是从1936年到1950年。这个时期是我国发生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时期。1935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从军事斗争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共产国际从国际政治斗争中总结出新的经验。1935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标志土地革命进一步深入，土地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同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提出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标志着旧路线结束，新的路线开始。历史的发展证明陈翰笙第二系列著作的观点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这个时期处于战争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七七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于国民党政府1945年8月向解放区进攻。

当时，美国政府奉行扶蒋反共政策，美国人民，除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外，对中国缺乏认识，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性茫然所知。而且，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还把从祖国搜刮到的民脂民膏用来贿赂美国政客制造扶蒋反共舆论，迷惑美国人民，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所以，陈翰笙当时在美国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不得不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封建腐朽性为主。事实上，这是一场异常艰巨的历史教学，因为它必须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教材。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这类性质的文章大约有八、九篇。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于1946年10月发表的《中国官僚资本与内战》。这是一篇反内战檄文，也是一篇现实的历史著作。

第四系列 解放后，建国以来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主要著作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他在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上



从创刊到十年动乱改版为止，共计发表了26篇用英文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富有深厚的真实感。他作为一个历史家写出来的文章，特别真实、诚朴、优美，所以在国际上颇有影响。例如，1956年他访问山东胶东渔业合作社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用生动活泼的笔调写成了《渔业合作社》。这篇文章发表后，国外读者的反应非常强烈。英国格拉哥《世界》杂志社社长阅读此文后第二天就把转载的版面不惜航空邮费寄给作者，说是让作者“先睹为快”。

二 八部代表作

上述四个时期的四个系列的著作表明陈翰笙是以各个时期的革命需要作为他著作的主题。这个特点是非常显著的。以革命需要作为研究工作的主题，确实是使最基本的史学思想。下面我们以他的八部代表作为对象，进一步探讨这一基本特点的具体表现，以及除此而外的其他特点。

1.《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 这是一部对欧洲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比较研究的总结，是他本人在作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时给自己看的非常别致的著作。别致之处在于极其概括，篇幅短小，总共不过一万字左右。其目的在于使他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以免失去方向。它明确指出生产关系是主要目标，其他都是次要项目。它以当代总结出来的明确结论为起点，不明确的论点留待以后研究。

它以五项标准（生产资料所有权、农具耕畜、超经济强制权、地租形式、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开和合一）把封建制生产关系区分为三个类型：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赋役制3至5世纪盛行于西欧，9至14世纪盛行于日本，13世纪盛行于俄国。强役制8至12世纪盛行于西欧。工偿制则为俄国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制度，形式非常复杂。



他认为：“中国现在，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或雇工制，虽然不能完全没有，可是决不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地位。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除赋役制、强役制和工偿制以外，其他制度的分析还待继续进行。”

今天，回顾50多年前这样的处理确实是个明智决策。在我国当时，土地革命是国家民族亿万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形势不允许我们沉湎在理论研究上占据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式，全世界究竟有多少模式，时至今日，也还没有定论。当时，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导，作为实地调查的指南，但不能沉湎于这样的理论探讨。陈翰笙的这项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化学家门捷列夫在1860年所作的《元素周期表》，把确知的元素，按原子序数排列出来，以便把后来发现的元素排列在适当的位置上。因为纯理论的科学研究不是当时生灵涂炭的国家所能进行的。

2.《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 这部著作是当时有关土地问题的总结性的论著，也是对国民党政府第四次“围剿”的反围剿。它完稿于1933年5月15日，估计写稿时间是在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1932.6.16—1933.3）结束后不久。红军主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主大肆烧杀，掠夺土地，严重地破坏农村经济。国民党政府企图制定一套对抗土地革命的对策，由全国经济委员会聘请国际联盟的意大利教授德拉贡尼来华调查农村。德拉贡尼在目睹湖北省农村烧杀惨状和新地主掠夺土地的暴行后，提出了《关于中国农业政策某些方针的总报告》，由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3月发表。陈翰笙看到了德拉贡尼的报告，利用时机，引用他的报告，提出了《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这一行动表明中国学者有充分理由陈述本国的真实情况。内容分为两部分：（1）贫农耕地不足，土地分配不均，耕地分散；（2）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促使农村破产，地主富农残酷剥削农民，农业生产水平低下。这部英文著作作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论文，



由他本人在加拿大8月间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上宣读，轰动了太平洋国际学会，被公认为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著作。从此，太平洋国际学会曾多方设法聘请他去美国参加《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编辑工作。这部著作也确实有它不寻常的优点。它历史地分析了中国半封建的土地制度，通俗易懂，亲切动人。不寻常的是：它联系了德拉贡尼的报告，发生了玄妙作用，使国外读者产生了强烈反应。

3.《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这部著作分析了华南农业危机，指出集团地主的势力大于个体地主；女劳力的普遍和男劳力的离村表现农业生产的退化。英文本中国版和英文本美国版上作者导言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中国版上的导言指出：“危害农业社会的种种因素是一个整体，如果忽视这个整体，单纯考虑商业制度的改良，甚至土地制度的改良，是无济于事的。”美国版上的导言是一篇很有力量的论述，坚定指出中国土地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说：“广东农村的贫困有它的地方特征，也还有帝国主义经济渗透农村的影响以及全国阶级矛盾增长的因素。……中国土地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实质在于彻底废除殖民主义剥削和封建主义剥削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成败。因为这两种剥削是中国农业上升到较高水平的根本障碍，消除障碍是绝对必要的。消除了障碍，全国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这种强烈要求不是地球上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当然，这是有所指的。

美国进步人士，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秘书菲尔德在这本书上写了一篇序言。菲尔德用涵蓄的语言谴责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他说：“当今之事，不幸的是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完全跟不上社会科学家提供的事实和信息。知识是大量存在的，但我们并没有运用。我们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却目光短浅，毫无远见，一厢情愿地死抱住自己所欣赏的东西不放，对其他一切置之不顾。社会上大部分人也许害怕即将出现的事物，于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专心幻想一个财运亨通的社会。国际事务更是如此。投机商



人要弄诡辩是毫不费力的。在美国，直到最近，还不到20年，社会上才有不少人觉察到对外关系上存在着问题；甚至时至今日，除了参议院的否决权而外，民主机构还不能直接过问对外关系。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中国的形象就特别模糊。中国是我们美国人难以理解的国家。我们一心一意追求钱财，只能感情用事。中国这个国家，除个它的古老文化受到我们的尊敬而外，它只不过是讲究实际的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神秘国家而已。这并不是因为缺少理解中国的资料，而是因为我们在一清二楚的事实，充耳不闻。我希望我们对陈翰笙的这部著作不抱这样的态度。这部著作非常重要，非常及时。……陈翰笙的这部著作如果能够被我们运用，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远东局势的认识将会大大提高。……”菲尔德的序言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如果不理解当时美国的思想状态，也就不能了解陈翰笙的著作在美国所起的作用。

4.《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 这本书是从烟农生活说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它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晦涩的书名，是因为它有这么一个来历。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研究生活水平的丛书。用意不外是要了解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中国经济学家有承担研究蚕桑地区的，有承担研究侨乡的，陈翰笙则建议研究烟草地区的烟农生活。为了迁就丛书要求，遂将书名称为《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副题是《中国烟农生活研究》。按内容，应当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剥削下的中国烟农”。1933年他去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作了调查。工作开始后，他离开了烟草区，开创别的研究工作。烟草区调查由王寅生、张锡昌等在1934、1935年继续进行。1939年陈翰笙在美国又搜集了有关资料才写成了这部著作。从调查到成书相距六年。王寅生、张锡昌是当时杰出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者。他们把农村调查看作革命工作，能够不惜任何代价，发掘隐蔽着的事实。他们整理出来的第一手资料，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原始材料。陈翰笙在调查烟农时是36岁，写书时是42岁，正



是精力充沛、思想成熟的时候。所以，这部著作是他的杰作之一。英文文字特别优美，1980年美国还重印了这部著作。

它的最大优点在于选题。要显示国际垄断资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权、从军阀官僚到土豪劣绅直到买办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全幅画面，烟草是个最典型的商品作物。这部著作对每个方面都有历史叙述。它不强制读者接受任何观点。但它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一般概念总以为商品作物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可是，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烟草的农民大多数是中农和贫农。上中农和富农不依靠借债过活，不热心种烟。这是这次调查的新发现。

5.《中国官僚资本与内战》 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10月。估计撰稿的时间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的第12个月左右，即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1946年8月10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的时候。这篇文章相当于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檄文，也是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一次间接的反击。文章的主题是论证中国官僚资本是封建性商业资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文章开宗明义就说：“中国的政府垄断企业不能与现代国家资本相提并论。它的商业性质多于工业性质；它集中在高级军官、文职官员、政客、地方军阀手里。他们的存在依靠独裁政治和外国援助，并且阻碍中国自由经济的增长。”结论指出：“现在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趋势。一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地区里已经开始发展前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趋势。另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显著的趋势是国民党地区的资本主义的买办性的，由军事独裁所统治的政府垄断企业，它所依靠的是：政府垄断、一党专政、外国援助。中国目前的内战是这两种经济趋势，两种原则的斗争。”

即使是这样现实性很强的文章，他仍然使用史家的笔法。先



从中国古代、中古、近代的专卖制讲起，再从经济发展史的阶段上来区别中国官僚资本与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性质。文章用了中国的具体事实来与西方国家资本对比。例如，在西方，资本归国家集中管制，国家由一个经济集团控制；在中国，管制权属于少数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在西方，国家维护的是整个的私有制；在中国，统治政权只维护权势家族的暴利，而他们的暴利是来自政治压力，不是来自正常工商业的利润。文章还列举了战时战后的茶叶垄断、棉纺织品垄断、救济物资垄断、敌产垄断、货币发行等危害人民生活 and 摧残民族资本的事实。

6.《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 这是一部分分析傣族社会形态的著作。它既是社会史的调查研究，也是对反动民族政策的批判。1940年我曾和他在一起从事这次调查研究，所以对这部著作的体会特别亲切。他善于分析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特别善于分析一个情况复杂，多种因素的转化过程。这本著作很显著地表现他的这种特长。他论断：早在中原王朝在傣族地区建置之前，那里的前封建制就有了发展。建置以后，那里的封建制还没有成熟。中原王朝的官僚机构一贯利用那里前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进行统治。前封建的实体是农村公社，土地属于部落及其成员所有。血缘在农村公社起着控制作用。封建性的行政机构与农村公社并存。除个别少数新垦户外，那里没有土地私有制。那里现行的四种土地所有制都不是私人所有制，其中有一种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属于村寨公有。他从每年分配土地变为每年检查和调整土地，再变为停止检查、调整，断定那里的村社已经解体。他还从村社头人身兼二职，既代表村社，也代表封建制官吏；氏族部落首领占有土地成为贵族；部落大会向“内阁制”过渡之类的事实，断定那里的前封建制已经向封建制转化。个体农户所有制的出现说明地主经济的胚胎已经形成。他还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国民党政府依靠最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剥削和统治。

7.《新疆民族政治关系史、社会结构和政治前景》 这是一



部从古到今的新疆民族史。要了解这部著作的作用，必须从当时形势和欧文·拉铁摩尔其人说起。美国有一段时间不重视新疆及中亚地区。二战以后，一改常态。二战结束，英国退出印度，苏联战争创伤未愈，中国内战爆发，人民力量一时尚未到达新疆，新疆一带被称为“亚洲腹地”，被视为政治真空，英美暗中活动，企图在那里建立势力范围。欧文·拉铁摩尔青年时期曾在华工作，二十年代曾考察东北、蒙古、新疆，发表过几部有关“亚洲腹地”的著作，成为著名的亚洲地理专家。战后，他篇著《亚洲要地：新疆及中俄亚洲腹地边境》，邀请陈翰笙撰写历史部分。陈翰笙论述新疆历史演变规律，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展望未来变化。

他指出草原游牧社会与绿洲农业社会为沙漠所分隔。庞大帝国依靠权势形成政治结合，不能通过商品经济构成坚固的整体。帝国兴衰造成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时分时合的局面。新疆常常发生历史的反复和倒退。在倒退情况下，游牧社会倒退较远，农业社会倒退较近。根本原因在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强制经济为基础，生产是为了贡赋。帝国一旦失去权势，新疆的政治结构就土崩瓦解。

他指出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与英国海外殖民地臣民的性质不同。新疆白俄有俄罗斯民族也有非俄罗斯民族。他们有文化有技术，但在新疆没有政治势力。苏联日益强盛，白俄无力反对，其年青一代便逐渐向往苏联，与老一代分道扬镳。中国的旧势力在衰退。新兴力量既有汉族也有非汉族，既有共产党人也有非共产党人。新兴力量的影响远远超过往日英国在新疆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在新疆穆斯林世界早有活动，但因兵力分散，财力不足，阴谋未能得逞。

8.《南亚农业区域》 这是1950年写成的（英文本300多页，中文本30万字）南亚印、巴两国农业区域社会经济地理的巨著。此著写于1948年和1949年。陈翰笙一向注意久受压抑的印度人民的社



会、经济和历史。1945年他在印度曾以极大的兴趣漫游南北各地，访问各地的知名人士。但因客观原因不能久留印度进行调查。后来，在美国想出一个办法补偿自己的宿愿。英国曾于20年代组织了一个农业调查团在印度旅行18197英里，耗资10万另2955英镑（当时合50万美元），提问783条，答者395人，答词记录达一万多页。这部调查报告称为《皇家印度农业调查团证词》共14巨册。陈翰笙视为至宝，认为这部巨著替他做了他想做而做不到的大事。这个报告的原意是以记述民间疾苦为主。陈翰笙利用它的材料来创建我国研究印度的基础知识。

此著将南亚（印巴两国）按地形、农田水利、耕作方法、土地制度、经济发展情况，分为21个区域，总结各个区域的这五项特点。据陈翰笙的已故好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印度史教授丹尼尔·索纳在此著序言中所说，这项工作异常繁重。据他所知，细读这部报告的学者，陈翰笙恐怕是第一位，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困难还不仅仅是篇幅浩繁，还因为原书所述只到1928年为止，距写书时已有20年，所以他要补足这20年各区域的新材料。当时他不但使用了费城的图书资料，而且还使用了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的图书资料。

商务印书馆负责人陈原知道了这部英文手稿后，在50年代初就请人翻译，于1959年出版中文本《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21年后，英文本《南亚农业区域》于1980年在印度出版。城乡建设研究所所长薛葆鼎读了此著的英文本后，在一篇文章里作了评介，并且指出：我们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深入各地区进行调查，分区地来规划区域经济。

三 根本原则和其他特点

上列四个系列著作和八部代表作，具体表现了陈翰笙从20年代以来的研究实践。我们不难从他的研究实践总结出他的史学思



想。在总结他的史学思想之前，必须先答复一些根本性的疑问。按传统观念，历史著作都是记述过去，而且应是长篇巨著。论述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的短篇时论算不算历史著作？政论家是不是历史家？这样的疑问不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上，这样的疑问涉及到常规历史学（或传统历史学）与现实历史学（或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历史现实。印度历史家高善必说：每部真正的历史著作应当很清楚地显示“社会发展的进程，重大事件的内在原因，以及社会运动的潜在动力”。不是这样写的历史都是“形式上的历史”、逃避现实的手段、高雅的消遣、一种谋生的职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事业。他认为历史研究应当能够对当前问题的解决办法提供正确看法，并且对未来行动起着指导作用。他还认为认真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认真分析古今事件，使得人类能够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我国《中国通史纲要》主编白寿彝认为：历史帮助人们理解做人的道理。不能说搞历史就是搞过去的东西。了解过去是要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我们的历史学还很落后，“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学的现实意义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常规历史学在今天还被承认，还受支持，这是个事实。但是这两种历史学同时并存，是个历史产物，都是在历史进程中消长，一个会衰退消亡，一个会繁荣昌盛，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挡的。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澄清。从陈翰笙的著作总结出来的思想，只反映他研究实践的思想。虽然可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思想，但还不是他的全部思想。他的全部思想，范围要宽广得多。比如，他的研究实践没有涉及文物考古、古文字学、科技历史，就显示不出他对这些学科价值的充分肯定。

他的史学思想最根本的原则是非常显著的，那就是从实际出发。他的从实际出发是指历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顺应时代的实际需要，也就是顺应先进社会的改革需要。我所以说是最根本的



原则，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在这个条件下，在这个必要前提下，才考虑其他要求，其他一切要求，无论多么重要，都从属于这个根本原则，而不是与它并列的。

在50年代以前，他的研究工作是从反帝反封建出发。在80年代的今天，研究工作就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是历史研究的选题。在研究工作上，他对选题特别重视，犹如战略家选择战役的进攻点。选题不当，劳而无功。战争是多次战役组成的。研究工作也是由多次研究项目组成的。战略目标指导各个战役。同样，时代实际需要、革命的需要指导各个研究项目。他的四个系列著作也就是四个战略目标，各个研究实践项目都是一场场的战役。

总结陈翰笙的史学思想，应先把选题问题分为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个层次是解决选题是不是从实际出发。这就要从历史上作出判断。结果，就得肯定确实从实际出发的选题。第二个层次是识别从实际出发的选题是不是符合实际需要，这还要从历史上加以判断。结果，就得肯定既从实际出发又符合实际需要的选题。第三个层次要解决的问题是选题是从实际出发的，也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但要考虑选题是不是恰当。考虑选题恰当不恰当的问题就属于研究工作的策略问题。如果把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混合在一起就会看不清选题问题的实质。

陈翰笙第一、二、三系列著作顺应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要，第四系列著作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都反映他的选题适合第一层次的标准。第二系列选题以农村经济土地问题为中心，适合第二层次的标准，因为土地革命确实是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内容。这样的选题，既从实际出发也符合实际需要。

第三层次的选题问题的实例比较多。

①陈翰笙曾经一度调查研究上海纱厂的包身工问题。包身工是一种半封建的工厂雇工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日本纱厂有，民



族资本纱厂里也有，而且会引人注目，妨碍研究工作的发展。这选题是从实际出发，也适合需要，但很不恰当，所以立即停止进行。

②封建社会农村生产关系的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实地调查比它富有现实意义，更紧迫，更重要。所以理论研究进行到适当程度，就立即进行实地调查。

③中国农村经济土地问题的实地调查选择黑龙江流域为起点，这是一个恰当的抉择。因为在这方面中文、日文、俄文的文字材料相当丰富，而且问题比较明显，容易取得经验，有利于开展下一步的调查研究。

④在撰写《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时，他已经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及时总结这些材料，公诸于世，选题、内容和公布的渠道和时机都是很恰当的。

⑤反革命内战爆发后，他以官僚资本企业为主题揭露它落后的封建性。在那样的时机，那样的选题是非常恰当的。

我认为，陈翰笙的史学思想最根本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具体表现于他的选题。他在他的研究实践中表明，选题不但要求从实际出发，而且要求适合需要和选题恰当。他的研究事业成就，不仅表现于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更重要的在第三层次。许多历史工作者往往在选题问题上征询他的意见，他也常在选题上表示他的看法。但往往是属于第一层次上的问题，很少涉及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上的问题。而他的功绩恰恰出现在第三层次。所以，在根本原则上首先要说明这一点。

其次是说明其他特点。陈翰笙史学思想的种种特征都是互相渗透、紧密结合的。为便于分析起见，可以说有五个特点是最显著的。那就是：古今未来整体论、具体性、以阶级为研究对象、强调实践、讲究文笔。

古今未来整体论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可以把一条新闻当作历史看待。



并不因为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而是因为这是历史的连续。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土地制度，不是采访经济新闻，而是研究中国历史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他了解现状是从历史去了解。他研究历史是为了追溯现状的由来。为了改变现状所以研究现状，考虑未来。他把发达国家的现状看作是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在他的思想里，世界各民族国家古今未来都是一个整体。他对古代历史、时事新闻有同样浓厚兴趣。古今未来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在理论上很少有人否认。但他却身体力行，生活于这个概念之中。

具体性 他特别强调具体性。他要求具体了解事物，具体表述见解，具体描写事物。他不满足于抽象认识。他认为历史是具体的，所以历史的论述必须具体，这样才有说服力。在他的著作里，历史渗透于每个概念。他认为，社会改革是革命理论的具体化。历史家的任务不是重述那些革命理论，而是具体地表述抽象理论难于表述的复杂的事物。

以阶级为研究对象 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阶级，是活生生的人，是现实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他要求研究工作者深入现场，做实地调查，亲身接触这些阶级，拿到第一手材料，发掘隐藏着而未暴露的现象。他要求研究工作者同文艺家以人物为对象创造典型一样，以阶级为对象创造典型。我们从他的著作里，特别是《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官僚、军阀、地主、买办以及洋商的典型。他以史家的笔法，毫不夸张，毫不隐讳，如实地记述这些阶级典型。

强调实践 他的史学思想不少部分贯彻在他的著作里，但也有不少部分贯彻在他的行为里。他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人的世界观，而世界观则取决于历史观。所以历史观是决定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而历史教育，特别是世界历史的教育，则更加重要。在这方面，他很少发挥这样的议论，而是通过实践。例如，他“敬事而信”地认真主



编《外国历史小丛书》。他通过英语教学，传授世界历史。他对一切向他征询意见的人解说他的史学思想。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反对程式化的空洞议论。

讲究文笔 他很注重文笔。他的一些英文著作是用西方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文笔写成的。西方读者读起来，耳目一新，非常欣赏。他能做到：掌握大量史实，科学地深入分析，通过现象观察本质，热情地遣词造句，不用无关的知识来炫耀自己的博学，言论精确少有差错，不用尖刁刻薄的语言批评谬论，不虚张声势地旁证博引。他的著作考究简练，反对冗长；讲究纯朴真实，这都是我国史笔文风的长期传统。他喜欢用生动的笔调描写真实生活。例如，在描写烟农时有这么一段：“从每片加工精美的烟叶上，我们都能看到那些纤弱的缠足妇女、白发枯瘦的老人、面色苍白发育不良的儿童辛勤劳动的形象。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们为了这些烟叶在闷热得令人窒息的烤房里，在昏暗得象土牢似的发霉的地窖里小心翼翼的劳动。可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却完全听命外国金融资本家和中国的买办、地主、高利贷者。”他善于用婉转的语调批评西方学者。例如，他说：“几乎所有研究中国情况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家都能看出中国有大量的封建残余，可是只有极少数学者不忽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含有多种多样的殖民地特征。事实上，封建主义因素的顽固性和强烈性大部分是来自殖民主义。”

这些特点无论多么动人而且重要，比起他的最根本的原则来，总还是处于从属的地位。他自己说过：“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但研究的目的或动机则更加重要。如果目的只是为了写作，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方法了。”

历史研究要从实际出发，恩格斯在1895年就强调过：要暴露那些还没有暴露的最重要的因素，要研究当前事件，要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要写当前事变的历史。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也就是从当前的实际出发。



上述三个部分（四个系列、八部代表作、根本原则和其他特点）是研究陈翰笙史学思想的基点。其它的一些有关问题，因限于篇幅，只好留待以后了。

《世界历史》1985年10月



陈翰笙对华工史的研究

张 铨

由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同志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下简称《汇编》）已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版。这部十卷集的巨著为我国开展华工和华侨史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陈翰老为什么在晚年要离开他卓有建树的领域，而去编纂一部华工出国史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做一历史回顾。

（一）陈翰笙与华侨史研究

20年代中期，陈翰笙同志曾在第三国际研究农民问题。1928年他离莫斯科回国，经蔡元培推荐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当时国内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重大问题开展着激烈的论战。陈翰笙同志遂利用他在学术界的职位，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村经济调查，并就我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说明。

广东是陈翰笙同志的重点调查地区。1933年11月底至1934年5月底，陈翰笙同志亲自组织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对广东农村经济的联合调查工作。广东地区是侨乡，所以陈翰笙同志对华侨问题十分关注。由于帝国主义的渗透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使广东农村相当一部分男性农民不得不流落他乡或海外，生产中女劳力比重过大，结果造成农业生产的退化。许多农



家只有靠亲朋的国外汇款才能维持生活。但南洋经济萎缩，华侨失业人数激增，华侨汇款已一落千丈。陈翰笙同志在调查中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如，“台山所得华侨汇款民十九时差不多4000万元，现在也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①侨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致“乡间常能听到一片卖儿声”^②。侨乡的苦难强烈地刺痛了陈翰笙忧国忧民之心。

还在1932年冬天，陈翰笙同志在广州美国领事馆曾阅读到西方殖民者掠卖我国人口罪行的真实记录。华工的深重灾难激起他的悲愤和深思。有感于华侨苦难的历史和现实，陈翰笙同志决心把华侨史当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来研究。但繁忙的革命工作使他的这一愿望未能马上实现。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归侨因“海外关系”，被视作“异己”，政治上惨遭迫害。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根本违背了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国内外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翰老不顾已逾古稀的高龄，毅然决定再现华工和华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以此来回答“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于1972年开始编纂的。

（二）陈翰笙运用史料的方法

翰老的治学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他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同样堪称楷模。在历史研究中，翰老对史料的作用十分重视。他曾指出，世界已有五六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现存的史料，“真如又深又广的矿藏，正待我们去挖掘……。研究工作应当从大量可信的史料中去精心探索，我们必须在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

① 《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② 同上，第78页。



综合。切忌先有一个结论，再去找史料论证的做法。”^①那么什么是第一手资料呢？翰老认为第一手资料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是地下挖掘出的大量文物资料。第二是中外各国的已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各种档案。第三是当事人的可靠的记载，尤其是回忆录、日记、书信等。”^②

《汇编》就是翰老运用史料方法的具体体现。第一手资料在《汇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主要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从《钦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等资料中辑录出来的有关华工出国问题的官方文献。其中很多资料从未发表过。这是研究华工和华侨史最珍贵也是最富有权威性的史料。第二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和第三辑《美国官方文件选译》，主要是从被称作“蓝皮书”和“白皮书”的英美官方文献中辑录出来的档案资料。上述三辑官方文献相互印证，为我们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外反动势力贩卖我国人口的罪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在第四辑《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中，选录了宣统、张荫桓、崔国因等日记中有关华工、华侨的部分内容。上述著者多为清季出使西方国家的使节。他们的日记中，对华工的苦难遭遇以及华工对侨居地的贡献，都有可信的记载。这是我们研究华侨社会形成过程的重要依据。同一辑中，对诸如李长傅先生的《中国殖民史》、坎贝尔的《中国苦力移民》等较有影响的专著进行了节录并选译了部分国外报刊中有关华工的报导。这些都是第二手资料，但通过这部分著述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立场的著者对于华工问题所持的观点。这样便于史学工作者客观地、多侧面和多层次地来研究华工问题。

由于华工分布区域广泛，不同的侨居地其历史背景与社会现

①② 陈翰笙：《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载《世界历史》，1978年第一期（试刊）。



实各有特点，因而华侨社会的演化过程各有所异。所以从第五辑至第十辑，主编者对有关东南亚、拉丁美洲、美国和加拿大、大洋洲、非洲和欧洲的华工史料，按地区进行分类，各成一辑。

《汇编》实际上是一项史料的系统工程。每一辑，有它独特的选题范围；但这十辑又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有机整体。国内外学者在编选华工史料方面曾做过不少努力，也有成果。但这部《汇编》无论在收录资料的广泛性方面或是在资料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翰老主编的这部《汇编》有如一座界碑，它的出版表明华工和华侨史的研究工作已经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

（三）陈翰笙有关华工史的思想

从30年代陈翰笙同志在广东农村调查中注意到华侨问题的重要性，到80年代《汇编》的出版，历经了半个世纪。这期间也是翰老有关华工出国的史学观点孕育乃至升华的50年。《“猪仔”出洋——700万华工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一文，集中地反映了翰老有关华工史的思想。

翰老在历史研究中从不就事论事，而是把人物和事件放到广阔的背景中来判断其历史作用或历史地位。在该文中，翰老把华工出国的历史上溯到16世纪，这样就把华工制从发生、发展到废止的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制度从原始积累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直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华工出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

在历史研究中，翰老从不孤立地分析问题，而是把历史事件放到与其有关的总体环境中去考察其因果关系，从而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该文中他通过华工遍布世界的这一史实指出，华工史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翰老鲜明地指出了华工血汗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



· 翰老事实上是把华工问题当作社会经济史来研究的，是把华工问题当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来研究的。翰老这篇文章无论在研究方法上或是在涉及华工问题的具体观点上，都给后继者以有益的启发。

翰老非常关心我国华侨史的研究工作。在1981年12月举行的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暨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明了华侨史的重要性，他指出：“华侨的历史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他要求史学工作者“不能光讲华侨的情况，还要把华侨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弄清楚，不能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不能只讲表面，要找出因果关系。”他的这些指导性意见给侨史工作者很多教益。在那次大会上，翰老被选为华侨历史学会的副会长。

翰老对从事华侨史研究的后辈晚生寄以很大希望。在给予他们热情鼓励和指导的同时，又能提出严格的要求甚至尖锐的批评。爱护而不宠惯，这也是他的一个原则。凡是与翰老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其的热情和真挚所感动。人们都以有翰老这样一位师长而感到幸福。翰老已入耄耋之年，但仍朝气蓬勃地从事着学术活动。“翰老不老”，这不是童话。

《群言》1986年12月



陈翰笙教授谈道德建设

刘士昀 叶稚珊

1986年11月9日，我们按约定时间，走访了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翰笙教授。

陈翰老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为中国革命奋斗了60多个年头，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虽然年逾九旬，视功能严重衰退，但他象青年人一样，朝气蓬勃，追求真理，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位老共产党员的一身正气，这正是我们请他谈谈道德问题的原因。

他亲切地招呼我们坐下后，便就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

问：正象您所知道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上说，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请您先给我们谈谈什么叫道德？

答：道德是社会上提倡的一致公认的好的行为。道是行为，德是成绩。成绩好，是有德，成绩不好，便是缺德。极少数人认为好的行为不能称作道德。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在资本家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舆论都不认为这是道德的行为。因此，美国拥有几百万财富的富翁，为了表现自己有道德，也要捐款办教育，办公益事业。

道德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道德观念也不一样。从历史上看，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现在，不同的社会都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比如我国封建社会，强调所谓妇女的贞节，丈夫死了，不许



再嫁，再嫁就被认为不贞节、不道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就是这种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妇女守一辈子寡，却被誉为美德，死后要为她立贞节牌坊。但现在再也看不到贞节牌坊了。因为时代不同了。不过，旧观念、旧影响在有些地方还是存在的。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皇权占支配地位，以“忠孝”作为伦理道德的标准。“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就是利用了人们脑子里的这种旧的道德观念。因此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道德，什么是封建道德很重要，谨防有人拿封建道德冒充社会主义道德来宣扬。从各个国家来看，不同的国家或国家中的不同地域，也有不同的道德观念。

问：您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德呢？

答：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作为调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社会主义道德，应当是**为人民服务，不损人利己，不假公济私，不贪污腐化，不作威作福，言行一致，勇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

言行不一很不好。说的是民主，干的是独断，说的是为人民服务，干的是为自己谋私利，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最根本的道德要求。损人利己，假公济私，贪污腐化，作威作福，都是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我国在革命的年代，为人民服务的风气比现在好多了，但是现在在所谓太平日子里，人们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好象显得淡漠了，有些人竟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们以功臣自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名为搞社会主义，实际是搞利己主义。当然，我不是说我国的道德风尚已经变得很坏了。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和各个方面有**功绩的人物**，都在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操劳着，奋斗着，这些人就很有道德。



听了陈翰老这一番话后，我们自然地联想到这位坐在面前的慈祥可敬的长者的感人事迹。他不顾年迈体弱，邀集了一批又一批有志于学习的年轻人，教授他们英语。许多跟他学习的青年，不仅学到了英语，而且学到了他为人和治学的道理。仅从他不遗余力关心培育青年，扶掖后进，就可以看到 he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情操。正如他常常风趣地对别人说的那样：他青光眼，白内障，但是一生清白。

沉思片刻后，我们又问：什么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

答：关于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我用八个字来概括：人人平等，助人为乐。

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人人平等只是人们追求的道德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消灭了剥削和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建立起团结友爱，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还不长，它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一个时期，又盲目照搬别国集权主义的作法，再加上受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使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尚未能牢固地树立起来，成为人人遵守的道德规范。以权势压人，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时有发生，这是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

“助人为乐”，古人早就提出来了。我国古代社会就有扶危济贫，抑强扶弱，舍己为人的道德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现在社会主义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我们最终的奋斗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我们应当比古人做得更好。

问：您认为还有哪些传统道德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答：我再讲两点。一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点对于我们今天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很有意义。要真正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很不容易。特别是富贵不淫，我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领袖赴汤蹈火，血战沙场，但一旦当了皇帝，便开始腐化，鱼肉百姓，结果把江山给丢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些人也做不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此恰恰相反。

问：西方道德有没有值得借鉴的东西？

答：有。比如自主、独立意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道德观念。我国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宗法制的生产关系之下，人们的自主、独立意识很淡薄。因为小生产者习惯于搞人身依附，养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依赖心理。

思想不强加于人的民主意识，也是西方道德观念的组成部分。

遵不遵守时间也是个道德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时间观念是很强的，这是受现代大工业锤炼的结果。而我们长期生活在小生产自然经济的环境里，加上“大锅饭”的体制，造成一些人不注重效率，不遵守时间。这种陈旧保守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应当认真改一改了。

谈话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在告别之前，我们又问了他一个问题，请他谈谈怎样才能提高我国人民的道德素质？看他的神气，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他回答说：提高我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关键在于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知识，还要向学生进行道德、理想教育。道德和理想是分不开的，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的道德肯定是很差的。现在只教书不教人的现象还相当普通，这种状况亟待纠正。还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

《群言》1987年1月



青山常在 朝气犹存

——访陈翰笙教授

王 均

陈翰笙教授与蔡元培、李大钊、杨杏佛是同时代人，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建设》杂志社担任过或仍担任重要职务。

第一次与陈老坐在一起，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陈老91岁，是在座的人中最年长者，又是著名学者，座谈会主持人请他首先发言。陈老站起身来——不想几乎同时，有十几人请陈老坐下。陈老马上坐下，道：“我要站起讲，你们却叫我坐下。站着便讲，坐下便不讲了。”

大家先略显尴尬，继而快活地笑，然后又一迭声请陈老“随便”。陈老站着发言，极简短、清晰，竟无一句多余的话。座谈会接着开下去。当一位发言者长篇大论时，陈老突然碰碰我的胳膊，说：“小王，我们都成学生了。”我一下儿没明白，陈老接着说，“你看，他在给我们上课呢！”我差一点忍不住大笑起来。我被陈老吸引住了，约好过些天去他家“聊聊”。

陈老有一本工作日程记事本，16开，一周一页，划为七横格，三纵格，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干什么，分别提前一周安排满。陈老的胞妹陈素雅给我解释每格中的内容，我不免暗暗吃惊：这绝对不象是一位90多岁高龄，又近乎失明的学者的作息方式。但这却是真的。陈老现在每周仍用两个半天给他的英文学习班（免费）学生们上课，主编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还带着两名



研究生……工作量不下于一个年富力强的人，而更多时间是接待各方面来访者。陈老还保持每周不少于三天的读书时间呢！

我忍不住抛开别的话题，问陈老健康长寿的秘诀，陈老又一次纠正我（谈话中，陈老多次纠正我），长寿并无秘诀，但确有个中道理。陈老的“长寿道理”倒也真不是秘诀。他认为讲卫生最重要：出门不乱吃东西，起居有时，饮食有节，保持适度的运动——现在仍每天练健身球，握健身环。陈老胞妹插话说，这位老哥哥，一落枕就打呼，睡眠极好，大家都乐。

陈老脾气急而拗，不时生气、发火。这本是养生大忌，但他同时心胸豁达、坦荡无私，所以又能急而不躁，拗而不伤，生气归生气，发火归发火，却是气过则平，火过则安，从不记恨怀妒。“文化大革命”时批判、斗争过他的人中，现在有好几位是他家经常的座上宾。前些天，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他家拍镜头资料，没弄清前，陈老因被打扰而不高兴地发起火来，弄明白后则不断地道歉，大家反觉更自在了。

陈老童心未泯，常跟小外孙和外孙女一起捉迷藏。当有人说陈老应多保重时，陈老常会猛地站起，连跳几下道：“我的身体老好！”

《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7年5月9日



责任编辑：张燕妮

四个时代的我

陈翰笙 著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

1988年7月第一版·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插页：6 字数：179千字

印数：1—7000 册

ISBN 7—5034—0039—0/K·0034

定价：2.30元